KADDISCH FÜR EIN NICHT GEBORENES KIND

2002年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作品

给未出生的孩子
做安息祷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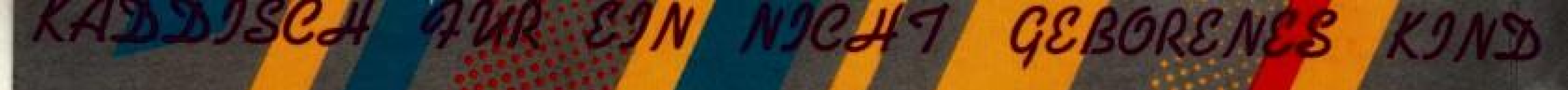
KERTÉSZ
IMRE



[匈] 凯尔泰斯·伊姆雷 著
宋健飞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世纪集团

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伊姆雷1929年11月9日出生于布达佩斯一个犹太人家庭。1944年，他刚满15岁时，被纳粹投入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第二年又转入德国布痕瓦尔德集中营。1945年5月获救。19岁时开始在布达佩斯一家报社当记者，1951年被解聘，从此靠翻译和写作谋生。翻译过尼采、霍夫曼斯塔尔、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等德语作家的著作，并著有《无命运的人生》、《惨败》及《给未出生的孩子做安息祷告》等作品。

责任编辑　裴胜利
装帧设计　王　俭


ISBN 7-5327-3756-X
9 787532 737567 >
易文网：www.ewen.cc
定价：13.00 元

上海译文出版社
www.yiwen.com.cn

KADDISC CHT GEBORENES KIN

2002年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作品

给未出生的孩子做安息祷告

KERTÉSZ
IMRE

[匈] 凯尔泰斯·伊姆雷 著
宋健飞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给未出生的孩子做安息祷告/(匈)伊姆雷(Kertész,I.)著;宋健飞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0

书名原文:Kaddisch für ein nicht geborenes Kind

ISBN 7-5327-3756-X

Ⅰ.给... Ⅱ.①伊...②宋... Ⅲ.长篇小说—匈牙利—现代 Ⅳ.I51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7209 号

图字:09-2003-058 号

给未出生的孩子做安息祷告
〔匈〕凯尔泰斯·伊姆雷 著
宋健飞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易文网: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4 插页 2 字数 79,000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5,100 册
ISBN 7-5327-3756-X/I·2128
定价:13.00 元

"……把小提琴的声音拉得更低
让身体化作烟霭升上天际
云霄里自有你的坟场
上边没有下面这样拥挤……"

原著序——引自鲍尔·策兰《死亡赋格曲》

幸存者的呐喊

如果你尚未看过这部小说,请先读上面这首诗,它会有助于你理解将要阅读的这本书的含义。

60年前,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尚未散尽,纳粹集中营里的白骨仍历历在目之时,奥地利诗人、大屠杀死里逃生的幸存者鲍尔·策兰便以这首著名长诗,形象、深刻地展示了德国法西斯统治下受迫害者的悲惨经历,强烈地触动了无数人内心深处的痛点。奥斯威辛是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地名,不,它不仅仅是地名,而且早已成为人类当代历史上非人的野蛮行径的代名词和残忍、暴力、践踏人类尊严的概念象征,正如一位德国哲人所言:"奥斯威辛之后没有诗。"45年后,匈牙利作家、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凯尔泰斯·伊姆雷则用小说的体裁,重复了策兰当年的诗歌主题,并在此基础上推出了自己的观点:**奥斯威辛之后无法再要小孩**。这一

从惨痛的经验教训中得出的总结，犹如一根红线，自始至终贯穿于这位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有关奥斯威辛题材的三部小说的终结之作《给未出生的孩子做安息祷告》。

作为犹太人，凯尔泰斯15岁时和众多生活在匈牙利的同胞一起，被纳粹关进了位于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虽然这段惨痛的经历仅为短暂的一年，可其间他幼小心灵上所受到的震撼，却给其终生打上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儿时的所见所闻，像噩梦一样伴随着他步入中年，并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他的工作和生活。作品里的作家兼翻译家“我”正是凯尔泰斯本人的化身。小说在没有任何铺垫、引导的情况下，以“我”对妻子关于能否要个孩子的问题的坚决否定开篇，随后像揭开伤疤似的，一层层打开作者记忆的闸门，让灰黑色的往事弥漫而出，慢慢浸透整部作品。首先，自相矛盾的小说标题，就给人一种荒诞不经的感觉，让人费解难懂，似乎绝非出自常人之口。然而，主人公通过对自己亲身经历的讲述，以哲人之观点为佐证，纵横捭阖，旁征博引，经一系列的推论、阐释，竟让人觉得此说的确合情在理。是的，从奥斯威辛魔窟里死里逃生的犹太人，但凡有良知、有境界者，是无法再像正常人那样思考和生活的。20世纪30至40年代对犹太人进行的大迫害、大屠杀，给他们肉体和心灵造成了巨大伤害，使他们对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充满了恐惧。正是从这一被扭曲的心理出发，作品的主人公发出了坚决不要孩子的呐喊，因为他认为，与其让自己的后代到这个世界上来活受罪，倒不如拒绝生育，在他们还没出生之前，就该给他们做死亡哀祷。“比方说，想象那孩子的叫喊，

是我们自己孩子的、你的叫喊;比方说,孩子听到了什么话,于是正扯开嗓子大叫;比方说,孩子叫道:'我不要做犹太人!'我说,孩子不愿做犹太人,这完全是可以想象而且也完全是可以理解的;那样的话我便会因为无言以对而陷入窘境,是啊,我们怎能逼迫一个生命去做犹太人呢。"贯穿全书的那句"不要!"不仅表达了"我"对自己犹太身份的悲哀,更是作者对歧视、残害犹太人行径欲哭无泪的控诉。

然而,在断然拒绝生育的同时,主人公内心深处是非常非常矛盾的。虽然嘴上说得挺硬,但他健康人的天性和本能却始终难以泯灭,"因为这时我们的本能与本能正在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而且几乎不是本能倒是反本能占了上风,甚至已将本能取而代之,久而久之这已经习惯成自然了。"尽管这种条件反射式的"情感硬化",统领了"我"的整个思维和生活,可他内心深藏的最温柔的情愫,还是从他对孩子模样儿的想象中可见一斑:"你会不会是个黑眼睛的女孩,小鼻子周围撒满了星星点点的浅色雀斑?或者是个顽皮的男孩,长着一双活泼而硬朗的眼睛,恰似灰蓝色的鹅卵石?"字里行间,当父亲的渴望跃然纸上。这种情与理之间的冲突,决定了主人公复杂、灰暗、扭曲的内心世界,使整篇叙述、描写均沉浸在忧伤、哀婉的气氛中,从而奠定了小说沉重的基调。

本书另一个让作者倾注了诸多笔墨的相关问题是生存。在主人公看来,作为一个幸存者,一个生活潦倒、婚姻不幸、一事无成的中年知识分子,他唯一能够继续生存的方式和目的就是工作,即写作,否则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还能让他存在下去的理由。而写作

对他来说，无异于“在给自己挖坟”，一旦辍笔，大功告成，那这坟墓也就修筑完毕，他的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事实上，主人公的这一生存观，恰恰就是凯尔泰斯自己思想的真实写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仅奥斯威辛一座集中营就吞噬近百万犹太人的生命，一些人虽然躲过了纳粹惨绝人寰的“灭绝行动”，得以存活下来，可是在现实生活里，他们的内心又始终无法摆脱痛苦回忆的折磨，从而陷于不能自拔的境地，最终走上了自杀的道路。对此，虽然凯尔泰斯也大有同感，觉得难以继续这“幸存之幸存”，但他却找到了一条也是绝无仅有的唯一的生存之路，那就是写作，“因为在我的工作与我的继续存在之间有着最最重要的联系。”正因为如此，年逾七旬的凯尔泰斯笔耕不辍，勤奋创作，尤其在中年、晚年著述颇丰，他要在有生之年，不断把历史的经验教训传达给后人，让世人永远不要忘记奥斯威辛的惨剧，随时警惕戕害人类的恶势力卷土重来。在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仪式上，凯尔泰斯深沉地说，他把自己的获奖看成是“欧洲又重新需要奥斯威辛的见证者被迫所亲历的经验的一种迹象”。在同年荣获另一个德国文学大奖的授奖活动中，他援引德国诗人、剧作家汉斯·萨尔的话说：“我们是仅存的证人了，尽可能多地向我们提问吧，我们就是为此还活着……”

在涉及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篇幅里，与当代诸多后现代派作品对大屠杀的描写手法一样，凯尔泰斯没有义愤填膺地从正面揭露当年纳粹惨无人道的杀人罪行，而选择了一个与当时数不胜数的骇人听闻的惨案相比，似乎略显平淡的“老师”的故事，从对极端

情况下生死之间的冷静、理性分析，阐述了生存之意义这一深刻的主题。“老师”原本因多得的干粮而增加了一分生机，而又由于良心发现，想物归原主，却导致自己丧失了性命。这看似荒谬的故事无疑是在告诉人们一个哲理：在一个不讲理性的、非人性行径肆虐的时代，理性之光显得何等微弱、渺小，在野蛮、残暴的极权专制下，对理性的追求往往只能以悲剧而告终。

凯尔泰斯·伊姆雷一生与德国文学、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真正的写作就是始于接触到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作品之后。在从事文学创作的同时，他还翻译了大量德语文学、哲学名著，并从中汲取了丰富的精神养料，来充实自己的写作内涵，增强其思想深度。这一点，在《给未出生的孩子做安息祷告》一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阅读此书，你自始至终都会感觉到日耳曼语言文化对作者本人产生的深刻影响，无怪乎有人认为，凯尔泰斯的著作在德国远比在本土更受重视和欢迎。2005 年 5 月 3 日，值欧洲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 60 周年之际，柏林自由大学同时向凯尔泰斯和德国著名作家格拉斯授予了名誉博士学位，诺奖双雄同台辉映，更显示出凯尔泰斯在德语文学领域里的影响和地位。

与凯尔泰斯自称为“无命运之人生”三部曲的前两本书《无命运的人生》和《惨败》相比，《给未出生的孩子做安息祷告》这部小说中，更多地融会了作者广博、精深的哲学理念。作者将诸多心理分析和人生思考，穿插于历史和现实的对比之中，让文学描写与哲学阐述交相辉映，使全书散发着浓郁的哲理气息。在写作风格上，作者采用了极为典型的后现代叙事手法，以内心独白的意识流形

式，在时空交错之中，把童年的回忆，学生时代的经历，与妻子的相识、相交到最终的分道扬镳等一幅幅亦真亦幻、似梦非梦的支离破碎的画面，无序、零乱地呈现在人们眼前，看似信手拈来，实则匠心独运，使全书在既无完整的故事情节又没有章节和段落划分的情况下，围绕着“不要孩子”以及“幸存”这一内涵深邃的主题构成了一个整体，给人以一气呵成的感觉。这种新颖、独特的篇章结构，极大地增加了阅读此书的难度，因此，中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尝试对一些词条、概念作了脚注，以方便读者理解、查证，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如果你看完了这部小说，不妨再读一遍上面那首诗，这会加深你对已经读过的这本书的认识。

宋健飞

2005 年 5 月于上海

“不要!”我顿时、立即且毫不犹豫地回答,某种程度上是出于本能,因为这时我们的本能与本能正在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而且几乎不是本能倒是反本能占了上风,甚至已将本能取而代之,久而久之这已经习惯成自然了。——我故弄玄虚地说,如果能将此称为故弄玄虚的话,也就是说,把这赤裸、悲怆的大实话称为玄虚的话。我就是这样跟这个迎面而来的哲学家谈话的。他和我一样,都困在了这片躯干弯曲、病得 ——没准是害了肺结核——病得像让人几乎能听见其呼呼喘气的山毛榉树林里,应该说是块山毛榉小树林或者谁知道该叫什么。我承认,在识别树木这方面,自己很差而且无知,只能凭针叶判断出什么是松杉。此外,还能认出法国梧桐,因为我喜欢法国梧桐。但凡自己所好之物,我至今都还能识别,即便不用那种自己识别所恶之物的知识,不用那种令人窒息、让胃痉挛成团、使人浑身震颤、可以说已被点化开窍的真知灼见,而只凭自己的反本能就足以做到。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这儿的一切事情、为什么我遇到的一切事情总是与众不同。也就是说,如果我或许理应知道其中原因所在的话,那么我还是就这样假装不知道为妙。这会让我省去很多解释,不过看来解释是无法避免的。我们经常解释自己和万事万物,甚至连生命这一现象和感知的无

法解释的复合物，也要求我们作解释，我们的环境要求我们作解释，后来甚至我们自己也要求我们作解释，直到我们把周围的一切都解释光了，最终也将我们自己解释没了，就像宣判了自己的死刑。——我就是这样喋喋不休地向哲学家作解释的，心里有种非说不可的欲望，这种强迫性倾诉欲连我自己都反感，却又无法克制。每当我无权发言时，这种强烈的倾诉欲总是将我紧紧攫住。而且我担心，自己那种在旅店里、出租车上、贿赂官方和半官方人员时会克制不住地大把大把花钱的行为，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就如同我对人极端的客气一样，客气得低三下四，好像总在不断为自己的生存、为这样一种生存而乞求。噢，上帝！此刻我不过是孤零零独自一人在树林里溜达，想呼吸点新鲜空气，尽管这山毛榉树林如此惨淡荒芜，而且这空气也有几分霉腐的气味。我只想让自己的脑袋通通风透透气，干脆这样讲吧，如果不去钻字眼的话，这样说好听些。但凡一去钻字眼，对吧，那说的话就没劲了，比方说我的脑袋就根本没必要去通风透气。而且正相反，我本人出奇地害怕吹风。那么我在这儿聊度我的时光，过去也是这样，反正是临时性的（现在我不想细究这句话所意味的各种可能性）。这房子位于匈牙利的中部山区，虽然也还是个可以凑合工作的地方，但我们管它叫疗养院（因为我总是在工作，但并非仅为功利之心所迫，倘若我不工作，那就只是**活着**，如果只是活着，那么不知道这种活法会迫使我去干什么，当然不知道更好，即便我的细胞、我的五脏六腑肯定早已有所预感。所以我才不停地工作：只要我在工作，就说明我存在；假如我不工作，谁会知道有我这个人存在呢，所以我

对此很看重，而且也必须看重，因为在我的工作与我的继续存在之间有着最最重要的联系，这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就在这所房子里，我获取了在同类知识分子的上流社会里分得一席之地的权利。正因为如此，不管我想怎样悄然无声地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充其量是压低了的打字机声泄露我深居简出的秘密——也无论我在走道上是如何轻轻地一溜而过，可总也无法回避和这帮人打交道；饭是不能不吃的，但一开饭又得毫无遮拦地夹在同桌的中间；步也得散，可又偏偏在林子里遇到个搞哲学的奥普拉特，此人粗俗鲁莽，戴着顶棕黄格子的鸭舌帽，穿了件开缝很大的套袖大衣，一双淡绿色的眯缝眼，那张硕大柔软的脸如同一团揉好的发面。奥普拉特的正式、合法职业是哲学家，而且这一点可以在他身份证上相应的栏目里得到证实：奥普拉特博士是哲学家，如同伊马努埃尔·康德以及巴鲁赫·斯宾诺莎或者以弗所[①]的赫拉克利特是哲学家一样，也就如同我是个作家和文学翻译一样。鉴于我的职业本来就够可笑的了，所以提及这些伟人也只是为了别让人觉得我比现在还要可笑，因为享有这样头衔的真正作家——有时候还兼翻译家——我可以整整齐齐地罗列出一大堆来。搞翻译也使我的瞎折腾在一些人的眼中，尤其是在政府部门看来，纯属一是一、二是二的行当，不过虽然原因不同，可我自己也这么认为，觉得这工作或许是给人某种有根有据的职业印象。

“不要！”当我妻子（其实她早就不是我的妻子）第一次谈起这

① 以弗所（Epheso），古希腊的小亚细亚城邦。

个话题、谈起你时，孩子，我的心里顿时且立刻发出这一怒吼、哭嚎。我的哭泣消亡得极慢，实际上它大概是在经历了许多许多年后才转化为一种忧伤的厌世悲观，就像奥丁[①]因为众所周知的离愁别恨而产生的震怒，直至变成类似随风而逝的吹奏乐那样如烟似雾，又好比一种潜移默化的恶疾，缓慢游移但却暗藏杀机，最终，一个问题的轮廓在我的心里越来越清晰。这个问题就是你，孩子，说得准确些也就是我，然而这个问题因为你而产生了疑问，说得再准确些（这一点奥普拉特博士也同意）就是：**把我的生存视为你的存在之可能**。也就是说，如果要把这准确度无限和非现实地上升的话——要受些自我折磨和痛苦这也未尝不可——那我就是个谋杀犯，因为幸亏现在已经太迟了，并且永远都为时已晚，你并不存在，而在用那一声“不要！”把一切摧毁殆尽、夷为尘埃，尤其是埋葬了我那失败、短命的婚姻之后，我就可以踏踏实实、稳稳当当地平安无事了。现在和过去，我都是如此泰然自若地向哲学博士奥普拉特娓娓诉说。虽然生活从未能够教给我这种泰然自若，可一旦万不得已时，自己已能够训练有素地从容不迫。而眼下就遇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刻，因为哲学家正处于近乎心醉神迷的状态，这点我一眼就从他那微微朝一边歪的脑袋上看出来了。他头上怪里怪气地扣了顶鸭舌帽，看上去就像个已经有几杯酒下肚、现在正思忖着究竟是将我放倒还是敲诈一笔赎金的路劫的土匪。我差点都要

① 奥丁（Wutan），北欧神话中的知识之神、战争之神，常为瓦格纳歌剧中的艺术形象。

这么对他讲了，遗憾的是，奥普拉特根本一丁点儿也没往这上头想。一个哲学家通常不会去思谋拦路抢劫的勾当，即便真有此想法，那他也是把这事当作一个有分量的哲学课题来加以考虑的，而脏手的活儿则由专业人员去干，不是吗，尽管我对奥普拉特的随意联想纯属武断臆测和无端怀疑，因为我并不了解他的过去，但愿他也别对我讲，但是这种事我们可见得多了。不错，奥普拉特不会干这事。不过他却出乎意料地向我提了一个也够唐突的问题，就好像那种拦路打劫的问我口袋里有多少钱。他开始查我的户口，而且采用的是起初先向我通报他自己家庭状况的方法，犹如先给点预支，然后便理直气壮地要求，既然我能够知道他的一切，那么他也因此自然有权可以了解我的……不过我断开了自己的思路，因为我感觉到那些言词和语句的激流正将自己裹挟，卷拖着漂往一个错误的方向，朝着道德说教的妄想狂前进。当今之日，我就遗憾地发现，自己越来越频繁地处于这种精神状态，其原因（孤独、隔绝、自愿的流放）我实在是清楚得不能再清楚了，以至于自己现在对此症状已经麻木不仁。这些烦恼都是我自找的，就好比在挖一个很深很深的墓穴时先铲几锹开工，然后还得一块土一块土地挖出个将来能容纳我的地方（尽管我也有可能不埋在地下，而是葬在空中，因为那儿的地方不怎么拥挤）。总而言之，奥普拉特博士确实只向我提了这个不用费心的问题，他问我有没有孩子。不过他提问的方式是典型的哲学家式的粗豪直率，也就是说缺乏细腻的人情味，而且还问得怎么说都不是时候。可话又得说回来，他从哪儿能知道，这个问题会不可否认地在我心里搅起狂澜，他何以得知

我会以自己那种出自极端的、极端到自暴自弃的客气的倾诉欲来回答他的问题。在说话的过程中这种强迫症似的倾诉欲让我反感得不行，可尽管如此我还是止不住地口若悬河。所以，当“不要！”这个词顿时、立即且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时，某种程度上是出于本能，因为这时候我们的本能与本能正在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而且几乎不是本能而是反本能占了上风，甚至已将本能取而代之了，久而久之这已经习惯成自然了。不错，正是因为当时说了这番蠢话，还因为本人特有的、自愿而且毫无道理的（就算是有一大堆理由吧，如果没记错的话，我上面已经列举了其中的一部分）屈尊俯就，所以，当我随心所欲地描绘这位哲学家普拉特博士的模样时，的确是出于一种报复的心理：在那片躯干弯曲的山毛榉树林（或者应该叫菩提树小树林）里，不管是那顶软塌塌的鸭舌帽，还是开缝很大的套袖大衣，以及那双淡绿色的眯缝眼，那张硕大柔软、如同揉好的发面的脸——所有这一切我都会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绝对不变，完全实话实说。而事实上这一切本来也可以不都写成这样，我的笔触完全可以少些锋芒、多些宽容，说好听点吧，就是也许可以更多些**爱心**。不过叫人担心的是，我这支笔，饱蘸了辛辣讽刺和尖酸刻薄，或许还带点寻开心（对此我没有必要评论）的色彩，却又在某些方面疲软残秃，用它写作我大多只能是这个样子。仿佛这笔一俟要去写某些话时，它总会把人给挡回去，以致我最后落笔成文的总是取而代之的其他语句，而这些话从来形成不了珠圆玉润、富有爱心的描写，也许纯粹是因为，**我害怕自己的心中也已经没有了爱**。可是天晓得，我究竟还能爱什么人、为什么去爱?！虽然奥

普拉特博士说话的方式十分和蔼可亲，其程度足以使他的几句名言已经难以磨灭地（我差点要说是噩梦缠身般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他说自己没有小孩，身边除了日渐衰老并且心里恰恰特别害怕衰老的妻子以外别无他人。这哲学家讲话比较含糊，当然也可以说比较谨慎，他总是任凭我自己去理解想要理解的东西。而且，尽管我并不想理解，可最终还是理解了。他继续讲，其实没孩子这个问题是最近才上心的，正因为如此现在倒是越来越记挂了，所以刚才在这林间小路上他正惦念这事来着。而且他认为，这个问题无法回避，想必是因为自己年纪越来越大，所以诸如还可以有孩子这样的某些可能性对其而言正在慢慢地不再可能了。况且，他竟然这些天以来才经常地考虑此事，这实在太不像话，用他的原话说，就好像是在“反省一种失职的行为”。说到这儿，奥普拉特博士停住了脚步，站在这林间小路上。接下来，我们走走停停，两个社会产物，霜叶下的两个男人，沉湎在交谈之中，犹如风景画家画布上两个可怜的斑点，从根本上破坏了很可能从未存在过的大自然的和谐。只不过我现在记不清了，是自己主动和奥普拉特结的伴，还是他主动向我靠的拢。不过我们不会去纠缠这种虚荣心的问题，对，当然是我主动和奥普拉特结伴而行，很可能恰恰是为了好摆脱他，因为这样一来，我什么时候想掉头回去了，说声拜拜就可以走人。奥普拉特博士就这么站在林间小路上，仅一个心情沉重的动作，就让那发泡甚至局部已经一大片肿胀的脸盘上顿时愁云密布：他把头连同那顶滑稽、可笑的鸭舌帽一下缩进脖子里，将目光投向我们对面的树枝，那模样就好像他自己是

一件破破烂烂的旧衣服，被人冷落却又还在尽忠职守。我们就这样站着，缄默无语。我沉浸在奥普拉特的魅力之中，而奥普拉特则为树木所吸引。这时，我内心忽然一动，意识到自己没准马上将成为哲学家一句想必是真心实话的见证人。果不其然，奥普拉特博士终于开口了，他讲，如果他觉得这件已经发生的事，或者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没有发生的事，的确是一种失职的话，那说这话时他脑袋里想的并非是生儿育女这个问题，他根本没起这个有几分抽象、坦率地说其实属于满足本能愿望的俗念，即在人世间解决——确切地说，恰恰是没有解决——自己的个人和超出个人的问题。也就是说，除了保持自己的生存之外还要延续生存，要把他的这种生存之幸存——即把他自身——延长、复制到后代身上，这种（超出保存自己以外）生存的延续被视为可以说是超验的但又相当形象的人类对于生存之义务，这样人就不至于感到自己残废、多余，说到底是生育无能。而且哲学家也没去想，将来无依无靠的年岁会是如何地悲惨。是的，他真没往这方面动脑筋。奥普拉特博士说，实际上他真正害怕的不是这些，他怕的是“情感硬化”。他重复着这番话，在林中小路上继续前行，好像是要回我们的根据地，即那所疗养院，可实际上我现在心里已经很清楚，他是在走向情感硬化。在他的这条路上，我则成了他的忠实旅伴。我一方面从他那番感人的肺腑之言中受到应有的感动，而另一方面却又对他的害怕已经有些无动于衷了。的确，正如我所担心（确切点说，我相信甚至是可以肯定）的一样，这种害怕只不过是一时的，同时也因而不管怎样都是神圣的，从某种意义来说，就是一种如同可以经过圣

水洗礼而蒙上了一层永恒色彩的害怕。因为当这种害怕来临时，我们将不再感到害怕了，甚至连其曾经使我们害怕这点都不会想起，因为我们已经被它所征服，沉没于其中，与之相依为命，不可分离。因为即便如此，也不过是我在空中挖掘坟墓时铲（因为那儿的地方不这么拥挤）下的一锹而已，所以我说，我没冲哲学家说，而是跟自己讲，对待情感硬化自己无须害怕，即便谈不上如同面对伸向我们的援助之手那样去真心欢迎——其实它毫无疑问地是在帮我们走近坟墓——亦可顺其自然，因为卡普斯①说过：**世界并不敌视我们，倘若有危险降临，我们则应尝试以爱心相迎。**虽然——我打个岔——虽然我不对哲学家讲，也不是冲卡普斯说——这个幸运儿居然可以收到里尔克②那么多信——我只对我自己说：我已经准备好了，**就还对这些危险予以爱心**。我觉得，这也不完全对，其中也有我不断听到的错误论调，打个比方，就好像一些乐队指挥，在英国管由于乐谱里的一个印刷错误而吹高了半个音阶时，立马就能从合奏中听出来一样。这种错误的音调不仅在我内心回响，而且还在自己的周围萦绕，在我的远远近近、在我的所谓宇宙空间里，我不断地听到这种错音，就跟眼下在这与自然格格不入的大自然里一样：四下生长着害病的橡树（或者是山毛榉树），旁边流淌着发臭的小溪，头顶上的污浊天空透过那患有结核病的树叶撒下

---

① 卡普斯（Franz Xaver Kappus，1883—1966），奥地利作家、诗人，原为军人，年轻时因热衷文学写作与里尔克过从甚密，20 世纪初俩人之间书信频繁，里尔克给他的回信后辑成专集，取名为《致一位青年诗人》出版。

② 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奥地利著名诗人。

几缕微弱的光线。在这个地方，亲爱的卡普斯先生，我怎么也没体验到要做**造物主，去繁衍、培育后代**的思想灵感，不是吗，这种传宗接代的思想**倘若不在世界上持续得到印证和实现便一钱不值，同样没有颁发给动、植物的千百种生存许可也是一片空白**……是的，那些人想要破坏我们对此的乐趣（此话点到为止吧），可谓枉费心机了。悄悄地，我们沉默并很认真地关心自己的血液流动和那些噩梦，其实我们暗自愿意——只是在这点上我感觉到那源自大千世界的万众之声的和谐——我们愿意仍然一直坚定不移地生存下去，尽管活得如此萎靡不振，如此郁郁寡欢，如此病病歪歪，对，不仅如此，即便我们甚至如此没有能力也没有条件可以活下去，也要生存下去……正因为如此，不过也是为了避免在某种程度上陷于这种冲动的情绪而不能自拔——再说，这种心境让我在几乎一切或在至少几乎一切**我**所参与的事情上，又一次听见了那英国管发出的错音——所以我向奥普拉特提了这个就算不那么高明但却纯属哲学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这样脆弱无能？我们何时何地彻底地“得罪”了自己的权利？为什么我们这般无情和彻底地不再能够不去知道，我们知道什么？如此等等，好像我不知道自己知道什么似的。这全都怪我那无法克制的倾诉欲，仿佛它是一种恐空心理[1]：这下奥普拉特博士的脸摆出了那副生活在匈牙利的中级影响中等年纪中流收入中间观点中常前景的中层知识分子之表情，

---

① 恐空心理（Horror vacui），一种古老的自然观点，认为万物天生惧怕空洞，任何空间都趋于充实自身，后影响人文学科，尤指心灵和思想害怕空虚，精神需要支柱。

两只眼睛完全湮没在玩世不恭且得意洋洋的笑纹之中。同时，几乎一瞬间，他那油滑、惯于转弯抹角而且原本自信的声音又恢复了以往的客观和清醒，这声音此前只是因为富于生命活力的话题咄咄逼人，才一度而出现了失常。我们就这样慢慢往回走，两个人都衣着考究，红光满面，都属于那种道貌岸然的中等年纪中间观点的中层职业知识分子，两个人都是幸存者（只不过每人幸存的方式各不相同），两个人都还继续存在着，两个人也都半截入土了。我们探讨着两个知识分子之间能够探讨的东西，纯属茶余饭后的闲聊。我们平和而乏味地研究，人为什么不能存在。我们还谈到，生存的纯粹存在原本是一种未开化的混沌状态，因为从更崇高的意义和视角来看，**“存在”根本就不应该存在，**仅因为其本身的缘故就不应该，已经发生的事，退一步说，以及不断新发生的事，这些因素就足以说明问题。且不说，开化的思想早就禁止“存在”的存在。此外我们还谈到了——当然我不是一切事情都记得清，因为这一由于纯粹的尴尬和偶然而产生的对话，**无论那成百上千被遗忘的云雨之夜如何在造物的思想下重新焕发活力，也不管这一思想又怎样被赋予了神圣和崇高的意义，**其内容听起来与上百次类似的对话一样，更确切地说是一样空洞。——我真的想不起所有的一切了，不过我觉得，我们还谈到了以下的问题：存在之以生存为目的和无知为表象的全部努力，到底是否不可能**绝对不是**某种自然天性的征兆，这一点作为夸张现在也确实是不可能的。相反，倘若这存在无论如何都得延续下去的话，这恰恰是存在只能如此无知延续的一种症状。而且，假定这种继续存在现在不能够实现，当然这

只会**在高级层面上**发生（奥普拉特如是说），那么对此只有这样（两位一体）的可能：即不仅没有一丝征兆，而且倒适得其反，即陷入无知的深渊……此外，明知故犯地接受无知只不过是精神分裂的综合表现……还有，据此对世界精神[1]的经历（指我）和对世界精神的实现（指奥普拉特博士），这种实现正是任何时代的任何世界精神之宗旨所在；而当今之世由于缺乏信仰、文化以及其他冠冕堂皇的途径，唯独只剩下**灾难**……就这样，我们继续一遍遍共同吹着那支发出错音的英国管，大发我们的奇谈怪论。其间，薄薄的暮霭从一动不动僵直的树梢上降下，暮色深处，便隐匿着疗养院那相当紧凑实用的建筑设施。那里有摆好了的餐桌和做好了的晚餐，刀叉马上就会稀里哗啦地摆开，碗盏立刻就要叮叮当当地放好，随后就是人声渐起的交谈，而且就在这样一种朴素无华的实用情景里，英国管那荒谬、悲观的音调也时不时在回旋飘荡。就连我自己都无法不相信，我之所以后来终究还是没有掉头回疗养院，就是为了甩掉奥普拉特博士，可事实上直到最后我都如同着了魔似地跟他呆在一起，大概是出于自己的内疚（自己的厌恶），谁知道为什么，这种内疚或者厌恶无疑是我由于那种空虚而感觉到的，自己试图用倾诉欲来掩饰这一空虚，以便不听、不看，也不必说任何我本应该说而且谁知道是不是我或许还应该写的东西。是啊，因为所有这一切，那个夜晚惩罚了我——或者说奖励了我？——它改变

---

①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用语，认为世界精神是通过世界历史这一过程来体现自身的，精神的本质是自由，因而世界精神自我体现的过程也就是自由意识发展进步的过程。

了我的人生，带来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雷声震耳欲聋，闪电明灭不已，似金蛇狂舞，横七竖八地在苍穹上划出古怪的文字后又倏然逝去，然而这些细长的、稍纵即逝的符号，成了清晰——至少对我来说——成了清晰可辨的单词，所有字母拼成的词全都是清一色的：

“不要！”我所说的一切汇成了这句话，因为这时候我们的本能与本能正在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而且几乎不是本能倒是反本能占了上风，甚至已将本能取而代之了，久而久之这已经习惯成自然了。

“不要！”我内心顿时、立刻咆哮道、哭嚎道。我的哭泣经历了许多许多年后才转化为一种淡淡的但却挥之不去的隐痛，直到一个问题如同某种姗姗来临的疾病，缓慢而且凶险地在我心中形成越来越固定的轮廓——你会不会是个黑眼睛的女孩，小鼻子周围撒满了星星点点的浅色雀斑？或者是个顽皮的男孩，长着一双活泼而硬朗的眼睛，恰似灰蓝色的鹅卵石？——是的，把我的生存视为你的存在之可能。那整整一个通宵我只在思考这唯一的一个问题，一会儿在闪电那耀眼的亮光中冥思，随即又在接踵而至的黑暗里睁着发亮的眼睛苦想，在电闪雷鸣的空隙间我仿佛看见这个问题倏然掠过墙壁，虽然那天夜里，与其说我在用手写作，不如说是在用身体感受，但我还是不得不把现在付诸笔端的话语都看成是在那天夜里写下来的。我说感受，指的是各种各样的痛苦向我袭来，主要是回忆引发的（我当时还有半瓶白兰地），我充其量也就在经常随身携带的便条、拍纸簿和记事本上乱划几句杂

乱无章的话，那些句子后来我已经无法复原了，而且就是想起来了，也弄不懂是什么意思，到最后全都被我忘掉了，只是很多年以后那天夜里的情形才又在我心里死灰复燃，而此后又得过那么些年，直到我如今得以试着写下那天夜里本该写下的东西。不过假使当时真要写点东西的话，要把所有应该写的都写下来的话，那单单一个晚上又无论如何嫌短，而且是实在太短。然而，即便我当时能写，那天夜里也只是个开头，想必不是最早的开头，但无论如何也是那条漫长而且谁知道究竟会有多长的自觉自愿的自我清除之路上的起步之一，属于——而且这已经可以肯定——属于我为自己在云中掘墓时开挖的头几锹。事实证明，将我的生存视为你的存在之可能这一问题，是条贯穿主导思想的红线，就好像你用那柔嫩的小手领着、牵着我，走在这条最终什么方向都不通的路上，充其量能获得一种完全徒劳无益并且完全不容更改的自我认识。这条路我只能在排除了路上日渐堆积的障碍之后才能够走——什么叫"能够"，就算用"必须"也说明不了什么。所以先得从排除阻碍开始，或许我应该说：得从坚决彻底地根除我这个中层知识分子的存在开始，即便我像个在艾滋病多发环境中小心谨慎的淫乱者，把与自己身份相应的风度仪表当作避孕套使用，或者精确点说，已经使用过了，因为自己早就不再是中层知识分子，实际上根本就不是知识分子，什么都不是。歌德说过，**我生来即为私有人**。我则说，我一直是个私有的幸存者，既然自己当了翻译而且还不得不当下去，那最多还可以算个搞翻译的。尽管情况不妙，我还是就这样最终把一个事业有成、生活在匈牙利的

作家之耻辱的存在给彻底清除了，虽然我妻子（她现在早就是别人的妻子了）认为，我本来是很适合搞写作的（她这话当时可叫我有点吃惊）。我妻子说，她不是说我应该放弃自己的**艺术**或者别的什么原则，只是说我不该心虚胆怯。因为不管我花的力气越多（多很多）还是越少（放弃我的艺术或别的什么原则），反正要想使这些原则或者尤其是我本人出头露脸的话，我不得不花的力气都越大。谁不想出人头地，就连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也不例外。我妻子还叫我别自己哄自己了，她问我，假如我不想有所作为的话，那干吗还要写作呢？这问题毫无疑问是个圈套，不过对其深入探讨的时间还没到。倒霉的只是，她借此很可能把我给看穿了，很可能她当时说的一点没错。很可能我真的现在、过去都同样具备一个事业有成、生活在匈牙利的作家那耻辱的存在所需的一切资质，这一存在的那些可被看穿的精妙技艺我早已看得不能再穿了。我现在和过去都同样具备这样一种生存所需的一切条件。即便不具备的话，那么我现在和过去都同样可以把自己的全部恐慌和对存在的极端惧怕，轻松地转化成一种盲目、狂妄、冲动而且还谈不上那么令人折服，最多也就是有几分让人吃惊的自我崇拜，将其变形为道德说教的偏执狂和对别人不断提起的刑事诉讼，以此来获得这一条件。不过更重要的是，同时也更危险的是，我更早的时候就已具备了一个生活在匈牙利、与其说事业有成不如说一事无成的作家之同样耻辱的存在的资格。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了我妻子，她又说对了，谁如果要踏上成功之路，那么不是成功便是不成功，**没有第三条路可走**，而且的确，两者殊途同

归。都是一样的耻辱。所以有一段时间，我逃避于杯中物，沉湎在客观的文学翻译之中……这么一来，当我想起妻子的话时，也就自然记起了她这个人。有好长时间没想起她了，其实即便我们有意无意地在什么地方见面——想必多半是有意的，而且几乎毫无例外都是在我（前任）妻子的迫切要求之下——碰过头后我还是很少想起她。我估计，她对我是旧情难忘，而这种怀旧感里又掺杂着一种岁月久远并且毫无根据的愧疚心理。如果说我对此有所感觉的话，那我至少感觉到了这一点。于是我想，如果她怀旧，那她的这种心情来源于她自己的青年时代和在我身上浪费的那短短几年的光阴。相反，她那完全没有根据的愧疚，则是她自身引起的，其原因在于她那不容怀疑、不过也从未被怀疑过的而且正因为如此似乎没遇到应有的阻力便轻易获得的总是有理的意识，也就是说，因为我从来没有为任何事情怪罪过她。可是，上帝啊！我又能够怪罪她什么，我为什么能怪罪她呢？难道因为她要生存？随着她的话在耳边响起，我也想起了她，想起了我那失败的短暂婚姻。一想起我的婚姻，自己眼前就呈现出这场婚姻的画面，就好像一切都摊开在解剖台上了。我一边观察自己婚姻那早已冰凉的尸体，温柔、体贴的情愫里无论怎样都透出一股子冷眼旁观的麻木，就跟我平常观察一切事物最喜欢用的方式一样，同时，我又得一边提防，别让自己从妻子的上述言论中打造出某种廉价、肮脏、微微取胜的陶醉感。而她的这番话，我这个做丈夫的——该怎么说呢——是忍着糟糕的心情洗耳恭听的。不过在那个令人大彻大悟的夜里，我可以从离开自己如此远的距离来看

待我的婚姻，同时又如此无法理解自己的婚姻，以致它通过我的不理解终于变得反倒通俗易懂了。所以在这个令人大彻大悟的夜晚，我不得不明白了，是我妻子的**生存本能**让她道出了心里话。因为她的生存本能需要我的成功，来忘却她那与生俱来的非同一般的不成功。然而我本人却并不觉得这一可恶、不可理解、无法接受、绝不可能的不成功是失败，恰恰相反，倒认为可以说这是一种圣光，不对，这么说可是过奖了，还是称之为基督下凡时所伴随的那种易碎的贝壳发出的珠母闪光为好，这一点是在我们俩开始出名的瞬间，我不由自主地从她身上立刻发现的。那一时刻，随便在什么地方，比如在别人家里或所谓的社交场合中，她会突然从那人声嘈杂的高谈阔论中抽身而出，就好像从一堆丑陋、畸形、但却血缘相亲、有如一块活肉在呼吸并且就跟阵痛一样波浪般地一张一缩的乌合之众里忽然超尘拔俗了。于是，妻子如同避灾逃难一样离群脱身，仿佛涉过海水似的蹚过青绿色的地毯，把开膛破肚的海豚丢在身后，凯旋般却又哆哆嗦嗦地朝我踱来。而我呢，可以说我心里立刻不由自主地一动："多美的犹太女子啊！"……时至今日，我的眼前还常常浮现出我们在某些场合下会面的情景，次数很少，而且几乎每次都毫无例外的是我（前任）妻子主动提出的。我看着她那向前倾斜的头，浓密、发亮的秀发从她脸颊两边垂下。在咖啡馆的小桌上，她逐一向我展示镇静剂、安眠粉、安定剂和让人变傻发木的什么药物的配方，好让我做到在必须忍受的范围之内还可以忍受下来，同时，既然我已经必须忍受了，也好让我至少能够麻木不仁地去听、去看、去感觉我必须

听、必须看和必须感觉的一切。因为——这一点我还没说，不过我干吗要说呢——因为我非常清楚，自己为什么要作出一副好像这些描述除了与我本人还和别人有关的样子，尽管这些描述当然关系到别人。我写作，是因为我不写不行。我们写作，实际上就是进行**对话**——这句话我不知在哪儿读到过。只要还有上帝，那我们就完全可能与之**对话**，而现在，既然上帝没了，那我们再可能也只能同其他的人**对话**，或者运气好的话，就只跟自己对话，也就意味着大声或小声地自言自语，完全随心所欲。当然还有一点没提到的是，我妻子（早已是别人的妻子了）是个医生，不过也别那么当真，这一点我本来是无法忍受的，就连短时间也受不了。虽然她自己倒挺当回事的，就跟她对待其他任何事情都很认真一样，可她不过是个皮肤科大夫。是啊，每当她展示我的药方时（因为我非常阴险和卑鄙地剥削了她，从我们相当纯洁的偶尔幽会中受益匪浅），我心里都会——即便现在也仍然如此——都会感叹道："多美的犹太女子啊！"咳，我怎么现在就想这事了，没劲，我真替自己遗憾，替她遗憾，替所有的人和一切事物感到遗憾。不是那么回事，根本不像当时我想的那样："多美的犹太女子啊！"对，是我当时想的那样，自然而且下流，伴随着我雄性器官里的一阵刺痛感，像个耍大男子主义的恶棍，或者种族屠杀的刽子手，或者其他一切有同样念头的流氓所想的一样：多美的吉普赛女郎啊，多棒的黑美人啊，还有法国女郎，戴着副眼镜酷极了的，有大胸脯大屁股的、小胸脯大屁股的，等等、等等。如果说我对此还一无所知，那自己就这样被启蒙从而明白了：不仅大男子主义的

恶棍，不，**绝非**仅仅他们，这点不用说了，肯定的，而且大女子主义者也会有同样的想法，不过**同样**——或者说同样却方向相反——最终也是殊途同归，就像我很久以前在一家有灯光玻璃鱼缸的咖啡馆里所领教的一样。当时我正在等我的（前任）妻子，邻桌有两个女人——两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在聊天。就好像眼前的世界猛地一下绕轴翻了个底朝天，不过按单词的原义应该说，一种突如其来的人跌落时胃部产生的紧缩感，迫使我来了个向后转，把自己抛回了遥远的童年，让我重新陷入了自己强迫性臆想的老毛病，其根源始于，叫我怎么说呢，始于让人目瞪口呆、甚至是一辈子都让人目瞪口呆的一幕。后来，好些时候我老把这一幕和自己联想到一块儿，鬼知道为什么，因为灵魂那些本来透明的秘密谁又能真正看得透，而看透了的人，谁又不去积极地设法解脱自己，因为这些秘密不仅恶心而且还无聊。我的这种联想程度之深，以至于我认为都已经可以感觉到，自己是如何——即便不全是**真的**，只是为了玩弄一下这个空洞的字眼，现在，不过从感情上来讲的确如此——是如何成了这一幕情景中一个被看到的角色的。作为这个被看到的角色的**我**，在放暑假时被送到低地平原上一个尘土飞扬、空气污浊的小村里，在那儿我经历了这永世难忘的一幕。是的，当时我是第一次和犹太人生活在一起，我指的是真正的犹太人，而不是像我们这样的犹太人，什么城里的犹太人、佩斯[①]犹太人，其实都不是犹太人，当然也不是基督徒，可谓一类非

① 佩斯（Pest），原为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市的一个城区。

犹太的犹太人。他们毕竟还在赎罪日封斋，而且不管怎样至少守斋到中午。不过，姑妈和叔父，还有亲戚（我已经记不起他们和我们之间是怎样的亲戚关系了，我干吗要记得起呢，反正早就给他们在空中挖好了坟墓，他们化作烟云升天就行了），他们才是真正的犹太人，做晨祷，做晚祷，餐前也做，喝酒也做。此外，他们都是奉公守法的正派人。对一个来自佩斯的小男孩来说，他们当然是无聊透顶了。当时吃的东西很油腻，有烤鹅、巧伦特炖肉①、果脯蛋糕。我记得，当时战争已经爆发了。不过，**我们这儿**一切都还平静、美好，只是搞些灯火管制演习。在战火纷飞的欧洲，匈牙利是和平之岛，**这里不会发生**比方说在德国或波兰，或比方说在"被保护国波希米亚"，或法国、克罗地亚、斯洛伐克以及四周到处都在不断发生的事情。是的，这里不会发生这些事情，绝对不可能。然而，一天早晨当我无忧无虑地跨进卧室时，立刻被吓得虽然没喊出声但却内心惊叫着退了出来。因为眼前的情景让人不寒而栗，就像突然撞见了一个不堪入目的淫荡场面。对此，单凭自己这小小的年纪我就不可能有心理准备：**镜子前坐着一个身穿红睡裙的光头女人**，过了好一阵子我被吓晕的脑袋才反应过来，此人便是我的姑妈。可通常我总是——即便在那一事件②刚刚发生后也仍然是——看见她有一头棕色偏红的秀发，除了稀疏、僵直得有些独特之外，姑妈的头发没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当时我连大气

① 巧伦特炖肉（Tscholent），一种犹太风味菜肴，用肉和豆类菜蔬长时间文火烹制，可有不同花样。

② 疑指欧洲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反犹排犹事件。

都不敢出一口，更别提去发问了，于是便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她没发现我看见她的侥幸之上。此后，我终日生活在充斥着恐惧、秘密的阴暗紧张气氛之中。姑妈那近似于橱窗模特的裸露的光头先是让我联想到尸体，继而又想到夜里她在卧室里变成伟大婊子[①]的那副模样。直到很久以后，自然是又回到家里时，我才敢提起兴趣来发问，看看自己的所见是否属实，因为我自己都开始对此表示怀疑了。而父亲听后那笑开花的脸一点也没有使我平静下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可我总觉得这种笑很下流，下流而且损人，尽管只是损害自己。虽然这些话当时对还是小孩的我来说非常陌生，但是我就觉得父亲的笑很傻，因为他不理解我的害怕和恐怖，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伟大、有纪念意义的质变：姑妈平日的形象被**一个身穿红睡裙的光头女人取而代之了**。不，父亲根本没有理解我的恐惧。没理解不说，他还跟我解释，而他的解释我一点也听不懂，这倒反而——尽管是以极其惬意的方式——反而又增加了我新的惊恐。只不过摆不上桌面的恐怖事实——确切点说是赤裸、神秘且无法探究的事实的真实性——这事实是：父亲解释说，姑妈和亲戚们是**波兰人，波兰**妇女出于宗教的原因都剃光头并戴被叫做**沙特丽**的假发。后来，我的犹太人身份日渐重要，因为越来越明显的是，普遍看来仅此因素就可以招致杀身之祸。这时，我突然一下子发觉——可能只是为了从其必要的特殊性，

---

① 指传说中古代巴比伦身穿猩红服饰、浓妆艳抹、下跨红毛怪兽的风尘女子形象，是乱世之中社会风气堕落的象征。

或者至少以人们普遍认可的观点，来看待这一无法理解而且奇怪的事实，即我是犹太人——我忽然发觉，我肯定已经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了，那**坐在镜子前的身穿红睡裙的光头女人**就已说明了问题。尽管这一切令人不愉快，特别是还不太好理解，但又都是明摆着的事实。我这实在令人不愉快，而且特别是还不太好理解的处境，说得难听点就是属性，便因此打上了最终的烙印，并永世不得翻身。可最后的结果证明，我不需要这个定义，原因很简单：我与这一思想概念，即与我犹太人身份的思想概念和平共处了，尽管我也正在逐渐地、慢慢、慢慢地、一个接一个地与其他不愉快而且特别是还不容易理解的思想概念和平共处。当然这是某种黄昏时的平安和宁静，想必我知道，一旦我停止存在，这些令人不愉快的、特别是不容易理解的思想概念也将停止存在。但在此之前它们还大有用场可派，其中首先自然是我这一令人不愉快、让人不容易理解的犹太归属之事实构成的思想概念，而且此外，这偶尔还是个有点生命危险的因素。不过对我来说（而且我希望，不，我坚信，在这一点上**绝非**每个人都会赞同我的观点。我认为，会有几个人生我的气，不，我甚至真心地希望，他们直截了当地唾弃我，尤其是那些亲犹和反犹分子），如前所述，对我来说此事的实用价值恰恰在于，它也只能在此意义上为我所需，别无他用，即：作为一种令人不愉快、特别让人不容易理解的事实构成，而且此外这还是一个有点生命危险的因素，也许仅仅因为其危险性我们**就得努力去喜爱这一事实**。据我们所知，就我本人而言，虽然我根本不觉得有任何理由要这么做，也许是因为自己长期以来已经

不再去追求与人、与自然或者只与本人自己和谐相处。我更愿意把这看成是一种道德上的悲哀，是一种令人作呕的性变态，就像是一种奥狄浦斯的恋母情结，或者一对丑兄妹间的血亲乱伦关系。是啊，我就这样坐在有灯光玻璃鱼缸的咖啡馆里，等着我（以前的）妻子的到来，盼望着她又带来一大堆新药方，而根本没去关心自己那令人不愉快而且主要是不太好理解的、此外偶尔还会有生命危险的存在。这时，我的邻桌有两个女人在聊天，于是我可以说是不由自主地开始侧耳倾听，因为她们俩都很漂亮，一个头发偏金黄，另一个则偏棕褐色。好几次破坏自己乐趣的企图都枉费心机了（此话点到为止吧），悄悄地，我默默并且很认真地关注自己的血液流动和那些吓人的噩梦；悄悄地，我依然还是爱漂亮的女人，可谓痴心不改。这种爱欲带有一种坚定不移和无懈可击、比方说自然而然的倾向，虽然它白白地浪费了一副庸俗易懂的表情，可本质上却神秘莫测，因为这欲望几乎独立于我之外而存在，而且在这点上还时常令人恼火并绝对不会轻易和你妥协。比方说就像我热爱梧桐树一样，喜欢那粗壮、布满斑块的树干，迷恋那动人、奇妙的枝桠，钟情那脉络分明的硕大叶片，这叶子一到相应的季节便如同一只只沮丧的手垂悬下来。那两个女人的交谈显得非常私密，可以说充满了隐晦色彩而且声似耳语，这立刻让人猜到她们所谈的话题一定非同小可。尽管自己属于被动参与，但还没等我开口加入她们的谈话，就已听见了这样几句："……所以说我不知道，我不可能跟一个外国人……跟一个黑人，或一个吉普赛人，或一个阿拉伯人……"话音到这儿戛然而止，不

过我想，说话人只是在犹豫，因为我的语言节奏感告诉我，她还没说完，肯定没有，一定还有话要说出来。于是，我开始在椅子上急不可耐地蹭来蹭去，因为我当然非常清楚，那欲言又止的几个字是什么。我想，既然她需要这么长的时间来绞尽脑汁，那我马上就可以给她点提示。后来，她终于艰难地说了出来："……或跟一个犹太人，"接下来的这一刻，完全出乎意料，虽然自己本已对此有所预感，而且早就等候着、窥望着，甚至几乎是催赶着这话的出笼，可我眼前的世界还是伴随着突如其来的胃部紧缩感猛地一下绕轴翻了个底朝天。而且我想，如果我现在去看这个女人，那自己马上就会变成**一个坐在镜子前的身穿红睡裙的光头女人**。我想，中了这一咒语是无可救药的，我想绝对没有。我觉得，自己看到的唯一出路就是立刻从桌边起身，然后，我想，走上前去，要么给这女的一记耳光，要么就操她。不用说，两件事我哪件也没干，就跟我没有做那么多我原来想必须做而且通常都还有理由做的事情一样。这甚至连那种绝对命令①都算不上，违抗这种命令会让我更有理由摇头说不。我的冲动几乎尚未复苏就已经熄灭了，此外，朦胧模糊的身影又在向我靠拢，伴随着的是一些令人厌恶但却并不陌生的念头——我干吗要说服那两个女人去相信什么呢，或者说也是让自己去相信什么呢，我不是早就相信一切了吗。我做自己不得不做的事，尽管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得不做，我

① 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伦理学原则，认为人必须无条件地遵守一种意志或行动的准则，同时这种准则也永远能够成为所有人都应奉行的普遍立法原则或普遍道德规范。

却仍然抱着希望甚至凭着觉悟在做，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不必再不得不做什么，可以四肢舒展地躺在自己宽大的卧榻上，当然是在不得不为此工作之后。有人对我嘘声嘲弄，说我是在自掘坟墓。现在，虽然岁月蹉跎——噢，上帝！——可我依然挖墓不止。随后妻子也来了，我情绪一阵轻松并且立刻可以说不由自主地心里一动："多美的犹太女子啊！"只见她仿佛涉过海水似的蹚过青绿色的地毯，凯旋般却又哆哆嗦嗦地朝我踱来。其实她就想跟我聊聊，因为她已经知道，我就是我这样一个人，职业：作家兼翻译家。我（当时未来、现在前任的）妻子说，她读过我的"一些东西"，而且**无论如何**都要和我谈谈这些东西。那会儿她还很年轻，比还算不上真正老的我小 15 岁，尽管我当时跟以往一样，年纪也已经够大的了。喏，此刻她就在我眼前，还是那个夜晚，那个让我大彻大悟、那个被闪电照亮了的伟大夜晚，也是那个以后而且是很久以后给我呵护的黑暗之夜，正可谓：**我问自己，为何梦想着那支歌，把那些寂寞夜晚熬过……而今我又和你结合**。我独自吹着口哨，同时又惊奇地发觉，自己居然会吹口哨，而且吹的还是我们一直吹的《星尘梦幻》[1]，尽管我一般只是常吹古斯塔夫·马勒[2]的曲调，不吹别的，就吹他的第九交响曲。我感觉，这一切都是次

---

① 美国作曲家卡迈克尔（Hoagy Carmichel，1899—1981）创作的一首经典乐曲，20世纪初曾风靡欧美，广为流传。

② 马勒（Gustav Mahler，1860—1911），奥地利作曲家，曾求学于维也纳音乐学院，后在欧美各国担任过乐队指挥，1907 年任维也纳皇家歌剧院院长，其作品以交响曲为主，共有十部。

要的。倘若没有人偶尔知道古斯塔夫·马勒的第九交响曲并且又刚好有这方面的好奇心，可以从该乐曲的氛围里正确、完全合理地推断出我的心态那该多好，倘若我发出的这些反正可以让人从中得出必要结论的第一手信息不足以别人洞察我的内心世界又该多好。**当我们的爱情还新鲜时，每一次亲吻都是意外的惊喜……**

“不要！”我内心咆哮、哭嚎着。我不想回忆，不比方说，不想代替在这个穷地方连作为紧俏货都鲜为人知的“麦德林”婴儿饼，去浸蘸“咖尔松”牌的袋泡茶，尽管我当然很想回忆。可是现在，无所谓想还是不想，我反正别无选择。如果我提笔写书，那就是回忆，而且是必须回忆，即便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必须回忆。显然这与知识密切相关，回忆就是知识。我们活着就是为了回忆这种我们的知识，因为我们无法忘记自己知道的东西。用不着害怕，孩子们，别去想什么“道义”问题，千万别，我求你们了，**我们根本没有选择的自由**，我们**无法**忘记，而且天生如此，活着，就是为了认知世界并有所回忆。也许、或者很可能、甚至几乎肯定，我们在认知世界并回忆过去，其原因在于为了使某个人——管他是谁——使他因为我们害臊，如果他已经创造了我们。不错，我们是为了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的这个人而回忆的，然而这太单调了，因为此人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最终的结果都一样，其实质在于，我们在回忆，我们认知世界并回忆这种知识，好让人，好随便让什么人，去因为我们而且（也许）替我们害臊。因为，至于我嘛，那就假设先这样开始，于是，从我那享有特殊地位的、庄严的、几乎应该说是从我那被

神化——既然已经使用了这样的神圣词句，那就是说：从那被人类黑弥撒[①]神化、甚至被圣化的回忆中则会逸出气流，铿锵的软颚音便随之抖动：**他还活着呢**[②]，这个华沙幸存者的最后祷告也将在残喘中逝去，随后世界末日的狂啸呼号突然轰鸣而响……接着，那天天变换更新、比方说藏而不露的惊喜便纷纷扬扬地落下：瞧，我的确还活着，甚至还一直呆在那儿，尽管我不知道为什么，纯属偶然，如同我来到这世上的方式一样，我完全只是一个自己幸存的帮凶，就像我也是自己出生的同谋。好吧，我承认，劫后的余生里比出世的诞生中多了少许耻辱，尤其是在我们还要为此余生付出自己力所能及的一切的情况下。然而一切仅此而已，再没有别的了。我不愿意天真地去相信那些普遍的矫揉造作的幸存者效应和光彩耀眼的漫天胡吹。噢，上帝！**人多少总会有一点罪过的**。就这样，我得以幸存了。所以我是，我想，不，我什么都不想。我只不过像那个华沙的幸存者一样，是个布达佩斯的幸存者而已，没有利用自己的幸存者身份大做文章，也不觉得有必要替自己的幸存辩护，更没有把世俗的想象和这幸存接轨，也就是说将其转化为辉煌的胜利，即便这一胜利还相当的寂静、相当的秘密和隐私，但本质上却是唯一**真正**、唯一**可能**的胜利。它延长并加倍复制了后续的生命，从幸存中继续幸存，于是，仿佛我幸存的生命就蕴涵在或曾孕育在后代而且是一个后代的身上，即在你的身上——不，我没有想过这些，

---

① 指异端邪教为崇奉魔鬼而举行的类似基督教弥撒仪式的活动。

② 这里暗示德语的发音，影射当年德国士兵射杀波兰一知名人士后，还去用脚踢其尸体时发出的贼叫，此话后被写入诗歌，成为控诉纳粹暴行的名句。

也没去想要对此非想不可，直到那个夜晚向我袭来，那个照亮一切却又黑暗无比的夜晚，直到那个问题在我面前（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在我身后，在我早已活过的生命之后，因为谢天谢地这已经太迟了，而且以后永远都是为时已晚）浮现，这个问题就是——你会不会是个黑眼睛的女孩，小鼻子周围撒满了星星点点的浅色雀斑？或者是个顽皮的男孩，长着一双活泼而硬朗的眼睛，恰似灰蓝色的鹅卵石？——是的，**把我的生存视为你的存在之可能**，就这样注视，严格并悲哀地注视，没有脾气也不抱希望，就如同在注视一件物品。刚才说过，我什么也没想，尽管我——正如刚才所述——本来倒是应该想点什么，因为暗地里正在实施一项鼹鼠工程，刨的刨，挖的挖。我本该知道此事，当然我是知道的，只不过我把它当成了另外一回事，与实际情况风马牛不相及。那我把它当作什么了？我不知道，可我怀疑，自己把它当作了某种鼓舞人心的勤奋劳动，恰似那种瞎了眼的老头子，以为铁锹丁丁、嚓嚓之声是从为了争田夺地而进行的挖渠引水工程中发出来的，殊不知那儿其实正在修筑坟墓，而且就是为他修的。我突然发觉，我之所以写作，是因为我不得不写，尽管我并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写。事实上，我惊讶地发现，自己不停地以一种疯狂的勤奋在工作，而且一直只知道工作，但这并非仅为功利之心所迫，倘若我不工作，那就只是**活着**，如果只是活着，那么不知道这种活法会迫使我去干什么，当然不知道更好，即便我的细胞、我的五脏六腑肯定早已有所预感。所以我才不停地工作。只要我工作，我就存在；假如我不工作，谁会知道有我这个人的存在呢，所以我对此很看重，而且也必须看重，因为

在我的工作与我的继续存在之间有着最最重要的联系，这是件显而易见但却绝非普通的大事。当然，还有别人也在写作，而且这样的人还数量众多，因为他们不写也不行。不过，并非每一个写作的人都必须写作。我是的确而且真的必须写，我不知道为什么，似乎老天爷只给了我这么一种解决办法，尽管它什么也解决不了。但另一方面这种不解决问题的解决办法却没有——呐，该怎么说呢——却没有在不解决问题这点的程度上对我有不利的影响。我不得不把这种不解决问题本身既当作一个解决办法又看成一个没解决的问题，以致我因此撇开不解决问题这点不谈，心里也还会老惦念着这不解决问题的性质尚有可以努力改进的余地，而这种余地足以让人产生更大的奢望。回头看看走过的路，也许我曾把写作当成了一种逃避（当然不是完全没有原因的，也许我本想逃奔的方向、逃奔的目标并不是我真正抵达或正在逃往和将要逃往的目标），这种逃避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拯救性的逃避，它拯救的是我自己，并通过我自己去拯救我的物质甚至——说句大话吧——甚至我的精神世界，同时帮助我们向某些人——随便哪些为我们而且（也许）替我们感到羞愧的人——向他们对这一世界作绝对必要的**揭示**。所以那个夜晚无论如何都得降临，以便我在黑暗中终于看见光明，除了别的也看见我工作的性质，其实它就是挖掘，就是对那座坟墓的继续挖掘，这座坟别人已开始替我在空中修筑，就因为他们没有时间来完成这一工程，所以纯属举手之劳，没有半点嘲讽的意思，哪能呢，就这样漫不经心、看都不看一眼便将工具塞到我手里，扔下我不管，好让我尽力把他们未收尾的工作做完。所

以，我所有的认识最终都归结于这一认识，而且我所做的一切，在我内心也都归结为将我导向这一认识的知识，包括我的婚姻，也包括下面我的所作所为：

“不要！”我顿时、立即且毫不犹豫地说，某种程度上是出于本能，是啊，还是凭本能，首先只是本能，即便这种本能原本与我的自然本能针锋相对，不过将来会——甚至已经——成为我的自然本能、甚至我的本性。这一声“不要！”并非一种选择，并不意味着似乎我能够自由地在“要”与“不要”之间进行权衡——好像我曾能够自由作出这种选择似的。其实不对，这一声“不要！”所作的选择，是一种认识，而不是我所作或所能作的选择，相反，不如说它是一种**对我的选择**，或者说根本不是选择，而是我本人判断的认识。它至多能在我没有对这一选择作相反的选择这一行动上可以被视为选择。否则的话，这就毫无疑问地成了一种阴差阳错的选择，因为人怎能作违抗命运的选择。使用这个夸张的词，是因为我们对此的认识，即对命运的认识，大都属于我们最肤浅的认识，也就是对我们自己的认识。我们自身是一种暗藏杀机并不断和我们对着干的因素，这一因素对我们很陌生，同时我们也被有意地与之拉开了距离，而且对其淫威恰似嗤之以鼻地毕恭毕敬，正是这一因素被我们如此再简单不过地称为我们的命运。假如我不想将自己的生存只看成是一种继我的出生这一身不由己的偶然事件之后接踵而至的一系列身不由己的偶然事件之组合——这种看法，怎么说呢，绝对是一种相当有失身份的生命观——而相反认为这是一系列认识的组合，其中可以让我的自豪感而且至少让我的自豪感得到满

足，这样的话那个当着奥普拉特博士的面——我甚至可以说是在奥普拉特博士的协助下初具轮廓的问题：**将我的生存视为你的存在之可能**，便会在并排罗列的认识之光中和流逝的时间阴影里发生以下一劳永逸的变化：**将你的不存在视为对我的存在之残酷且必要的消灭**。因为只有这样，所发生的、我所做的和所遭受的一切才有意义，只有这样我这毫无意义的生命才有意义，而且我正在继续进行的、已经开始了的也就是生存和写作，其实是一回事，两者都包括在内，才有意义。因为我的铁锹就是圆珠笔，如果我朝前望，看到的只是背后；如果我盯着稿纸，瞧见的只是过去：**她仿佛涉过海水似地蹚过青绿色的地毯**，她说，她想跟我聊聊，因为她已经得知，我就是我这样一个人，职业：作家兼翻译家。她读过我的“一些东西”，而且**无论如何**都要和我谈谈这些东西。我们也就聊了起来，一直聊到了床上——哦，上帝！——，我们完事后、干事时也聊，一直不停地聊。就是这样。我记得，她一开始问我，先前说的话是不是当真。我回答说，我不知道自己先前说了什么，因为我的确也不知道。我说了那么多东西，而且正准备像俗话说的“以法国人的方式”不告而辞，因为这种讨论从先前一开始就让我感到紧张和无聊。在谈话当中，我在自己惯常且讨厌的强迫倾诉欲的驱使下，说的是说过的话，而驱使我倾诉的这种强迫症，往往是在我不想说话时向我袭来，要是允许我把这一悖谬加以发展的话，其实可以说这种倾诉欲只是一种有声的沉默，一种发音的沉默。于是我就请她帮我回忆，她便提示了几条线索，其说话的方式几近严厉、刻薄，而总体上又显得有些压抑、不安和亢奋，且说话的声音低沉、

沙哑——这是一种转化为或者说升华成知识分子派头的、或者说干脆用知识分子的派头加以伪装的性压抑的体现。我轻松而且胸有成竹地这样想，尽管这种自以为是一贯导致我们出错，这是一种铁了心的盲目，它总是阻碍我们从眼前看到后来，从偶然里认识必然，从见面中发现冲突，冲突的结果便是，至少有一方会像部破车歪歪斜斜地继续前进。一种性的压抑——我本能、猥琐地思忖着，很简单，我就是在琢磨，我们应该如何将自己的性压抑加以转化、升华或者伪装。对了，就在此刻，在我深沉、黑暗的那个夜晚，与其说我听到不如说我看见了社交聚会上的交谈，看见了我周围那些忧伤的面孔，不过每人都戴着他们当时扮演的角色的面具，有笑的，有哭的，有狼，有羊，还有猴子、熊、鳄鱼，一帮乌合之众在那儿小声地叽里咕噜，就像在末日的渊薮里，主要角色们跟伊索写的恐怖故事一样，在接受最后的历史教训。有人突然冒出了一个令人伤心的念头，让每个人都说出**自己曾在哪儿呆过**，于是，一个个地名便开始像纤弱、零星的雨点从一块飘过的浮云中洒落下来：毛特豪森、顿波根、雷斯克、西伯利亚、总合监狱、拉文斯布吕克、弗乌特卡、安德拉斯乌特60，接着还有作为流放地的村庄的名字，1956年后的监狱，布痕瓦尔德、基斯塔克萨。当时我真害怕该轮到自己开口了，幸好有人抢在了我前面："奥斯威辛"——一个谦逊却极为自信的胜利者的声音响起，大家都点头服输。"没人比得过了"，主人的语气虽然半嗔半妒，不过到头来还是一脸赞许的微笑。随后又提到了当时极为流行的一本书和书中极为流行的一句话，这书过去、现在而且肯定将来乃至永远都会畅销，作者正经八百却当

然又是无济于事地清了清嗓子，然后压抑着内心的激动，用沙哑的声音说："对奥斯威辛没有解释，"就这样，言简而感动，声音轻微而又无可奈何。我记得，自己当时惊讶地观察到，这些大多极为精明的社交人士是如何接受、分析和讨论这一简明单纯的句子。他们躲在面具后面，一边狡黠或者优柔寡断或者让人不解地眨巴着眼睛，一边左顾右盼的窥测动静，好像这一将所有的陈述都扼杀在萌芽状态的陈述句表达了某种意思。虽然我们不必非得当维特根斯坦①才能看出，这个句子在语言逻辑方面就是错的，其内涵最多也就是反映了愿望和虚伪或者诚实、幼稚的道德观念以及不同的压抑情结，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表述的价值。我记得，这话我也讲了，然后就只是一个劲地说，越说越多，没完没了的，简直口若悬河，像得了强迫倾诉症一样。于是，女人的目光便不时朝我聚焦，她们紧紧缠在我身边，贪婪地吸吮着，仿佛要使我身上的泉眼沸腾起来。在强迫症似的倾诉过程中，我说，我突然想起来了——草率马虎、很可能词不达意而且充其量也就是反映了愿望和不同压抑情结的那句话——我想起来了，说这话正是她，我后来的妻子，此前的情人，不过我是在这次交谈后才认识她的。当时我疲惫不堪，羞愧不已，脑子里一片空白，正准备悄悄地（像俗话说的"以法国人的方式"）开溜，而她则仿佛涉过海水似的正蹚过青绿色的地毯。就是自己曾说过的那些话，我现在也都记不起了，显然我曾将

① 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哲学家、逻辑学家，生于维也纳，早年在剑桥大学求学，后加入英国国籍，在语言逻辑学和哲学领域造诣颇深。

自己的观点付诸言表，而这种观点显然自被表达以来，即便有变化，那也没能有太大的改变。但我相信，我的观点根本就没变，只不过我今天更不愿将其付诸言表罢了，大概我对自己观点的轻度怀疑就是因此而来。我为何、为谁、尤其是在何处应该将我的观点付诸言表？我又不是常常泡在中部山区的某座疗养院里，好为了在和奥普拉特博士以及同类的高级知识分子的交际中，用表达观点的方式来打发那不愿流逝的时光。现在的确不是这样。我经常——或者说差不多经常——呆在一座住宅楼第 14 层的这套我差点称之为寓所的一间半房里，呆在我——上帝啊，饶恕我这么说吧——呆在我的寓所里，呆在我那一度充满阳光、一度通风透气（有时二者兼备）的窝里。从那儿我可以抬头仰望发亮的天空，或者将目光投向云层，在云中我用圆珠笔辛勤地挖掘自己的坟墓，就像个服苦役的劳工，每天听着哨音的指令，把铁锹挖得更深，将小提琴拉得更低沉，让死神之曲听起来更温馨。如果要在这儿将观点付诸言表的话，那只能把话说给呜响的水管听，说给呼噜叫的暖气管听，说给哭闹的邻居听。在这约瑟夫施塔特[①]的心脏，什么心脏，更应该说是直肠，在这高耸的住宅楼里——这高楼从蹲在地面上的市区里突兀地拔地而起，看上去活像一根超大的人造阳物——就在这样一座楼里放眼窗外，我的目光至少还能越过那道旧篱笆墙——真是不可思议，这墙居然还一直立在那儿——看见荒芜的花园里那点可怜的秘密，那可是我孩提时代为之激动万分

① 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一个城区。

的源泉。可现在却不再令人兴奋，甚至让我觉得特别无聊。其实我的那些想法也同样乏味，诸如自己基于某种情况（离婚、偏爱最糟糕但绝非同时又总是最简单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再如眼下自己并非腰缠万贯的现实），也就是说基于某种情况，我又重返此地，回到这个自己度过了童年时代里几个悲惨的寒暑假并且积累了童年时代里一些悲惨经验的老地方。当然我还抱着这样的想法，诸如自己可以在这儿——只要必须活下去的话——可以在这俯瞰自己童年的14层高楼里重新开始生活。气人的是，往事的追溯、简直无足挂齿的童年回忆，接二连三地向我袭来，过去是难以回避，现在成了独家专利。然而，这些回忆很早以前就把一切该完成的任务都完成了，那些卑鄙下流、像鼠啮一样无所不伤的内容都已完成了历史使命，大概现在终于可以让我心如止水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可到底回到哪儿来？回到我的观点上来——噢，上帝！——当时我蛮可以说，这个句子单单在形式上就错了，即那句“对奥斯威辛没有解释”，因为本来但凡**存在**的事物总归是有解释的，即便这解释按其自然本性纯属任意杜撰、误导视听和并非天衣无缝。但事实上，一个事实至少有两条命，一条是实在生命，一条可以说是精神生命或者一种精神的存在形式。这不是别的，就是一种解释，是一大堆解释，是甚至能把事实解释到不复存在的解释，也就是说这种解释可以最终消灭或者至少掩盖事实。那句倒霉的“对奥斯威辛没有解释”本身也是一种解释，那个倒霉的作者想借此说明，我们最好还是对奥斯威辛保持沉默，与其说奥斯威辛现在不存在，倒不如说它过去曾经存在过，因为只有对现在不存在

或者曾经不存在的事物才没有解释，不对吗。我蛮可以说，然而奥斯威辛曾经**存在**过，或者更确切地说现在依然**存在**，这就意味着对奥斯威辛也有解释。相反，恰恰没有解释能证明奥斯威辛不曾存在过。这就是说，不可能找到有关奥斯威辛不曾存在、奥斯威辛不曾形成、世界精神没有在“奥斯威辛”这个名字的事实里得到体现的解释（在此也要向奥普拉特博士顺致崇高的敬意）。是的，恰恰没有解释能证明奥斯威辛不存在之说，因此奥斯威辛很久很久以来就一直悬而未决地浮在空中，谁知道有多久了，没准已经飘了几个世纪，如同一个经无数罪孽之光照而成熟的黑果，在伺机砸到人们的头上。说到底，事实就是事实，既然已经成了事实，那就无法回避，因为事实就明摆在那儿：世界历史是理性的表象和其行为的结果（援引自 H[①]），因为如果我要把这个世界视为一系列身不由己的偶然事件之组合，那这就是一种——现在看来——的确是一种相当有失身份的世界观（援引自我）。我们不可以忘记：谁理性地看待世界，**世界**也会理性地看待谁，两者相互作用——这又是 H 说的，不是那个当元首和帝国总理的 H，而是那个了不起的预言家、哲学家、宫廷活宝以及为所有元首、帝国总理和其他挂名篡权摄政者们提供琼浆玉液的御用掌酒官 H。正如我所担心的，他说的还全都在理。我蛮可以说，我们只需深入地研究一下细节问题，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理性，其表象和行为结果会成为世界历史，此外再搞清，到底**谁的**理性也会理性地看待世界，然后就会明白这两

① 疑指黑格尔。

者之间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相互作用——遗憾的是它们的确也如此行事。至于奥斯威辛吗,我蛮可以说,既然我从前是这样的观点而且现在的观点也依然如故,那么按照我的观点,对奥斯威辛的解释则藏在我们每个人各自的生活里,而且它只存在于我们各自的生活里,不在别处。按我的观点,奥斯威辛从具有某种组织性的特征这点来看,是我们每人各自生活的表象和行为的结果。我蛮可以说,如果整个人类全都开始做美梦的话,那么像穆齐尔[①]的长篇小说**《没有个性的人》**中莫斯布鲁格尔那样的风流潇洒的性变态杀手绝对就会降临人世。是的,把单个的生活作为一个整体,大概还要加上将这一整体展开的技术——解释就这么些,多的没有了,别的也不是。**凡是可能的事,都会发生,凡是发生的事,皆为可能**,这是K[②]说的,那个伟人、悲观主义者、智者。他早已从我们每人各自的生活中得知,如果犯罪的疯子理性地看待世界而且**世界**也以此相回报——也就是对其俯首帖耳的话,那将会出现怎样一种情形。我蛮可以说,你们别讲,这一解释只是一种让事实本身来解释事实的毫无意义的赘述,因为这的确就是对此的解释。尽管我明白,你们很难接受被一帮邪恶的罪犯所统治这一事实,此外,即便你们将其视为而且也这么称为邪恶的罪犯,也还是难以接受。我蛮可以说,一旦这罪犯没进疯人院或者监狱,而是跻身于帝国总理

---

① 穆齐尔(Robert Musil,1880—1942),奥地利小说家,擅长心理分析的描写手法,小说《没有个性的人》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莫斯布鲁格尔是书中一专门残害妇女的性变态狂。

② 此处疑指康德。

府或者别的什么元首大本营，那你们就开始在这邪恶的犯罪中去寻找那有趣、精彩和非凡的东西，就连这点你们也不敢说出来，可事实就是如此：问题在于需要这种举足轻重的人物，有了他就不必自己把自己看得那么渺小，不必把自己的世界史看得那么丑陋。是啊，好让你们能理性地看待世界，也但愿**世界**会理性地看待你们。而且这是不言而喻的，甚至是合情合理的，即便你们的方法不像你们所希望的那样"科学"和"客观"。是的，只要这愿望是为了重新建立一个合理、意即可让人生活的世界秩序，那这就是最纯粹的虚构编造和道德说教。那些被逐出世界的人便可通过这些大门和后门重新悄悄地溜回这个**世界**，至少那些对此有兴趣并觉得这个**世界**将来会成为人类的一席之地的人会这么做。我蛮可以说，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糟糕的只是这样一类的神话定会诞生。我们从这些科学的恐怖小说里可以得知，比方说那个伟人战术意识非常出色，不是吗，好像不是每一个妄想狂和狂躁型精神病都用其出色的战术意识误导其医生和自己周围的人，并将他们逼至绝望的地步似的。然后我们还可以得知，当时社会情况正好如此这般，况且国际政治更是如此这般，哲学、音乐和其他那些花里胡哨的艺术已经败坏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不过我们主要得知的是，那个伟人最终——实话实说——最终的确是个**伟人**。他身上具有某种诱惑人、某种迷惑人的东西，说得干脆点，就是具有某种魔鬼般的东西，的确如此。他具有一种超凡的魔力，让人简直无法抗拒，更何况人们根本就不想抗拒，因为大家都正在寻找这种魔力。我们早就唯独还能借助魔鬼来充分体验自己那些可憎的欲望了。当然，我们

需要的是一个能让其相信**他**自己就是那个可以肩负我们身上一切人之恶的魔鬼，就像一个反基督教的人却获得了一枚铁十字勋章。而且他还斯斯文文地从我们的利爪下蠕动出来，以便跟斯塔夫罗金[①]一样提前上吊自杀。我蛮可以说，是的，那些被你们视为而且也这么称为邪恶的罪犯的人，你们从他们握住象征着帝国权力的宝杖和金球那一刻起，就立即开始对其顶礼膜拜，甚至是一边辱骂一边还要五体投地，你们历数种种迫不得已的实际情况，并且说，他们**客观上**对的地方，**主观上**相反则不对；**客观上**能够理解的东西，**主观上**却不能理解；哪些阴谋在幕后进行，哪些利益牵涉其中。你们会乐此不疲地解释，仅为了拯救你们的灵魂和那些还能拯救的东西，仅为了共同去抢劫、去杀人、去出卖灵魂。我蛮可以说，我们所有的人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从某种程度上正在参与或曾经参与过这些活动，我指的是所有在场的、在世界大事那辉煌灿烂的舞台上抛头露面的人！是的，这样好让你们从**片甲不留**的破船沉舟中能捞到点真相实情，也是为了你们无需再去探视自己前后左右四面八方呈现的深渊，无需再去看我们这一无所有、空空如也的真实处境。你们为之效劳的不是各个统治阶级各自的本性，而是那个统治阶级，即那个既不是必要也非不必要的统治阶级之本性。那只是一个决定，一个在我们各自生活中作出或没有作出的决定的问题。统治阶级既非妖魔鬼怪，也非因神秘莫测而尽显魅

---

① 斯塔夫罗金（Nicolai Stawrojin），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恶魔》中的主人公，原为纨绔子弟，因失去信仰、愤世嫉俗而醉心于为非作歹，企图以此改变世界。此人集罪恶与魅力于一身，成为该作家创作的典型文学形象。

力，更不具有强大的带动力。是的，他们就是坏，就是嗜杀成性、就是愚钝和虚伪，即便在他们最有建树的时代，也只不过是其组织工作做得好点儿罢了。是啊，他们主要是不认真，因为自从这儿、那儿以及其他好多地方都开办了杀人工厂以来，就意味着任何需要认真对待的认真之终结，而且是长期的终结，至少是那种和对统治阶级、对任何统治阶级的想象联系在一起的认真之终结。我蛮可以说，你们别再说什么对奥斯威辛没有解释了，什么奥斯威辛是一个用理性无法理解的非理性力量的畸形产物，因为对丑恶的事物总会有个理性的解释。很可能撒旦本身没有理性，就像埃古①一样，可他的创造物却很可能具有理性。这些产物的所有行为都可以像数学公式一样推导出来，从某种利益里、从利欲中、从惰性、从权欲和情欲、从胆怯、从满足某一或某些本能的欲望中推导出来，以致最终从某种妄想、偏执和狂躁忧郁症、从纵火癖、从性虐待、从色情谋杀、从受虐狂、从造物主似的或者别的什么人的狂妄自大、从恋尸癖、从无数变态欲望中谁知道有多少的变态欲望里的某一种反常欲望，也许是同时从所有变态的欲望中推导出来。然而，我蛮可以说，你们可得注意，因为真正非理性的和确实没解释的事物并不是恶，恰恰相反，而是善。正因为如此我早就对什么元首、帝国总理以及其他挂名的篡权摄政者不感兴趣了，不管你们能讲出多少他们精神生活的轶闻趣事来都没用。是的，很久以来独裁者

---

① 埃古(Jago)，莎士比亚名剧《奥赛罗》中的人物，该角色因在剧中挑拨离间，诬蔑奥赛罗之妻苔丝德蒙娜对夫不忠，致使奥赛罗错杀妻子，而被视为魔鬼、恶人的象征。

们的生活已引不起我半点兴趣，而唯一还能让我为之动心的是圣徒的生活，因为我觉得这有意思而且不可思议，对此我找不到纯理性的解释。不管这听上去多像一个苦涩的笑话，可从这一观点来看，奥斯威辛全然证明了它本身是一值得采取的举措。也许你们对这方面的事已经听烦了，但我还是要给你们讲个故事，如果可能的话，请你们在此之后对其作一解释。既然面对的都是清一色的老油条，那我就长话短说，无庸赘述，只画龙点睛地提几个词条，如集中营、冬天、运送病人、运牲口的货车、只有一顿冷饭的配给；虽然车要开谁知道多少天，可口粮却是以10份为一组来配给的。我躺在一个被当作担架的木头框子上，睁着一双饥饿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一个人，确切点说是盯着一副骨头架子，因为我的那份口粮落到了这个不知为何被称为“老师”的人的手中。不一会儿，大家被塞进了火车。在核对口粮和人数时，押车的自然是怎么数也数不对，于是破口大骂，混乱中我挨了一脚，接着就觉得被人拎了起来，扔到了下一节车厢的门口。“老师”和我自己的那份配给早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了，行了，这已足以让你们精确地想象出当时的情景，也能想象得出我内心的感受：首先我没有任何吃的可以喂那只老是折磨我的饿魔，这家伙早就成了我身体之外一头咆哮觅食的野兽；同时还有另外一只野兽也开始呦呦鸣叫，它就是希望，其声音此前一直很压抑、低沉，但却不停地打着呼噜，因为总还有一线生机。但眼下看来，在没有口粮的情况下，这种机会转眼间一下子成了大问题；另一方面那位“老师”的幸存机会——我非常冷静地给自己分析——则因为有了我的定量而正好增加了一倍。我

想，原本我这段干粮的故事也就到此结束了。怎么说呢，虽然自己心里谈不上非常高兴，但倒也觉得此事合情在理。然而，几分钟后我看见了谁？那“老师”一边呼喊，一边手足无措地东张西望、跌跌撞撞地朝我这边跑来，手里拿的正是我那份冰凉的干粮。当他发现躺在担架上的我时，便赶快把干粮放在我肚子上；我想说点什么，显然，当时我肯定是一脸无法掩饰的惊诧，因为——虽然他已经在往回赶了，但还是在清点人数时被发现没在原位，结果被打死了——因为他带着那张视死如归的小脸上明显流露出的愠怒说：“你以为我是那种人吗?！……”故事大致如此。尽管我真的想把自己的生存不仅仅视为继我的出生这一身不由己的偶然事件之后接踵而至的一系列身不由己的偶然事件之组合，因为这的确可能成为一种相当有失身份的生命观，那么我也不太想持有这种看法，即认为似乎这一切的发生仅仅是让我捡回了一条性命，因为这样的话我的生命观就显得更加有失身份。尽管事实的确如此，比方说“老师”做了他做的事，好让我能活下来，然而这只是我的观点，因为他做此事的出发点显然另当别论，显然他首先是为了能保住自己的性命，同时顺便也为我的幸存做件好事。这就是问题所在，如果你们能够的话，请给我个解释，说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不过请别用语言说，因为你们自己很清楚，形象地讲，言语在某些情况下遇到某种温度时，便会失去它的实质，失去它的内容和意义。它会轻而易举地化为乌有，在一种这样的气体物态中，行为本身、即单纯的行为会表现出某种固化的倾向。就行为本身而言，我们似乎可以将其捏在手里，并像摆弄一块不会说话的矿石、一块水晶一

样对其加以研究。所以从此观点出发——在这里很清楚，不是吗，我们不可能还有别的出发点——所以由此看来，在一所集中营里采取最终解决方案[①]时，鉴于那肉体和精神上置人于精疲力竭的彻底摧残和几乎已经降到病理萎缩状态的判断能力及其后果，一般来说，每个人的行为都只受保住本人幸存之思想的支配。我们再想想，那位“老师”曾得到了双倍的幸存机会，而且他**扔掉**了这一双份的良机，精确地说就是扔掉了为他自己的机会又额外增添的一次原本属于别人的机会。由此便得出了这样的结果：怎么说好呢，似乎对第二次机会的利用恰恰毁掉了他还可能拥有的唯一的生存和幸存机会。所以按此逻辑肯定就**有**某种道理，我再次请求你们，别去想方设法地为其命名，有一种纯真、未受任何异物——既没受我们的肉体也没受我们的灵魂和我们内心狂奔乱窜的野兽感染的概念，它是一种作为理想同样存在于我们所有人的精神之中的思想，是一种理念，它的——怎么说好呢——它的不可侵犯和对它的捍卫则意味着——你们愿意的话或者可以说——意味着他的、即那个“老师”的**唯一真正的幸存机会**。对他来说，没有这个想法活下去的机会就根本不是机会，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如不能完整无损地得到这一概念并将其视为纯真未染，他就不想活，甚至很可能根本活不下去。事实如此，而且我认为此事就无法解释，因为，与那手上明摆着的口粮配给所包含的理性相比，鉴于这份口粮在一个集中营实施所谓最终解决方案时能够有助于避免被

① 指二战期间德国纳粹采取的灭绝欧洲犹太人的行动。

人最终解决掉，相比之下这事也是不理性的。倘若这份口粮真能发挥这样的作用，那这作用不会遭到一个空洞概念的甚至连生存利益都一扫而光的抵抗。我认为，这是那种命运新陈代谢的证明，而这种新陈代谢其实就是生命。它比任何随便什么人可以而且可能用来为元首、帝国总理和挂名篡权者效劳的陈词滥调和理性的暴行都重要得多，而且多得多——这话很可能是我说过的……对自己的故事虽然我不予否认、也无法隐瞒，但我已经厌烦了，因为我活在世上就是为了讲述这故事，讲述这故事就是我的工作，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是我的工作，准确点说应该是，为什么我把这视为我的工作，因为我在人世间就已走到了生存的尽头，眼前就只剩下一件工作还需要做，从这以来，我的四周已没有什么是我存在的目的。——你我都明白我指的是什么工作，而且这事不会栽在我手里，不会，真的不会。现在，当我有如望人后背一样拉开距离并心情沉重地观看自己的故事，就好像瞧见自己的香烟在喷吐烟圈时，女人的目光便朝我聚焦，她们紧紧缠在我身边，贪婪地吸吮着，仿佛要使我身上的泉眼沸腾起来。在这众目睽睽之下我恍然大悟，明白并仿佛看见了，自己的故事是如何编织成一根九曲十八弯的红线，形成了无数根彩绳结成的软套，被我抛向我（当时未来、现在前任的）妻子的臀部、胸部和颈部上，抛向当时还是我恋人的她的身上，以便套住躺在我床上、把她那丝光般的秀发铺散在我肩头的美人。我把她紧紧缠住，捆在我身边，飞舞旋转，有如马戏团里的两个窜来窜去的花衣杂耍，演砸了之后满脸煞白、两手空空地面对幸灾乐祸的观众鞠躬致歉。不过——是这样——**我们必须至**

少拥有失败的意志，就像那位科学家对托马斯·伯恩哈德[1]所说的一样，因为，失败而且只剩下失败是唯一可以圆满完成的经历。我这样说，同时也追求失败，如果我必须有所追求的话。而且我很可能必须有所追求，因为我活着并且在写作，这两者都属于追求。活着更像是一种盲目的追求，而写作则是一种心明眼亮的追求，所以它是一种与活着不同的追求。也许它追求的正是去发现活着所追求的目标。因此，由于写作做不了别的事，所以它只能模仿活着的生活，重蹈活着的覆辙，似乎写作也只是活着，尽管事实并非如此，而且是从根本上风马牛不相及甚至天壤之别地不是一回事。所以，当我们开始写作、开始描写生活时就已经命中注定要失败。现在，当我在自己那个如渊似谷但却声光通透的深夜里寻找那些最后的伟大问题的答案时，即使我肯定知道，所有最后的伟大问题都只有唯一的一个最后的伟大答案，一个解答所有问题的答案，因为它可以让任何一个问题沉寂无声，使所有发问者哑口无言。说到底我们只有唯一的一个答案，这也是我们追求的最终目标，尽管我们平常并未将其放在心上，而且现在也根本不去追求它，此外从前也没追求过。就我本人而言，纵使自己不认为，不能一竿子插到底的事还应该有什么目标，但事实上是，当我在此重复自己的生存——噢，上帝啊！——应该说是重复这种生存方式并且扪心自问其原因时，除开我必须而且是狂热地工作、痴迷的勤奋加上不懈

① 托马斯·伯恩哈德（Thomas Bernhart，1931—1960），奥地利作家，作品内容晦暗阴沉，语言伤感，情节多与疾病、痛苦死亡有关。

的努力这些不谈，仅因为在我的工作与我的继续存在之间有着最最重要的联系，这一点便显而易见。而且事实上，当我以写作的方式重复着自己的人生时，激励我的或许正是自己内心秘而不宣的追求中所包含的秘而不宣之希望，也就是说，我一度可以看到这一希望，而且很可能会狂热地、痴迷勤奋且不懈努力地一直写到我看见这一希望为止，但此后我还为何而写呢。所以，当后来我（当时未婚的、后来离婚的）和妻子两人一起在黄昏和尚未黄昏的大街上遛弯时，她问我会如何给这样一个纯真、未受任何异物感染的概念命名，这概念我先前在社交聚会上提及"老师"事件时讲到过。妻子还称"老师"是"一个极为感人的形象"，并希望还能够在我写的某一部小说里再读到这么个人物。她还问我对哪种说法正所谓闭目塞听似的置若罔闻，就像对一个至少是在魔力还在生效时不可以冒犯禁忌的美中不足一样不屑一顾。我毫不迟疑地回答她说，我认为这个概念就是自由，而且首先就是自由，因为"老师"没有做他本来**必须**做的事，也就是说，他没有对饥饿、自我保存之本能以及狂想和与饥饿、自我保存之本能以及狂想歃血为盟的统治者的理性加以考虑，并据此去做本来**必须**做的事；相反，他却做了否定上述一切、与之根本不同而且**本来不必做**的事，做了出乎任何理性意料之外的事。听了我这番话，妻子（当时尚未成为我妻子）沉默了片刻，然后她突然说——我现在还能记得起，她是怎样抬起头来看我的，那深夜的闪电划过她的面庞，她的脸似被抹上了一层淡淡的微光，显得温柔又似玻璃一般的朦胧，宛若一幅 30 年代的电影特写。我还记得起，当她鼓起勇气说话时，那声音由于内心的激

动而有些颤抖，至少我当时是这么认为的，而且或许也可能就是如此，虽然我并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任何事情都不会跟我们所认为或我们想那么认为的完全一致。这世界不是我们**想象**出来的，而是我们荒诞幻觉的产物，它充满了无法想象的意外——我妻子突然说，她觉得我肯定非常孤独和悲哀，而且尽管经验丰富但仍涉世太浅，因为我太不相信人了，真的，因为我要建立能够解释一种自然的（对，她就是这么说的：自然的）、解释一种**自然**而且诚实的人类行为的理论；我还记得，这番话是怎样搅得自己心潮澎湃，虽然这评论纯属半瓶子醋的外行话，却在其没有说服力这点上显得令人信服；我还记得，记得她那随后先是有点胆怯、接着略带询问、跟着很快变得亲密的微笑，记得这表情的变化。后来我常常试图重新唤起妻子的这种面部表演，因为这变化在某些方面一直让我着迷。起初是一种享受，后来当我无法使这一情景再现时，便成了一种痛苦，就是说，它先是以其存在令我为之心醉神迷，后又以其消失叫我朝思暮想，再往后就只剩下让我通过黯然神伤的回忆去想象一下这表情会是而且看来也必须是这样，因为它从来就没换过别的花样，等等。我回忆着自己所有的这些突然变得浓厚而且几乎太真切、太混浊的感情，更记起了她提的那个可不可以和我相挽而行的问题——当然可以，我回答说。那一刻大概是我叙述自己当时的生活状况的最佳时机，好让自己明白和认清必须明白和认清的东西，即：此刻是否和其他的、类似的时刻有所区别，是否和那些类似要决定我马上将同一个女人睡觉的时刻有所不同。因此我这样说："就这么定了，"因为就算是这么回事——我本人也在这一决

定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并且简直就是作为倡导者而出场或者至少给人以这种印象，这当然是再理所当然不过的了——即便如此，这看上去却可以说绝不像是一个决定，而恰恰相反，倒像一次甚至可以使一个决定的可能性成为不可能的冒险，恰似一个在我脚跟前铺展开的漩涡。我血液沸腾，若瀑布的跌水声让我内心所有其他决定都噤若寒蝉，我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一个冒险家通常会有什么样的结局。所以我——就此决定而言，本可以作出决定——几乎没有作出去进行这样一次冒险的决定。不过也许恰恰是这一点吸引了我，这一矛盾，这一漩涡。我不知道，我真搞不懂。这种事在我身上发生了不止一次，每次的方式都一样，以致我不得不从这系统的循环往复中推断出了某种规律，这一规律在悄悄地领导我：一个女人，带着胆怯的微笑，迈着轻盈的步伐，犹如戴着一个披头散发的赤脚女佣的古典面具，轻声而且谦卑地请求走进我的内心——该怎么说呢，为了避免使用我接下来还得说的俗词儿姑且这样讲吧，既然这一蹩脚的伎俩自古以来已经屡试不爽，而且甚至成绩卓著——她请求进入我精神世界的最后领地，也就是我的心灵深处，在那儿面带可爱、充满好奇心的微笑东张西望一番，用她那纤细的小手摸摸所有的东西，掸掸这个、拍拍那个上面的灰尘，给那些发霉的角落通通风，把乱七八糟的破烂扔出去，好腾出地方来放她自己的物品，再将自己打扮得精雕细琢，让人为之神魂颠倒，直到我最后猛然醒悟，原来她已经完全彻底地将我扫地出门了，到头来倒弄得我像个被放逐的外人，只能围着自己的方寸踱步，而且还只能远看着它门户紧闭地闪发着微光，就好像无处栖身者眺望

着别人温暖的家。过去，多少次我都只好牵着另外一个女人的手回来，把她安顿下来，这才得以重新搬进这个家。在结束了一种较为固定的、固定得让人受不了和觉得没有个盼头的关系之后，我把所有这些从头到尾地仔细想了一遍，要考虑和我的作家兼翻译家的职业相称的话，本可以说我把这一切生动形象地思考了一遍。所以我至少这样想，这一关系当时已经有点让我吃不消了，因为我发现它已经危害到对我的工作重要到无法省略的**自由**——什么叫重要到无法省略，简直就是必不可少！我觉得，面对未来自己被管得谨慎小心了，但另一方面也被束缚得没法继续进行新的探索和思考了。最重要的是，我不得不承认，那让我热切向往并为我重新获得的自由根本没有给我带来半点工作干劲，而这种士气正是我曾经期望从上述这一转折中所得到的，可它却没有出现。我不得不惊讶地认识到——只要我仅仅为自由而奋斗而又没有能力作出决定，以致一度将这关系解除后又再次恢复——认识到当时我远比后来重获自由并只是用空虚和无聊来填充这自由时干得更起劲，我甚至还可以说干得更加义愤填膺、因而也更有成效。接下来在很久以后，另一种情况又给我上了一课，那就是幸福的教训，是我和妻子在我们谈恋爱期间以及后来结婚的初期所经历的甜蜜。此事证明，即便是这种情况，就是说幸福，也会对我的工作产生不利的影响。那么让我先来看看自己的工作，好弄清它到底是什么玩意儿，为何会有如此压得人透不过气来、总是让人疲惫不堪、甚至经常恰恰无法满足的、几乎逼得人想跳楼的要求。如果说我当时除此之外还远离——上帝啊，什么叫做远离——如果还远离真

知灼见，远离对我工作之本性的认识，其性质归根到底不过就是挖墓，不停地挖，直到把那座别人已经替我在天上开工的坟墓修成，那么不管怎么样，我至少认识到，只要我在工作，就说明我存在；假如我不工作，那么谁知道有没有我这个人存在，谁知道我是否**有可能**存在，所以在这一点上，我的工作与我的继续存在之间有着最最重要的联系，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此看来，这工作的一个条件就是与不幸紧密相连，不管这让我有多伤心，我都只能这样认为。当然这不是那种立马就能剥夺我工作机会的不幸，如生病、无家可归、贫穷等等，蹲大牢之类的就不说了，而是女人可以特意专门恩赐给我的不幸的一个变种。这样一来，我就不能够——尤其是因为我当时正在读叔本华《**论个人命运中表象之意图性**》的论文，这篇文章收入在其著作补遗选集中的一卷里，是我根据图书馆的整肃清洗情况，在全国大动乱和移民浪潮之后的年代，从一家古旧书店里觅获的。这些禁书经历了当时新闻检查以及焚书、毁书的奥斯威辛得以幸免于难，而且还便宜得甚至让我能够把四卷书一下子全都买下——所以我就不能够——拿用滥了的心理分析学里一个被用滥了的词来说——就是不能够排除自己也许可能患上了——患上了奥狄浦斯情结[①]。我想，鉴于自己青少年时代比较混乱的生活状况，这也就不足为奇了。我问自己，现在的问题只是，那么涉及我这种情况的关系（即便这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我想，因为仅凭这种自我剖析的能力就可以给人以有所希望的勇气），究竟属于

① 心理学术语，指恋母情结。

父与子的还是母与子的关系。我对自己的回答是，在我的行为中，首先在某些时候是贯穿了母子关系的角色——那种遭母亲唾弃的母子关系。我甚至发展到要建立一种有关的理论，这一点我当时所作的笔记可以为证。根据这一理论，被人摈斥的父子关系中的儿子更容易犯超验方面的问题，但母子关系里的儿子（我就把自己假设为这样一种人）则对情色、对可塑造和能变形的材料以及立体形象较为敏感。我以为，就第一种关系而言，自己立马从卡夫卡身上找到了影子，而第二种关系则可以举普鲁斯特①或约瑟夫·罗特②为例。就算这一理论很可能站不住脚，而且我大概也没那个胆量把它写下来，更不用说将其作为一次社交活动的午夜话题抛出来——就冲我已经对它不感兴趣了这一点，自己就不会这么去做——反正我已经离开它很远了，但这毕竟是我在心里进行的心理分析的尝试；如果我还会对此有所回忆的话，那也仅把这当成是在漫长、漫长、谁知道还有多长的通往真知灼见的道路上毫无方向且畏葸胆怯的脚步，也就是说走向非常自觉的自我清除。于是，一个不容争议的事实摆在眼前，叫我怎么说呢，事实上我从自身这一情结上的获益又返还到我的工作里，而我在工作中蒙受的损失则重新回到我的身上，以致我可以从这表象的意图性中——即便不是从我本人的命运里，但也是从我当时的行为上——推导出这样

---

① 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法国小说家，作品多反映法国贵族沙龙的生活，以描写人物的“潜意识”活动见长

② 约瑟夫·罗特（Josef Roth，1894—1939），奥地利作家，出身于犹太家庭，曾为《法兰克福报》撰稿，思想倾向革命，后生活在巴黎。

的结论，即：我暗地里偷偷地建立了母子关系的角色，的确，是真实地创造了这一角色，想必是因为那种与此密切相关的特异——如果不是有点让我害臊的话，应该说是因为那种特异的充满情欲的痛苦，那种看来我的工作所绝对必须的痛苦（当然是除了**自由**之外，这是我工作的首位需要）。的确是这样，因为看来，我在痛苦里毕竟意外地遭遇了创造力，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也无论其中是否只不过是形成那种通常所说的心理补偿，对我来说都是一回事；重要的是，这种补偿在逐渐形成，而且通过痛苦我可以生活在一种真实之中，但我并非深陷其中。谁知道，也许我对这种真实不感兴趣，不过因此痛苦的表象与生活的——我敢说是最最真实的——生活的面貌便在我内心不断交织成一幅幅画面。以此我也找到了对先前提及的现象的解释，为什么一旦完全拥有个人的自由，我的工作干劲马上就下降，而在我为获得自由的奋斗中，在任何心灵的煎熬之中，我的斗志却与日俱增。显而易见的是，我的情结所导致的（或者说导致我的情结的）神经官能症在我身上表现为，倘若这种症状看上去有所消退的话，那么我的工作热情便也随之减弱；然而一旦有新的噩梦袭来，那么潜伏在我身上的神经官能症便会被重新激活，以致我的工作热情也会再度燃烧。这是一目了然、不言而喻的，而且现在，完全可以设想，只需确保连续提供诱因，我的工作之火就会不断被点燃。正是出于这种原因，我的表达也用词极端，好让其荒谬性引人注目、一望而知。因为当我结束这段自我剖析时，也就清算了同那种立刻引起自己本能反感之情结的旧账。确切点说，不仅我的情结，而且通过自欺和做戏对这种情结姑息养

奸的我本人也让我自己恶心，尤其是偏偏袒护了这种表明精神不成熟、暴露出情理难容的人性弱点和傻里傻气且天真幼稚的情结，而其中我最害怕的莫过于天真幼稚。所以，本人至少是被自己的这一情结救治了，说得准确点就是：我宣布自己已经痊愈了。当然与其说是治好了身体，不如说是得以重新恢复了自尊。于是，当我随后很快和另外一个女人建立关系时，便出现了我向她提可能听起来很残酷却又相当实际的条件的情况，即：我们之间永远不可以出现“爱”这个字及其同义词，也就是说我们的爱情只能在我们互不相爱时存在，不管是两心相悦还是单相思都是一回事，因为在这一不幸降临到我们俩当中的一人身上或同时惠顾我们俩的一瞬间，我们就得立刻结束相互之间的关系；顺便提一句，我的对象也同样才从一场恋爱变故中恢复过来，她二话没说（至少表面上如此）就接受了我的条件；即使我毫不怀疑，我们之间关系的无干扰状态，显然会很快对这种关系实施干扰和攻击，我也真不该在此期间认识我现在的前妻即以前的未婚妻，这最终（至少对我来说）意味着采取极端的解决办法。此外，那时我住的是人家转租的房子，这在当时已经逐步进入巩固时代的第二个十年的生活状况中不容否认地显得、就说显得荒唐吧，因为几乎所有我的朋友、熟人或者随便我该怎么称呼他们的人，大都以心肌梗塞、糖尿病、慢性胃溃疡、身心崩溃、精神和物质的腐败为代价——仅拿家庭完全解体作为牺牲算是好的了——用这些代价总算换来了有自己的家可以回。但是我呢，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些。即便想了，那么也是觉得自己不能往这方面想，原因很简单，我相对而言本来该过的是另外一

种生活。出于钱和搞钱的缘故,倘若要那么干,一切都得和忍让、妄想、妥协以及诸多此类**不愉快的事情**挂钩。即使我当时欺骗自己,说这些只不过是**暂时**现象,一旦达到目的便成过眼烟云,因为我们怎能暂时地过一种与传统和普通人不一样的生活,而又不将其痛苦的后果归咎于我们正常但也部分地为我们自己所决定的生活,而且在这种生活里我们还是主人和法律制定者。即便如此我也不能就这样轻松地自作自受,而且我也没有兴趣去主动承受所有这些荒唐,承受因在匈牙利购房而带来的一切荒唐的烦恼。这些事首先会破坏我的**自由**、我内心的独立,其实也是我相对于外界的独立,而且是完全彻底地破坏。所以我也不得不全力以赴地——就是说用我的一生——来抵御这种破坏。本来我应该承认妻子是对的,她以穷追不舍的精神和打破沙锅璺到底的问题揭示了我当时的处境,而且脸上带着那套此时我已慢慢熟悉的表情变化——当时我觉得,这表情对我产生的效果犹如那总是不期而至的、奇妙的日出——她带着这种表情,说我为了本人的自由把自己囚禁了起来。不错,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当然是实话。更正确点说,事实恰恰如此。面临在匈牙利的购房之窘境和无房之尴尬间的选择,我宁可要后者,况且我可以更加由着自己的兴致、随着自己的心情,在匈牙利的无房之困境里独步岁月,缩在保险箱里,隐居蛰伏,永葆纯真,直到这种困境或者——如果我们用隐喻来表达的话,也许更应该说——或者这一罐头盒子突然而且毫无疑问是随着我妻子魔法般的触碰打开了,同时我当二房东的房客之处境猛地一下失去了保护,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并且变得容易霉坏,因

此而无法经久如新。顺便提一下，这就如同我后来的、最终也是目前的生活不能长期保鲜一样，也如同——我觉得——如同所有的生活无法永远新鲜一样。倘若在认知之光里来观察这个问题便可发现，恰恰是我们生活不易长期存放的这种性质，导致了我们获得了这种使我们认识到生活易变的知识——事实的确如此，生活的保鲜期真的极为有限，因为它会被人从我们这儿夺走。是的，我住在二房东的房子里过日子，这就好像自己活得不圆满，掉了价，活得临时凑合，心不在焉（心都扑在工作上了）。带着这种说不清道不明却又胸有成竹且无需任何解释的感觉，即：我这只不过是不得不以某种方式（如果可能的话还一边干着工作）在消磨那介于我的产生与逝去之间内容不定的守候；虽然恰恰这种等待正是属于我的时间，我可以以它作为汇报的内容，虽然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和应该向谁汇报。也许首先应该向我自己汇报，好让我认清自己必须认清的东西，而且做自己还能做的事；此外我还应该向所有的人汇报，这也意味着不用向任何人——也就是说不用向某个不管他是谁的因为我们、也许替我们感到害臊的人汇报；我毕竟既不能对我产生之前的时间也不能对我逝去之后的时间作汇报，所以说这种状况和我**唯一的一生**有共同之处，这一点——即说这和我唯一的生存时间有共同点——我几乎不信。而现在，当我在降临于自己身上的夜色之光中——尽管本着冷酷的客观态度，却又摆脱不了某种激动的心情——长时间并冥思苦想地审视自己二房东的房客之状况，我猛然一下子觉得自己与这一境况的原型似曾相识，我是说，这原型就在自己那距今并不太久远的——虽然也是一种

永不可磨灭的——集中营生活里可以见到，说得确切点，就是我集中营生活的片断。当我的集中营生活不再是名副其实的集中营生活时，当解放者的军队取代了看守者的军队时——不对，这实际上还是一种集中营生活，因为我还是生活在集中营里——恰好在发生这种情况变化后的那天，也就是在其后果导致了解放者的军队代替了看守者的军队之大转折的次日早晨，我从自己那时住的板房医院的“大厅”里踉踉跄跄地走出来，因为我——说得好听点儿——生病了。其实我那么点儿毛病当然远不能够成为住院的理由，然而某些情况凑到一起所产生的结果最终铸成的幸福画面，其令人惊讶的程度几乎不亚于通常的不幸所带给人们的目瞪口呆。所以不管怎么讲我是住进了医院，那么第二天早晨我踉踉跄跄地走进所谓的盥洗室，进门后刚想去洗脸或是先小个便什么的，可我立马站住了，我真的找不到比那句用滥了的成语更贴切的描述了，因为我当时的那副模样千真万确地就是呆若木鸡，眼前的情形是：**洗手池旁站着一个德国士兵，他正凝望着我走进来**；还没等我吓瘫吓晕吓得尿裤子或吓得谁知道会干出什么事来，我的目光便透过眼前由于惊吓所产生的灰黑雾团捕捉到了一个动作，那是德国士兵做出的一个请我使用洗手池的姿势，他那伸开的手里捏着一块抹布，脸上挂着一丝微笑，而且是德国士兵的微笑。我慢慢地明白了，这就是说，**这个德国士兵不过是在擦洗手池**，那微笑只是表明他愿意为我效劳，意思是他在为我擦那个洗手池；这就是说，世界秩序变了；这就是说，世界秩序一点也没变；这就是说，世界秩序仅仅变了那么一点；这种变化只是在昨天我还是个囚犯而今天囚犯

就换成了他这一点上还不能够完全被忽视。这一切培训了我的直接感觉，直到它成为一种经久不退、坚定不移的怀疑，换句话或许可以说，直到它让我在内心形成了一种世界观。我最初的惊恐只是通过这种方式才得以消除的，这些在我后来的集中营生活当中——因为这以后我又继续在集中营里当了很久的自由“营民”——给我在自由营里的生活赋予了一种独特的气息，这气息是对重获新生的无比甜蜜和小心呵护的体验，它让我觉得，自己虽然活着，但心里头却总感到，**德国人随时都会卷土重来**，所以自己活得也不踏实。是啊，而且我不得不承认——当时很可能还没意识到，而现在，迫于具体情况，也为无房所逼——我承认，自己最终还是以二房东的房客之状况延续了这无比甜蜜并小心呵护的对自由营里生活的体验。这样一种在所有认知之前和其后的生活体验，没有承受一切生活之重的体验，它让我觉得，自己虽然活着，但心里头却总感到，德国人随时都会卷土重来；而且一旦我给这种见解或者说这种生活方式或者谁知道我该怎么称的这种事情赋予某种象征的意义，它马上就显得不那么荒唐了，因为这样一来它就是真实确切的了，从象征的意义上来看，德国人的确真的会卷土重来：**死神是来自德国的大师，他的眼睛是蓝色的**[1]。他随时都会降临，不管你在哪里，都逃不过他的手心，他能准确无误地找到你。所以，我就如此这般地度过了我栖身二房东屋檐下的房客生活，活得

---

① 奥地利作家鲍尔·策兰(Paul Celan，1920—1970)《死亡赋格曲》一诗中的名句。

不踏实，而且不可否认的是，当时也没有踏踏实实的日子可以过，相对而言只是一种继续生存，一种吞糠咽菜的境况，确切点说，就是一种大难不死的幸存。不言而喻，这种生活在我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痕迹。我觉得，自己身上的一些明显特征追根溯源都是从此而来。我想，在此我本应该讲讲比方说自己同财产之间的关系，即同那种生活赐予每一个人，让每个人激动，使每个人疯狂的财产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原来根本不存在，或者最多是作为纯粹的消极因素而存在。我不认为而且也无法想象，这一消极因素是与生俱来的，是一种先天的残疾。要不然的话，我完全能够以此来解释自己对某些小玩意儿（如书籍）或者特别是对我最重要的财产即我本人的病态迷恋；我也不认为而且无法想象，自己一方面维护着这一的确还被视为最重要的财产——即我本人，使之免遭各种各样的非出自我本人自由认知的实用自我毁灭的侵袭，另一方面则极其坚决、甚至可以说是残酷地防止其受到任何集体观念那廉价和淫乱的诱惑，其实这种观念原本也可以被我附带列入实用自我毁灭的变种类型，尽管其目的当然也是为了另外一种方式的堕落。不，我毫不怀疑，我同财产之间的不良关系纯粹是由于自己幸存之幸存造成的，是通过这种如此特有而且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并非那么不成功，尽管当然也令人遗憾地不能从经久不变的生活方式中产生，这种生活方式也使我的二房东的房客之生涯显得那么理所当然。在我那于最黑暗的岁月里入住的二房东的房子里——我们曾不得不按照地狱里讽刺挖苦的法则，异口同声并欢呼不已地将这些时日称为和美化为光明时代——在那儿，别人几乎把我当

成救星来欢迎，因为我的出现看来似乎拯救了唯一的一所隐藏在布达[1]相当宜人的一条偏街背巷的房子，否则就会有人要求占据它、没收它、查抄它、居住它、划分它、征用它，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也正因为这样，我就只需付一点所谓象征性的房租，而这租金在以后的年月里也只不过象征性地有所上调——我是说就在这二房东的房子里，我既没有当自己尚不能去想财产问题之时，也没有于已经可以对其有所想法之后，甚至没有在本该去想却没有想的情形下，我是说就在这种处境下和状况中，自己也无任何与财产联系在一起的危险之虞，不必担心会因为诸如管道破裂、房顶开缝或者其他危及人身安全与健康的问题而去采取令人尴尬且毫无指望的措施，也没有什么要考虑和财产联系在一起的比方像这一房产是否令人满意啦，或者是否应该再购置别的或至少是更加令人满意的房产啦等思想负担。当然，这些都要以充分利用、也就是说发挥我们现有但却不尽如人意的房产之价值为前提。不，这些改变现状的强迫性意念根本就没有在我脑袋里冒出过，不过这种让人心痒难挠的刺激一再使我面临想象的选择机会，不断地让我产生错觉，频繁地制造假象，以致我误认为可以把自己此时此地的处境同彼时彼地的处境相对换，能够将住宅大楼里的房子——当然是在经过必要的四处奔波、接二连三的付款、履行繁文缛节的手续以及办完其他一切不可预见的杂事之后——能将我的房子换一套满意点的。可实际上连我自己也不清楚，究竟什么样的住房能够让我满

① 布达(Buda)，原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市的一个城区。

意，因为我本人对自己的理想所在也没有底，更何况我还丁点儿没提装修上的那些难题，我目前住宅楼里的房子之所以过了这么长时间仍然一直不能令人满意，就是这一工程的结果。反正我是不懂，一套像我家这样的住房应该怎样装修。我想象不出，一套为我装修的房子又该是什么样，我对自己究竟喜欢何种住房、用什么东西来装修这房子一无所知。在我那从二房东手里租来的房子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房东的财产，它们都按部就班并井然有序地等待着我在其中安家落户。后来，在同它们一起度过的漫长岁月里，大概我从未想到过去挪动它们，更不用说仅因为看到、迷上以及购置了别的什么东西，我就会拿它们去作交换或者甚至补充添置新的家什（书籍例外，我的书是先上书架，等架上摆满了就往桌上堆，如果桌子上也没地方了便随便朝地板上放，直到房东专门又给我增加了一个矮的临时书架以救地方太小之急）；不，我申明，自己既没有去追求也没有购买东西。不错，我很可能连看都没看它们一眼，没有什么能像胡乱塞满了东西的橱窗那样把我逼入绝境，那些玩意儿让我心灰意懒，使我倍感压抑，甚至叫我道德沦丧。正因为这样，如前所述，想必我根本没有一开始就注意到它们，这显而易见地证明，我几乎没有这样的要求。在物质这一领域里，我可以说是知足常乐，无甚奢望。既然我被安置在一个井井有条的现成物质世界里，除了接受、看透和适应这一安排别无他事可做，那也许自己的确是该谢天谢地了。我觉得，自己天生就是住旅馆的命。但是鉴于时代发生了变化，我没住旅馆却只住了集中营和带家具的房间。我当时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作记录，几十年后又把这记录抄到

现在我手头的另一本本子上。我有些吃惊地发现，自己当时就已经记下了诸如这类的事情。这清楚地说明，我当时对自己的境况，对这种易变质的境况和易变质的生活之不易长存的性质，并非完全两眼一抹黑。我回想起，当时自己常常经受着一种本来更应该被称为病态的情感之折磨，我自己则将其叫做“陌生感”。这种感觉我从很小的小时候就深有体会，其实它一直伴随我终生，不过那时它却恰似恶魔缠身，白天让我无法工作，夜里使我难以入眠，同时弄得我心力交瘁，几近崩溃。这是一种有原因的神经病，绝非什么幻觉。至少我认为，其原因实际上就存在于我们的现实之中，存在于我们人类的情景的现实之中。它大都始于一种通常只是令人吃惊、不过有时——尤其是当时——又让人无法忍受的激烈情绪，也就是我觉得自己的生命仅仅维系于一根纤细的游丝。这并不是在谈我生死存亡的问题，此话题与死亡不沾半点边，而唯独只涉及活着的领域，只谈生活在我内心突然形成的画面和形象，准确点说，就是百分之百模糊不清的异形；我还感到，自己对生活的真实性绝对不再心中有数，的确，我满腹疑云，完全不相信那些被我的感官误以为真实而其实大有问题可究的经验，甚至怀疑我本人的**真实**存在，怀疑我所处的环境的真实存在，怀疑一种在类似我已讲过的这些经历过程中——或许我应该称之为突发疾病的过程——也就是说怀疑在这种疾病发作似的经历当中与生活、即与我的个人生活和我周围的生活仅以一根纤细的丝线相维系的存在，而且这根丝线不是别的，它独一无二地就是我的理性。但是我的理性不只是易犯错误和——客气点儿说——和绝对不完美的工具或感

官，或者随便我怎么称呼都行。理性工作的时候大都也慢慢吞吞、断断续续，好似云里雾里，有时就跟没工作差不多。它按照我的行动举手投足，如同一个躺在病床上的流感患者，随着在身边护理自己的**别人**的动作行事一般。差不多所有的事都是他后来才作的记录，有时它虽然也想用自己有气无力的语言去影响那个**陌生人**的举动，可是一旦此人不按它的指令去做，或者根本不听它的话，它便听天由命，束手无策，不再去做任何新的努力。“陌生感”是一种完全被抛入陌生环境的状态，在此状况中你没有一丁点儿机会去体验幻想和感受意外的、无拘无束的意象，而只是终日与无聊的例行公事为伍。这是一种纯粹的没有归宿的状态，它不知道或者没有昭示，被你抛弃或期待着你返回的归宿究竟在何方，比方说可否——在这种状况下我常常扪心自问——比方说可否让死亡成为归宿。只不过我也同样常常自我解答道：那样的话我就得相信有极乐世界，而恰恰那儿的乐字让我连这现实的世界都不敢相信，尤其是在此情况下，当这类问题在我头脑里无法避免地涌现，而我又跟不相信这个世界的存在一样也不认为还会有另外一个也就是极乐世界的存在时，我对此的信任就降到了最低点。说实话，尽管我当然不认为另一个世界即极乐世界的存在是可以想象的，但也绝不认为这是不可想象的；不过倘若真有这极乐世界，那它肯定不是为**我**而存在的，因为我人还在**此世**，这也意味着几乎不在此世。反正我就是这么半阴半阳地活着，而且这使我内心充满了一种不可名状的负疚感。后来，如果可以这么讲的话，我曾一再尝试——现在仍然如此——让我自己变得清醒、实际一些，但是一切都白搭。

看来，似乎我只能通过一种逻辑游戏的形式与生活发生关系，就好比下象棋或是在纸上算账，那样的话会从抽象的结果中玄妙莫测地突然得出某种事实——所以，下面有一个我当时最爱举的例子，而且当时我把这都记在笔记本里了，现在又从中转抄于此，那么我的例子大致是这样的：如同一个人手里捏着两股电线，把它们扭紧，将一头插进墙上的孔里，再钦一下按钮，于是灯就亮了；我曾写道：于是纯粹的、有意识的概率运算便开始进行；我曾写道：其结果虽然已在意料之中，但仍然令人吃惊并且在某些方面难以理解；我曾写道：一切的一切全都是前提、推论和概率，哪里都没有明确的把握，哪里都没有最终的肯定；我曾写道：我存在的意义何在，为什么我会是我这么个人，我的本质是什么；我曾写道：众所周知，对此我虽然徒劳无益地没找到任何答案，却至少得到了些可靠的提示；而且，我曾写道：我对养活并最终消灭自己的肉体亦感陌生。"倘若在我的一生里只有那么独一无二的一瞬间，能让我将肝和肾的排毒、胃和肠的蠕动、肺的呼吸、心脏的收缩和舒张以及大脑与外界的物质代谢、精神之抽象思维的形成、知己知彼知一切的意识之意识和我超验的灵魂那被迫做作但慈悲为怀的存在现实，能让我蓦地犹如亲历一台相互协调、步调一致的大合唱一样去切身体验这一切，只要我有片刻的机会来这样**看待、理解和占有**自己，虽然这既谈不上什么占有者也不可能有什么占有物，那么就只会使我从未、也是永远不可能完善的人格得以形成。这就是说，如果这样一个不可多得的无法实现的瞬间能够实现的话，那没准我的"陌生感"早就荡然无存了，同时这也教我知所应知，只有这样我才会知

道，存在的意义何在。我写道，然而正因这些假设都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才尽人皆知地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我们现世的生存，而且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不知道自己现世生存的目的，不知道既然一度已经存在于此为何又得匆匆离去。我曾写道：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不去体验也许什么地方现成的完完全全的生活，而非要按照命运偶尔分给我的支离破碎的残片过日子，纯粹是一锅由这种性、这种身体、这种意识、这一地点、这一命运、这种语言、这些故事和这种二房东的房客之处境所组成的大杂烩。此刻，当我在转抄当时所记录的东西时，眼前突然浮现出一个已经过去很久的夜晚，那是一个梦境，准确点说，也是一种真境、一种真实的梦境，或者也许是梦境般的真境——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但却能清楚地回忆起当时的每一个细节，犹如一切都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那天夜里，一种“陌生感”突然把我惊醒或者说使我陷入沉睡，我不知道到底该怎么说，不过这也无关紧要。重要的是，那也是个发人深醒的夜晚，明亮得如同今夜一样，闪着黑丝绒般的光泽，为一种一动不动一言不发、然而却坚定不移的意识所贯穿，我恍然大悟：其实，这一砭骨的、痛苦的意识是完全不可能突然一下泯灭并从世界上销声匿迹的。是的，如此说来，就好像这意识根本不是**我的**意识，而是一种关于**我**的意识，虽然我知道这种意识的存在，自己却不可能拥有这一意识，仿佛这意识不仅仅归我所有，而且是一种一直现成、现在的意识，我就是摆脱不了它的纠缠，让它、让它把我本人徒劳无益地折磨得要死。另一方面，我清楚地感觉到，这种痛苦的意识其实并非一种不幸，如果我——从某种意义上

只是作为这一意识的对象——如果我在这一刻也觉得不幸，那不如说相对于此意识、即相对于这种无情、永恒、让人痛苦、而且尽管如此——我强调一下——尽管如此仍毫无不幸可言的意识，这是一种自身无能为力的意识。我重申一遍，当时是完全清醒还是完全熟睡，这无关紧要，可事后却不能不将其推测为一种奥秘，也就是说不可能不至少对此进行观察，即：这一意识也是包括我本人在内的某种事物的**一部分**；它不属于我的身体，但也不完全属于我的思想，尽管我的思想早已告诉我，它不仅仅属于我，而且事实上这一意识，或许是产生并演变所有这一切即我的存在之核心的核心。不可能不想的是，这一意识也因此被赋予了一项使命，即便我仅把这一使命看成是一种假设，但其戒律却是不可触犯的，准确点儿说，当然是会受触犯的，不过那恰恰只是自己有种触犯了这一戒律的感觉，也就是说一种负罪感；同时——就我而言，我觉得这是最莫名其妙不过的事。该怎么说呢，尽管如此这一戒律却并非仅仅是道德戒律，不，这其中还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直接针对手艺才能的因素、条件标准、甚至原则要求，即："必须重建"这个世界、将其"复制"、把它"学习到手"，一旦时机成熟，必须能够拿得出来，让它现身亮相，不管是何原因，无论面向何人，谁都可以，只要他有朝一日会因为我们并替（由于）我们感到害臊就行；所以，**理解**世界是人类的宗教任务，这是不以畸形教会的畸形宗教意志为转移的；是的，我最终——要想避免非说不可的话，该怎么说呢——我最终能在理解世界和理解自己的处境中寻找我的解脱，不对吗，既然我已经在寻找什么了，如果不是自己的解脱，难道我还要寻找别的什

么吗？可另一方面我觉得，所有这一切都是人**必须**进行的思考，而且人都只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思考的，也是为其处境所迫才产生这些思考的。鉴于人的处境至少在某些方面是预先注定的，那么人也只能预先进行某些思考，或者无论如何至少对预先注定的事物、题目和问题进行事后的思忖和考虑。我想，若按从中得出的结论，我就得作这种自己**不必**作的思考。虽然我今天已经记不清楚，我是否真的作过这些思考。当然，此外我主要考虑自己**不必**做什么，还有就是，自己已成为本来我最最不必成为的作家和翻译家——其实，这甚至不过只能是对时势的一种抵抗，其表现手法为糊弄时势并不停地在时势的迷宫里东躲西藏，以逃避犟头怪物那一定程度上于急忙之中偶尔将我踏倒在地的迅猛脚掌。这种时势是可怕的、灾难性的，它容不得除了奴仆思想之外其他任何形式的思想的存在，什么思想都不行；这种时势唯独赞美、颂扬和欢迎奴隶的苦役，而我可以说得以隐藏其中并活着、存在着、生存着，其方法就是高腔大嗓地自我否定，担惊受怕并沉默寡言地守护着那个黑丝绒般的夜晚和我心中无望的希望。直到好多好多年以后，当我一再注意到那些紧紧盯在我身上的女人眼睛时，这些希望好像才第一次脱口而出。那些目光磁石般地吸附着我，仿佛要让我身上的泉眼沸腾起来。那时，在我述说那个“老师”故事的夜晚，**存在**着一个未经任何异物感染——既没受我们的身体也没受我们的灵魂和存活于我们内心深处之野兽感染的概念，一种作为理想而同样存在于我们所有人的精神之中的思想，而且是一种我仅仅——不过这点我现在已不再提了——仅仅是以前暗中想过、或

许也能够潜伏接近、悄悄靠拢并且甚至可以成功地将其付诸笔端的理念，它是这样一种思想，能够让我在**不必**拥有它的条件下具有它，可以说是使它独立于我而为我所有，并且即便在其反对我、甚至毁灭我时仍然属于我，而且没准在这种情况下它更是我的，因为也许正是在这点上我才看出了它，这大概就是该思想的界限……瞧，当时我就是这么活着。而现在，我一边东拉西扯地胡侃，一边也多少理解和明白了自己必须理解和明白的东西。至于这一瞬间是否和某一关系或某一情况的其他相似以及毫不相似的瞬间有所区别，对这一问题我的回答是：当然，其间有着根本的区别。这就如同我与我自己——至少在某些方面——有着根本的区别一样。那么，如果把我当时做二房东的房客之景况总结一下，比方说把我当时的思想、当时的倾向、动机以及我当时整个劫后余生的二房东的房客之处境总结一下，那我不得不认为，从迹象就可以看出，那时自己身上就已经具备了让我为**改变状况**而成熟的种种因素。如果我认为，我当时开始觉得对自己生活的思考是错误的，即经不起考验并且叫人难以忍受的，那我肯定没错。事实上我已经不可以再把自己的生存仅看作是继我的出生这一不由自主的偶然事件之后接踵而至的一系列不由自主的偶然事件之组合了，因为这种生存观，不仅是有失身份和错误的，即经不起考验甚至叫人难以忍受，而且首先也可能是**无用**的，至少对我而言难以忍受并无用得让人汗颜。相反，我倒必须而且宁愿将其视为能让我的自豪而且至少让我的自豪在其中得到满足的一系列认识之组合。因此，当我决定马上同一个女人、也就是说同那个后来成为我妻子尔后又不

再是我妻子的她睡觉时，就连这一时刻也不会是一次偶然的事件。因为明摆着的是，我这里所记录的一切以及如上所述自身早已具备的让我为**改变状况**而成熟的种种因素，所有这一切仿佛都在那一刻交融汇集，尽管我自己当时还本性难移地绝对不可能意识到这一点儿，而且尽管我自己现在也无法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而只记得那个夜晚里划过的亮光中一张转向我的脸，似被抹上了一层淡淡的微光，显得温柔又似玻璃一般的朦胧，宛若一幅 30 年代的电影特写。那时谁会想到，这张闪着希望曙光的脸会将我引向何方何地。正如后来发生的事所证明，她，即我未来（或者说前任）的妻子身上，也同样具备了让她为**改变状况**而成熟的种种因素，如果我补充了这一点的话，那就可以宣称：我们俩的相逢不仅是一次非偶然的邂逅，而且恰恰是一次缘分的撮合。的确如此，当时还没过多久，我们就已经在谈婚论嫁了，然而实际上我们是想拥有命运，而且两个人都想拥有各自的命运，拥有那种独特的、无与伦比的、举世无双的命运。这么一来，不管谈论什么，我们总是跑题，所说的都是借口和托词，即便肯定至少不是有意识地故意编造借口和托词，也就是说并非蓄意撒谎，但事实却如此。因为我当时从何能够了解到自己今天比其他任何情况都更了解的情况，包括我所做的和别人对我所做的一切，我的状况和我阶段性的状况改变，一句话：我的整个生命——噢，上帝！——这一切只是作为我一系列认识的组合中的认识途径而为我所用的，比方说，我的婚姻就是我认识到自己结了婚就没法活的途径。这一认识在我一系列认识的组合中是那么举足轻重，可就我的婚姻而言，它却又伴随着如此之多的劫难，虽说从另一方面冷

静地来看，倘若没有这次婚姻也就永远不可能或者说充其量只能通过抽象的推论取得这一认识。所以任何谴责和自我谴责看来都是命中注定的，而唯一可以替我开脱的理由同时也正好就是对我的谴责，如今看来，那就是我肯定有意而为并且旨在自我清除的结婚。当时，结婚那会儿，至少我认为，自己是做了一件完全与未来和幸福背道而驰的蠢事。我和妻子时常谨小慎微而又驾轻就熟并执著地探讨“幸福”这一问题，就像谈论一项别人给我们严格规定的、秘密而且几近残酷的义务。喏，就是这么回事。而且今天我把我们的整个生活及其所有的音调、事件和情感都视为一个朦胧、混乱的统一体；或者说——不管这有多奇怪——我更像是在听一首多种音调交织而成的乐曲，其中心的、伟大的、排除一切的主题不断地发展、丰满，以便随后爆发式并鹤立鸡群地占据无限的独家主导地位：**将我的生存视为你的存在之可能，进而将你的不存在视为对我的生存之必要且彻底的清除**。那天晚上，当我对那时还不是我的、而现在已不再是我的妻子讲述那个“老师”的故事时，自己立刻就对这一事件的教训——更确切点说，是对“老师”所作所为的教训——加以阐述，我向她揭示和解释这些行为在那种气候即极权统治的气候下其成功以及不成功的潜在可能。我告诉她，因为极权统治是一种有悖情理的气候，所以此大气候之下所产生的各种局部气候同样都统统毫无例外地有悖情理；我还对她说，也许其中最不合情理的就是，只要我们理所当然地能够坚守自己的那份生存权利，我们便可以拿自己的生命之本，即仅以最低限度地维持性命为条件来维护这一极权主义的生存；这不过是个近乎自发产

生的、可以说是原始的组织技巧罢了；极权主义的假说可谓自然建立在“毁灭”的基础之上；我还说，挑选精优、淘汰低劣以及在此基础上命名的概念全部都是不存在和虚无的，它们除了纯粹的自然主义外无任何别的现实意义——比如把人推进毒气室。当时我担心，这些不是特别的轻松有趣的话题，而且现在回想起来也在寻思，自己的那番话是不是还有言外之意。但我觉得，自己的确别无他意；我记得，那只是内心骚动的表白，是短短数小时之前让我在那个圈子里口若悬河的强迫倾诉欲在作怪，再有就得归咎于那一印象——尽管这很莫名其妙或者说非同寻常——归咎于我认为走在我身边、高跟鞋嗒嗒作响的这个女人——虽然在朦胧的暮色里我从侧面只能看见她模糊的身影，不过我压根儿就没打算去看她，因为她的容貌以及不到一小时前仿佛涉过海水似的蹚过青绿色的地毯朝我走来的身姿还浮现在我眼前——归咎于我以为身边的这个女人对我所讲的事情**感兴趣**。我告诉她，在极权统治下，凶手和被害人总是全身心地向一件事作极致的贡献，那就是“毁灭”这件事，尽管这两者的贡献**远不可同日而语**。虽然“老师”的行为是在极权之下完成的并为极权所强迫的结果，说到底它也是一种极端的行为，即有悖情理的行为，然而事情的本身却不失为一种战胜极致的有悖情理而取得极致成功的行为，因为恰恰而且也只有在这里，在这为疯狂极致的毁灭和根除行径所席卷的世界上，“老师”内心鲜活的——如果非要形容的话——可以说是痴心不改的理念之坚不可摧才得以成为**启示**。听完这番话后，她问我，除了遭受不得不遭受的苦难之外，我自己过去或者现在是不是还因为犹太人

的身份而感到难受。我回答说，这我还得想想。事实上，长期以来，自从脑袋里开始会想事情起，我就知道也感觉到，自己的姓名和一种莫名其妙的羞耻黏连在一起，这一羞耻是我从某个不知在何处的地方带来的，而我自己从未到过这个不知在何处的地方；我蒙受这羞辱是因为某种罪过，虽然自己从未犯过罪，但这却是我的罪过；这罪名伴随我终生，而这一生无疑并非我自己的一生，虽说的确是我在此生中活着、痛苦着并将最终告别人生。我对她说，但是我想，这一切不一定就非得从我的犹太身世上找原因，这也完全可以是因为我本人、我的本性，因为我的个性和我——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和我超验的属性；或者说是因为别人对我的而又在我身上反映出来的普遍行为方式和交际形式，一句话：是因为社会状况和我本人与这种状况之间的关系；我接着说，因为正如书上所写的：**判决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诉讼则逐渐过渡到判决**。谈话中也提到了她以前读过的我写的一篇叙事作品，她说过一定要和我探讨探讨。所以我不得不就这篇东西费一番口舌，粗略地勾画一下其主要的体裁样式。这部作品属于那种篇幅较长的短篇小说，通常也被称为“短篇长小说”，当时正好收在一部厚厚的短篇及短篇长小说集里出版问世。出书前的千头万绪并非一帆风顺，那种让人掉价丢脸、吹毛求疵的磨难我就无需赘述了，因为我觉得没劲，对其反感，尤其是作为此类出版物，这些东西对匈牙利的文学事业充其量不过是一菲薄的、可以说缺而无憾的贡献。这种让人掉价丢脸而且吹毛求疵的文学事业，是建立在挑选淘汰、特权、偏爱、反感以及一套行政和业务上均可内部秘密操作的黑名单体制

之上的，在这一体制下，精品优质往往遭受质疑，而粗制滥造却大量被奉若天才创作；所以此项文学事业尤为卑鄙、可耻，而我则曾是而且现在只要依然并且不得不处于这一地位的话，就还是其旁观者。只不过自己有时惊恐万状，有时痛心疾首，有时麻木不仁，然而却总是置身圈外。咳，我怎么会沾上文学的，“你金色的头发，玛格丽特”①与我有何相干！对这一让人掉价丢脸且吹毛求疵的文学事业而言，圆珠笔就是我的锹铲，是“苏拉米特你灰色的头发”②的墓碑；是的，这部短篇小说，或者按我的观点应该说这部短篇长小说，是一个男人的独白，一个更应该讲是年轻的男人的独白。此人在父母且不说近乎偏执狂热但至少是极其严厉的基督信条教育下长大成人，可在世界末日般的岁月里得知，那令人心碎的烙印也留在了他的身上：按照突然生效的所谓法律**精神**他被宣布为犹太人。于是，在被赶进犹太人隔离区、塞入运牲口的车皮之前，在谁知道——其实他本人最不清楚——会被送往何地并被处以何种死刑之前，他竟然还把自己的故事写了下来，书名就叫《几十年的胆怯与自我否认》，——实际上是我让他这么写的。尽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他这个刚出炉的犹太人，竟能在这种身份的生存当中，摆脱犹太情结，活得无拘无束。也就是说，他必须承认，一个人绝不可能仅因为被革出一个集体就会自动成为另外一个集体的成员。他问自己——实际上是我让他问自己，想知道犹太人究竟跟他有何相干。而现在既然他也是犹太人了，他才明白——实

---

①② 作者此处暗示奥地利作家鲍尔·策兰《死亡赋格曲》一诗中的名句。

际上是我让他明白:犹太人跟他毫不相干。只要他觉得拥有非犹太人身份的特权是一种享受,那他就体会过是犹太人、具有犹太人身份的难受,确切点儿说,是生活在腐败、令人窒息、杀机四伏和走向戕害生灵的特权以及分类制度下的痛苦。他的一些朋友和同事,他曾一度当作自己家园的那个集体,都成了他受罪的根源;他遭难于他们的敌对行为,受苦于他们的狂热思想。尤其让他心惊肉跳的就是面对那无法回避的反犹主义的辩论,面对所有这些辩论那令人痛苦万分的徒劳无益的结果,因为在他看来——实际上是我让他这么看——反犹主义并非一种思想信念,而是一个天赋和性格的问题,按他的说法——实际上是我让他这么说——是"绝望里的道德,自我仇视中的暴怒,行将就木时的生机"。另一方面,他也暴露出自己对犹太人抱有某种成见,因为虽然他试着去爱他们,可心里却从来没有能够成功的把握。他的熟人以及他的朋友中都有犹太人,这些人他要么喜欢,要么不喜欢。不过这是另外一回事,因为他之所以喜欢或不喜欢纯粹是出于个人的好恶。可是,对比方说像犹太教这样一个如此抽象的概念,或者说对一群硬被塞进这一概念里的素不相识的众生,叫人如何去产生热爱之情呢?即便对他们起了爱心,那么也不过只是一种类似对一只放养动物的爱,人们给它喂食,但却不知道它在做什么梦,会干什么活。这下他可摆脱了这一折磨,卸掉了自己给自己背上的全部包袱。这下他终于可以心地坦荡地去蔑视他所蔑视的人了,而且也不必再去爱他所不爱的人了。他自由了,因为他没有了家园的牵挂。他唯一还需要作的决定就是,看自己要以哪一种身份去死,是以犹太

人还是以基督徒的身份，是当英雄还是作牺牲品，或许还能成为形而上学的荒唐行径的受害者，造物主新创世之混沌的替罪羊？鉴于他对这些概念一窍不通，于是便决定，至少不用吹牛说谎去玷污他的死这一纯洁的事实。他认为一切都很简单，因为他已获得了看清人间世事的权利：“我们别再去寻找那不存在的意义：在本世纪，任务频繁的行刑队又在准备上演一场‘十杀一’①的惨剧，而且命中注定，那第十个人的劫数也将落到我头上——就是这么回事。”这是他——当然实际上是我——说的最后几句话。诚然，全书的内容并非如此简单，我在这儿只是拣了重要的说。那些交谈对话、俗语常言、情景环境、其他的人物角色、包括后来离他而去的情人，全都被我省略掉了。最后，我们的男主人公坐在地上，浑身颤抖、前仰后合地大笑不止。当时我打算给这篇小说起名就叫《哈哈大笑》，然而出版社社长却没有采纳，这人有一点是尽人皆知的，那就是即便在单位里，也就是在出版社上班时，他身边也总带着**配发的武器**，其实平常倒不见他穿军装，而且那**配发的武器**其实就是把手枪，也没挂在武装带上，而是插在屁股后面圆鼓鼓的裤口袋里。就是这个社长说我的标题“玩世不恭”、“践踏了神圣的回忆”等等，所以拒绝接受，然而事实上即使用了这个被贬低得一无是处的名字，这篇小说竟也得以出版问世。这一点我至今没有搞懂，也不想搞懂，因为我讨厌去看穿、去试探地理解那些居心叵测的难解

① 古时的一种杀人方法，让被罚者排列成队，自动报数，每数到第十者必须出列受死。

疑团，这团错综复杂的网，对世间万物都毫不留情，它摧毁破坏一切，就连它允许存在的东西也只能在其腾腾杀气之下苟且偷安。和我创造的人物一样，我自己也同意这种说法，即我的作品，不管怎么说，在“十杀一”——其实更应该说是“三杀一”——的死亡游戏中抽到了一个幸运的数字。据我妻子讲，这个故事让她感动之处在于，**人居然可以自己决定其犹太属性**。我妻子说，此前，每当她读到讲犹太人或者研究犹太人的书刊时，常有一种**脸又一次被按进污泥浊水里的感觉**，而现在她头一次觉得，**终于可以抬起头来了**。在读我的小说时妻子讲，她和我作品中的“主人公”是同呼吸、共命运，后者虽然死了，可生前毕竟**经历了自身内心的解放**，所以尽管只是匆匆流逝的一瞬，但妻子也的确体验了那种如释重负的自由。她说，这个故事比以往的一切都更多地**教给**了她**生存**的道理。在这天晚上，她的脸上已经第二次闪过那急速变幻和飞快升腾的表情，她那种——我实在找不到别的表达——那种微笑的色谱变幻，使我的内心产生了仿佛全身都可以融化并且随便变成什么东西都行的感觉。不过我马上知道了她这种表情产生的背景，了解了我妻子的童年和青年时代。虽然我妻子是在奥斯威辛之后出生的，但她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却始终处在奥斯威辛的阴影里，确切点说，是在犹太民族的阴影里，用妻子前面说的话就是在污泥浊水里。她的父母在奥斯威辛呆过，我还见过她父亲，一个高个子的光头，那张脸当着陌生人的面显得拘谨威严，但在朋友和家人当中又放松成一副苦相。我还得知，妻子年幼丧母，她妈是病死的，那恶疾是当年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染上的，折磨得她妈时而肿

胀似桶，时而骨瘦如柴，时而脏腑绞痛，时而斑疹满身。科学对她的病症如同对制造这一疾病的罪魁祸首奥斯威辛集中营一样，实际上是束手无策。所以，我岳母的病因其实就在于奥斯威辛，而奥斯威辛这病是没法医治的，从来没有谁患上奥斯威辛病后痊愈过。妻子说，在她决定当医生这件事上，正是这不治之症和母亲的早逝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后来，有一次我们谈及此事时，我妻子引用了几句话，她已经忘了是在哪儿读到的，反正看过后就一直没忘。虽然不是马上，可我也相当快地发觉，妻子是在名为**《不合时宜的考察》**[①]的论文集里一篇文章上看到这几句话的，文章的标题叫**《论历史之利弊》**[②]。这一发现再次使我坚信，这些于我们必不可少的名句，迟早会找到我们，因为倘若不相信这一点，我就无法理解，这些话怎么会让我那对哲学而且尤其是对尼采从来不感兴趣的妻子读到的。我很快就在一本老掉牙的尼采选集里找到了这几句话，那本书已经磨起了毛边，包装着红色的封皮，是我从一家旧书店的阴暗角落里搜出来的，话是这么讲的：**失眠有深浅，反省过去、冥思历史，亦不例外，在这种反省和思考当中，活着的事物受到伤害并最终毁灭，不管是一个人、是一个民族，还是一种文化。**然后接下来，或者是在这段的前面——我匆忙之中记不大清楚了……还有话：**倘若谁不能忘掉过去的一切，着眼于跨越当前的门坎而立身处世，倘若谁不能像胜利女神一样居高临下而头不发晕心不慌，**从这

① 德国哲学家尼采撰写的专题文集，共分四部。

② 尼采专题文集《不合时宜的考察》之二，原文完整的标题应为《论历史对生命之利弊》。

儿开始我妻子便可以倒背如流了：……**那么他就永远不懂什么叫做幸福，更糟糕的是：他也不会做任何使别人幸福的事**。我妻子很小很小的时候，就通过耳闻目睹和大人的言传身教对自己的犹太出身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有了几分了解。她说，她一生中曾有过那么一段时间，“当时我还是个小姑娘，脑后扎着条‘马尾巴’，满脸的小雀斑”，她那时天真地想象：**因为自己长得可爱，其他孩子肯定会一下就喜欢上她的**。此刻，我正在写她说的话，所以眼前又蓦地一下浮现出她讲话时笑的模样。后来，她的犹太身份被验明，与此同时而产生的是前途无望的感觉，随即，遭受惩罚、唯唯诺诺、疑神疑鬼、心有余悸以及母亲的疾病又接踵而至，还有心里那置身异国他乡的说不出来的陌生感、**犹太人情感**的隔离区和那在家时的**犹太思想**。母亲去世后，姑妈搬过来和他们一块儿住。妻子说，她一见面就觉得，姑姑那张脸就是一幅奥斯威辛的真实写照，她不论看谁都觉得人家要么曾经是刽子手要么将来是杀人犯。“我不知道，在这样的环境里自己还能不能成长为一个相对而言正常的女人。”只要一谈到犹太人的事，姑姑就会立刻离开屋子。“我内心里有某种东西僵硬了，并且开始产生抵触情绪。”她几乎不愿在家里呆了，念书成了一种逃避，后来学医、谈恋爱、几度风流、一番折腾，也全都是为了躲开那种氛围。妻子说，她一生中有过两次“可怕的经历”。据她回忆，这两件事，一次发生在 16 岁，一次在 17 岁。一回是在谈到法国大革命时她很激动地说，那场革命也不见得比纳粹好得了多少。姑妈赶紧责怪她，说作为犹太人可不能这样讲法国大革命，因为如果没有法国大革命的话，犹太人至今都还

住在隔离区里呢。我妻子回忆道，挨了这顿剋以后，她在家里好几天、也许甚至好几个星期都没说一句话。她当时有种感觉，好像自己已经不存在了，也无权要求拥有自己的感情和自己的思想，而且因为自己是犹太人就只能是犹太人的感情和犹太人的思想。妻子说，当时她第一次讲出了心里想的感觉：那就是自己的脸每天都被人按在污泥浊水里。另一次经历是这么回事：妻子坐在那儿，手里拿着本书在看，这本书从头到尾都记载着骇人听闻的惨剧，并配了许多惨不忍睹的照片：一张躲在铁丝网后的脸，空洞的目光加上副眼镜，一个小男孩高举着双手，黄色的大卫星和大得扣压到眼睛上的帽子，两旁站着全副武装的士兵。妻子看着这些照片，心里不由得发出一阵让她自己都感到害怕的阴毒的冷笑。她当时的想法和我作品中的“主人公”的观点完全一样，于是便说：“这跟我有何相干？我自己不就是犹太人嘛。”然而在尚未从我的作品里读到类似的想法之前，她心里一直非常害怕，后来竟因而产生了负罪感，所以她说，在读了我的小说之后才会有那种**终于可以抬起头的感觉**。而且她不止一次地重复道，是我**教给**了她**生存**的道理。她还说，在我身边她觉得自由、放松。此刻，在我的这个黑暗且又让人心里透亮的夜晚，这些声音、画面以及我那光阴似箭的几年短暂婚姻生活中五花八门的镜头，又都浮现在我眼前。我突然看见我们站在窗口，是在那自家的窗口，时间仍然是夜晚，但已是冬去春来的季节，透过大城市的乌烟臭气，一阵清香慢慢地破雾袭来，或许这气息来自远方那些仿佛按习惯已经复苏并且现在按习惯又重新渴望生命的植物；对面的街沿上，三个已有几分醉意的男人走出附近的一家

小酒馆，摇摇晃晃地回家去。其中一人羊皮大衣那发亮的领子，直冲着我们的窗户反光。这三个人互相搀扶着，哼唱着一支不知名的歌；大街上最后一批夜归的汽车疾驰而过，有那么一会儿四下突然一片寂静，就像乐队突然停止了演奏，眨眼之间醉汉的声音猛然十分清晰地传了上来，两句词儿在夜空里回荡：**我们刚从奥斯威辛来，我们的人数又比从前多了起来**。最初的一瞬间我根本没听懂，后来才明白过来，但我心想，这跟我有何相干，毕竟所谓的反犹主义纯属一件随时随地都可以让我沦为其牺牲品的个人私事，然而在奥斯威辛之后的今天，这种现象则纯粹属于一种时代的错位，我想，H 可能会说，——不是那个 H、那个元首和帝国总理；而是那个 H，那个哲学家和负责为所有元首及所有帝国总理提供琼浆玉液的御用掌酒官——他可能会说，这是一个其中已不再包含**世界精神**的差错，是一种地方精神，也就是说不是别的，就是土地神，方言保护主义。如果他们想枪毙或打死我，我想，那他们会跟从前通常所做的一样，事先通知一声的。一直想到这儿我才小心翼翼地朝妻子瞟了一眼，她一声不吭的，让我觉得有点异样，在清冷的街灯下和从下面传进屋内的热辣辣的歌声里，我发现妻子脸上淌着泪水。她说，这哪有尽头啊，我们永远逃脱不了这种诅咒；她说，假如她至少能弄明白究竟是什么让她变成了犹太人就好啦，因为她现在已经不可能相信这一宗教，而且——不管是由于疏忽、胆小还是因为其他的志趣——她根本不了解犹太人那特殊的犹太文化并无法对其感兴趣。她说，这种文化引不起她半点兴致，那么究竟是什么让她成了犹太人——既不是语言，也不是生活方式和另外什么

使她区别于身边众人的东西。她说，除非自己的基因里潜藏着某种秘密的原始信息，她本人听不见这信息，从而也对此一无所知。我平静、硬邦邦而又几近自私地对妻子说——像刺过去的漂亮一刀，或者说一个突然的有力拥抱——我说，她所讲的一切都是废话，她要寻找自以为是的原因和误以为对的解释，那纯属瞎子点灯白费蜡。我还对她说，是某种独一无二的情形使她成了犹太人，这情形不是别的，只是因为**你没在奥斯威辛呆过**。听了我的话，妻子先是默默无语，像个突然感到害怕的孩子，可不一会儿她的脸就又恢复了原来的模样，变回了我所熟悉的妻子的容貌，但同时也转变成我在自己所熟悉的那张脸里那一刻才发现的另外一副面孔，以致我自己都差点为这一发现所震撼。从那一刻起，我们本已不再激情燃烧的夜晚又重新回暖升温。不错，当时我的婚姻已经出现了矛盾，确切点儿说，是我的婚姻已经开始暴露出其本相，即其矛盾的实质。如今，每当我回忆那一时期，首先便会产生一些当时让我内心紧张、激动的条件反射，大概就像基本上跟老鼠差不多的海狸，凭着本能，修筑和扩大自己复杂的护堤、逃遁的道路和四通八达的洞穴网络，甚至建造自己的城堡。那时，当然是除了一大堆养家糊口的翻译活儿之外，我脑袋里一直转悠着一个念头、一个写本大部头文学作品、即一部小说的计划。细节暂且不谈，其内容大致讲的是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心灵之路，灵魂通过斗争赢得欢乐，将进行这一斗争作为使命，**把幸福视为义务**。当时我经常——不对，这么说似乎有点儿太谦虚了，应该说当时我几乎是没完没了地和我妻子谈论这一创作计划，而她对这些讨论、尤其对计划本身也明显

地表现出极大的兴奋，因为她把这事——当然绝非无缘无故——看作是我们婚姻的一座纪念碑，这么一来，我跟她聊得再多她也不嫌烦。起先还只是粗线条地讲讲故事的框架，后来就描述一天天的情节发展，接下去就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密、越来越乱的素材和灵感。我妻子脸上明灭不已地变幻着色谱，她也小心翼翼地谈些自己的看法，我则点头称是地从中提取一两点建议并加以权衡、肯定，也正是希望能看到那忽闪而过的表情色谱；似乎可以说，是我们共同将这一计划草案拉扯大的，就像爱抚自己的孩子，顶在头上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可事后回过头再来看，当然这一切无疑都是一个错误，错就错在我允许妻子进入了我生命及其延续中最敏感、最秘密、最没设防的领域，一言以蔽之：进入了我的工作形成的特区，而且恰恰相反，这正是我需要屏蔽和保护的区域。我此前经常、此后也一直是这么做的，简直就像用铁丝网把它围起来，以防备任何一个未经许可的入侵者，避免任何未经许可的擅自闯入，哪怕仅仅是闯入的可能也不许存在，无论是谁、也不管以什么方式。虽然我无可置疑地感觉到，妻子那覆盖并渗透我一生的深切关心，于咄咄逼人和温柔体贴之中潜藏着危险。但尽管如此，另一方面我又同样无可置疑地不想缺少这份关心，这好比一个人经历了漫长、阴暗的冬日后，不愿失去那突然穿云破雾的温暖阳光。当终于着手实现我的计划时，也就是说开始动笔写这部原先构思的小说时，我发现，自己的设想根本无法实现。事实表明，从我的圆珠笔里，就像从一个病灶里一样，流出了一滴分泌物，落入了我整个构思的网络里，渗进其所有的细胞中，这滴液体可以说病态地改

变了我的构思网络及其所有的细胞;我写道,事实表明,我的计划是不可能的,至少对我来说如此,而在此情况下最后的结果都一样,也就是说不可能去写幸福,也许因为幸福实在简单得无法让人去写。我一边读着当时记的字条,一边抄下上面的东西,我写道,如此说来那幸福度过的生活就是一种默默度过的生活,事实表明,写生活几乎就等于怀疑生活,而只有那种为自己的生活元素所窒息或在其中行为反常的人,才会怀疑自己的生活。事实表明,我写作不是为了找乐子,正相反,我写作是讨苦吃,是寻找那种尽可能大的、几乎已无法忍受的痛苦,不错,其原因想必在于,痛苦才是真实;我写道,对何为真实一问,有一个非常简单回答:真实就是使我殚精竭虑之事。这一切我当然不能告诉我的妻子。另一方面,我也不愿欺骗她,这么一来我们在共同的生活里和相互交谈中很快就遇到了某些麻烦,特别是当说起我的工作时,尤其特别是在谈及这工作的**结果**时,谈及作为**文学**的写作时,谈及跟我不沾边、对我无所谓、别提有多无聊的喜欢与不喜欢之问题时,谈及我工作的**意义**时,谈及那些最后大都集中到卑鄙、肮脏、幸灾乐祸和可耻的成功与不成功之问题范围内的问题时,我们就难以沟通。可我又该如何向妻子解释,说我的笔实际上就是我的铁锹呢?说我之所以写作,只是因为我不写不行;我之所以必须写作,是因为我每天都被哨音叫起来,好将铁锹挖得更深,把小提琴拉得更低沉,让死亡之曲演奏得更温馨?说我如果同时怀有私心杂念,虚伪地去想**结果**、**文学**或者甚至**成功**,便无法完成自我清除这人间的唯一使命?而我妻子或别的什么人又怎能要求我**利用**这一引起轰动的自我清

除之举，而且用它做文章，以便像个贼一样，借助偷配的钥匙悄悄溜进一座有着光明未来的、我一出世便被从中逐出而且我本人也将自己从中开除的、诸如像文学或其他什么的殿堂？怎能要求我在这未来的殿堂里，拿我不得不在云中、在风里、在虚无之间自掘坟墓时使用的同样锹铲，去处理基本的工作？问题就在于，我当时是否跟现在所作的描述一样，对自己处境一清二楚。也许不完全清楚，不过，姑且不说这是一良好的意愿，那么起码这种努力则毫无疑问地早已潜伏于我的心里。在探究自己残破的婚姻时，我发现了一纸残片，上面清楚地记载了我当时的内心活动和思想斗争。显然，我曾打算将这张纸条放在妻子的茶杯旁，就像我有时熬夜后早晨起不了床用早餐时的习惯做法一样，纸条上写着："……让我们相亲相爱但又可以拥有自己的空间，尽管我明白，我们俩谁都摆脱不了各自身为男人和女人的命运，而且也将因此各自承受那神秘莫测但事实上亦并非英明异常的自然所降的磨难，即这样的情景又会重现：我将我的手伸向你，唯有一个心愿，别无他望，只愿你会是我的；而且，当你也将手伸向我并终于成为我的之际，我同时将对你在献身方面的作用加以限制，以便保留我所认为的自身的自由。……"破纸片上就剩下这几句话，它压在一堆笔记的下面，夹在我的一堆字条当中，所以可以肯定，我并没有把它放到妻子的茶杯旁，而是不知怎么搞的将它随手摆到我的笔记、我的字条里了；还可以肯定的是，我当时心里就是这么暗想的，一切都很自然，甚至这些想法本身就活生生地存在，**就像我过去也一直是偷偷摸摸地活着，而且这种活法就是我的真实生活**。不错，那时我已开始

逐步地构筑我的逃遁道路、我的海狸城堡体系，而且避开妻子的目光，防止她插手，以致我间或觉得，无疑是由于这条防护堤坝，妻子的行为举止里蕴含着一种愤懑。这一现象首先引起了我内心相对的愤懑，接下来又变成一种经久不散的痛苦，这一感触曾使我或者曾想使我把妻子的一时情绪看得远比其实际情况严重得多。其实根本无需花那么大的气力来讨好妻子，用上一个深思熟虑、恰如其分的词就行，可不是吗，一个合适的手势便足以达到目的。可我却紧抱着痛苦不放，显然是因为我在其中找到了被革除的感觉，但这种无法忍受的革除感却渴求一种心理平衡，而孤独的平衡感又在我心里形成了创造力，也就是说，这种力量刺激了我的神经，燃起了我那无与伦比、但只会把我逼得一次又一次地产生越来越强烈的自卫条件反射的工作欲望，激发了我的工作热情、我的工作干劲，一句话：整个魔鬼般的机制运转起来了，杀人夺命的旋转木马开动了，我先是被深深地沉入痛苦之中，接着又被高高地托了起来，然而这只是为了让我更深地落回到痛苦里去……可以肯定，百分之百地肯定，这一切也促使在我们激情重燃的夜晚——那是无数黑暗却又让人心明眼亮之夜中的一个，但其黑丝绒般的柔和光泽却与我如今夜里渐渐消失于冥冥之中的黑色亮光有着天壤之别——正是这一切促使我妻子在一个这样晦暗而又激情燃烧的夜晚对我说，对我们所有的问答，对涉及我们一生的这些问答，我们也只能用自己的全部生命，更确切地说，是全部用自己的生命来予以回答，因为任何超出此范围之外提出的问题，任何超出此范围作出的回答，都是不完整的问题和不完整的回答；我妻子说，而那种

完整性，她只能以一种方式来设想，因为，至少对她来说，任何别的完整都无法取代那唯一、彻底、**真正**的完整，那就是她想和我一起要个孩子。“不要!”我顿时、立即且毫不犹豫地回答，某种程度上是出于本能，因为这时候我们的本能与本能正在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而且几乎不是本能倒是反本能占了上风，甚至已将本能取而代之，久而久之这已经习惯成自然了；可我的妻子居然笑了起来，似乎我的这一声“不要!”不像真的“不要!”听起来那么坚决，或者好像她已经看透了我的一贯出尔反尔。她随后说，她理解我，知道我这一声“不要!”发自内心多深的地方，而且要把这话变成肯定的回答又有多难。我接着她的话茬说，我也认为自己可以理解她，知道她在想什么，这“不要!”就是“不要!”，并非她大概所想的那种“对犹太人说不”的态度，绝对不是。我说，这一点我完全可以肯定，肯定得连我自己都不敢肯定，这究竟算什么样的“不要!”即便有充分的理由“对犹太人说不”，那这“不要!”反正也仍然只是“不要!”两个字，但其实可怜、绝望地想象一次对话也就足够了：比方说想象那孩子的叫喊，是我们自己孩子的、你的叫喊；比方说，孩子听到了什么话，于是正扯开嗓子大叫；比方说，孩子叫道：“我不要做犹太人!”我说，孩子不愿做犹太人，这完全是可以想象而且也完全是可以理解的；那样的话我便会因为无言以对而陷入窘境，是啊，我们怎能逼迫一个生命去做犹太人呢；我说，那样的话，在这件事上，面对他、即面对你，我就总是抬不起头来，因为我对他、即对你是爱莫能助，既不能给他、即给你一个说法，也不能给他、即给你一种信仰、一件武器，因为我的犹太人的身份对我来说毫无意

义，确切点儿说，作为犹太人的身份这件事对我来说什么都不是，但作为经验却意味着我的一切；作为犹太人身份它是镜子前面一个身穿红睡裙的女人；作为经验它是我的生命，即我的幸存，是我生活和我当作精神存在形式来维护的精神存在形式，而且对我来说这就足够了，我对此心满意足，问题只不过是，孩子是否会满意，即你会不会满意。我说，尽管如此，我不会**对犹太人说不**，无论如何不会，因为没有什么比这一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理性的“不要！”这一“对犹太人说不”的做法，更加可耻、更加恶劣的了，没有什么比这更加具有破坏性和自我否认的杀伤力；我说，没有什么比这更廉价、更胆小的了；我说，杀人凶手和出卖人命者，以生命代言人的身份扯开嗓门自吹自擂的例子我见得太多了，实在是司空见惯，好像弄得我现在心里连点儿反感都懒得产生了；我说，为了取悦蔑视生命者而去蔑视生命，没什么比这更可怕、没什么比这更可耻的了；我说，就是在奥斯威辛的集中营里也还有孩子降生，而这理由我妻子当然爱听，即便我不大相信，她真的听明白了话里就连我自己很可能也不明白的含义。可不是吗，这以后大概没过多久，一天我要乘有轨电车去什么地方办事，我忘记是去哪儿、办什么事了，反正似乎我居然还有事情要办，尽管我在尘世的所有事情早都办完了。我凝视着车窗外呼啸闪过的景物，那画面总是出人意外地变幻莫测。车辘辘地向前开着，两旁是令人望而生畏的房屋，可怜兮兮的植被东一块西一块地散落其间。途中呼啦一下跳上来一家人，简直像搞突然袭击。我忘了说那是一个星期天，一个悄悄散发着其生命气息的星期天下午，当时气候已经有点暖和了。这一

家有五口人，父亲、母亲加上三个女儿，最小的女儿正好从襁褓里的棉胎中滑溜了出来，显露出粉色的肌肤、蓝色的眼睛和金色的头发，当时她嘴角淌着口水，使出吃奶劲儿大喊大叫，可能是因为太热了。一头褐发的母亲，便轻轻疲惫地把女儿抱上膝头，揽在怀里，自己那细长的脖子垂在孩子的身上，就像歌剧演员奔放的激情突然泄了气似的。二女儿则绷着个脸站在爱抚小妹妹的母亲身边，老大看上去大约七八岁的样子，她怀着一种与受冷落者同病相怜的感觉，把手臂搂住二妹肩膀，似乎想给她点安抚和劝慰，可谁知后者却不高兴地甩开了姐姐的手，好像她要自己独享母爱。然而她马上明白这已经没有希望了，比方说她过去惯用的伎俩——嚎啕大哭，现在已成了小妹妹的特权。于是老大只好孤零零地呆在一边，在这样一个和煦明亮的星期天下午，她不得不又一次遭受歧视，体验痛苦、孤独和嫉妒的滋味。我想，她的心态是不是会转为一种宽恕的顺其自然；我又想，或者不如说变成一根让她在封闭隔绝状态里听天由命的神经；我想，如果父母将她推入这样一种让她苟且偷安、忍辱度日的可怜生存境地，而她却不觉得蒙受羞辱的话，那对她和把她推入这一境地并且心安理得的每一个人来说就更加是一种奇耻大辱。那位当父亲的是个瘦高个，黑头发，戴副眼镜，喉结突出得像个瘤子，下面穿了条亚麻布的夏裤，光着的脚上套了双凉鞋，最后他伸出肤色发黄、瘦骨嶙峋的手，小家伙终于在他瘦削的双膝间不再闹了；五张脸上就像升腾起一条超验的信息，蓦然浮现出一种超越标志他们所有人特征之外的相似性：他们长得都难看，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外表寒酸可怜而内心纯真幸福。

我的矛盾心情在激烈斗争，厌恶与好感、恐怖的回忆与凄美的忧伤，一时间我仿佛看见他们额头和车厢墙壁上写着那喷烟吐火的两个灯光字幕：

“不要！”想必我永远不可能去做别人的父亲、成为其命运的一部分和其人生的主宰。

“不要！”永远不能再让一个孩子去不得不经受我曾不得不经受的遭遇，去体验我的童年。

“不要！”我心中咆哮着、怒吼着，我不允许他——也就是你——也包括我再去遭遇这一童年，绝对不行。于是我开始给我的妻子讲自己的童年，或许也是对我自己讲，我现在也搞不清了，反正我的叙述冗长烦琐，带有我强迫性倾诉欲的明显症状。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天天讲、周周讲，其实现在还在讲，尽管听众早就不是我的妻子了。当时我不仅开讲自己的童年，而且还开始在城里东游西逛，由于大体上熟悉了环境，我已经基本可以来去自如，那时这座城市正在重新变成一个在我脚下时不时张开的陷阱，以致我根本无法得知，如果我漫步穿过一条沉静的侧街——它就像个生了病的贵妇，夹杂在残宫断阙那零零星星、破败不堪的梦境般废墟之中，躺在由尖顶、风向标、精雕细刻的图饰、三角山墙和不透明的窗户所组成的童话世界的阴影里，沿街两边是一溜十分寒碜的屋前花园的黑色栏杆，这些园子看上去就跟经过洗劫一样，里面冷冷清清、空空荡荡，如同被遗弃的残破而又不失理性之光的出土文物发掘地——我不知道，如果走过这样一条街的话，我将会意外地发现自己站在一块什么样的浸透了巨大痛苦和屈

辱的土地上，我又将听从什么样的召唤；或者，如果另外一次我沦落到城市的——我是想说沦落到城市的直肠里，顺便说一句，如今我又搬回那儿住了，人们愿意的话可以说是因为缘分，或者有人更愿把这看成一种呆笨不灵。不过既然反正怎么说都行，只要我们呆笨之中还能有双眼睛去看清自己的命运，那最好还是称之为缘分吧，不对吗，可是当时我很可能以为——确切点讲，是鬼迷了心窍——误以为自己是无意中陷进去的，而且还偏偏陷到了这里，住进了这个被称作约瑟夫施塔特区的鬼地方，又恰恰是在这鬼地方与弗朗茨区那鬼地方的汇合之处，搬到了比如我今天还在住的地方，虽然那时我预制板楼里的预制板屋子也还只是那寒碜的建筑设计图上一个寒碜的草案。记得那是夏末的一个傍晚，街道沐浴在馥郁的芬芳之中，沿着路边的人行道东倒西歪地排列着一些昏沉沉、脏兮兮的房舍，小窗子里透出闪烁的灯光，夕阳的余辉像黄色黏稠的新酿葡萄酒，在院墙上涂抹，房门黑洞洞地大敞着，如同结了痂的伤口；当下我有点头晕，就扶着一个门把手或者谁知道什么东西，好支撑一下身体，一刹那我猛地触摸到了远古文明的奥秘——噢，可别以为是说那光阴易逝之奥秘，恰恰相反，我指的是事物残留之奥秘。一个杀人犯大概会有这种感觉，我这样想，后来也这样讲给我妻子听；为什么自己偏偏会想到这一点，是因为那所有死去的人，我这样想，也这样对妻子讲，即便话说得不合逻辑，但能听得懂；我对妻子说，如果将来我因为死去的一切，因为自己无法挽回的童年，因为我荒唐而且至少面对所有死者和失去的一切可谓荒唐的幸存而想起了这些，倘若如此，那大

概这也是个比方说早就忘记了自己罪行的杀人犯的心情。我这样想，也这样对妻子讲，而这种情况是可以想象的，一点都不稀奇。几十年以后，一定程度上出于遗忘或者简直就是因为机械地故伎重演，他突然间打开了通往犯罪现场的大门，一切情景都原封不动地再现于眼前：那些尸体，当然已经腐败为骷髅，那家具摆设衬托的现场情景以及他本人，都依然如故；即便显而易见的是，没有任何同一件东西和任何同一个人保留了下来，可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在经过一代人匆匆表演的插曲之后，一切又都成了同样的东西，甚至彼此还越来越相像。现在他明白了必须明白的事：让他重返此地绝非偶然，或许他再也不能从这儿出去了，因为这里是他必须忏悔赎罪的地方。我对妻子说，别问我为什么，有罪和赎罪是两个概念，只有生存能在两者之间建立起活生生的联系，当然只要它去建立。我对妻子说，如果这么做了，那生存本身就足以赎罪，就像书上写的：**el delito mayer des hombre es haber nacido**[①]。我还对妻子讲起了自己的一个梦，这是我过去老做的一个旧梦，已经相当长时间没有重温了，可那几天不知怎么的又卷土重来。这梦中的事情总是发生在同一个地点，总是在**那儿**，在那所位于街角的房子里。虽然我看不见周围的景物，但心里却能感觉到它的存在，也许是一所老宅那厚实、阴森的灰色院墙让我产生了这种猜想。这是家烟草店，门前砌着几级陡峭且不规则的石阶。拾级而上，恍若走进一个老鼠洞，里面黑咕隆咚的，一股

---

① 叔本华语，意为：人最大的罪过就是降生人世。

子腐臭味。不过这回梦中出现的烟草店远了一大截路，跑到了街角那房子的角落上。本来没必要走进去，可我还是进去了。里面不买烟草制品了，屋子也比原先亮堂了一些、大了一些，而且干燥了许多，暖和和的，像是一间阁楼。他们坐在一张放在水泥地面上的织锦面沙发上，对面从顶上不知何处——没准是天窗吧——投射进一道光束，照耀得厚厚的尘埃在里面飘舞飞扬。一切迹象都显示，她刚刚坐起来，而先前一直是躺在那儿，等待着我这个冷漠无情、让人绝望的孙子，来进行几十年前就该做的探访。就这样，两位老人呆在灰尘飞舞的光束里，一肚子的埋怨责备，他们身体虚弱得寸步难行。我把带来的火腿递给他们，老人很高兴，但怨气并未消解。他们唠唠叨叨的，可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我祖父把那张灰不溜秋胡子拉碴的脸凑到手里刚打开包装的火腿跟前，左看右看。我祖母脸上的尸斑已清晰可见，她抱怨说自己老是头疼耳鸣，埋怨我让她望眼欲穿地等了这么久。我发现，自己带来的火腿显得实在是礼轻情更轻。两位老人饥肠辘辘，孤苦伶仃。我像个小学生想努力解释什么一样，做了几个无可奈何的动作，心里犹如装着那垫台阶的石块，沉甸甸的。最后，一切画面都沉没了，随即又升腾起来，谜一样凄惨地烟消云散。我们为什么永远都得带着一张总要面对某种耻辱的脸活在世上呢？这是我当时记下来的话。我至今内容不断增加的语录集就是那一时期的产物，这一大沓字条被钉在一起，现在还丢在我桌子上的乱纸堆里。我随手拿起来，其中一张上写道：**朋友们，我们曾历尽艰辛，饱受自己青春年少之苦，如同身染顽疾**；另一条的内容则是：

我憎恨你，家庭！我接着读下去：**自己沦为童年这一死因的牺牲品；统治这一概念无论何种情况都意味着恐怖政权**；还有我自己对这一引语（出自托马斯·伯恩斯坦）的批注："而且恐怖政权无论何种情况都意味着父权统治"。然后我开始大声朗诵自己在字条上写下的批注，诸如："这便是教育义务之所在，而我无法认为这是与……"——"似鬼火去迷惑别人的梦境，在别人的生活中扮演角色、扮演父亲的角色，也就是说一个倒霉的角色，这是一件真正极为可怕的事情，其可怕之处在于……"——"（在我的童年，同时也是从那以来）我自己所安排的一切，都是罪孽，而我为否定和戕害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美德……"——"我的祖母**嘴里总有股子怪味**，真的，她呼出来的气息闻起来像石油，是约瑟夫施塔特区那座寓所特有的气味，一种王朝的时代错位的气味。那屋子里的黑暗、那时代的黑暗，继承了三十年代的黑暗并上升为病态。家具是深色的，房里的回廊将家居生活的场景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有奶咖啡的晚餐，弄成碎块放在钵子里的面饼，不许开灯的规矩，祖父在黑暗里看报的样子，**壁龛**的神秘角落里似乎总潜藏着什么晦暗、霉腐、阴险的念头，还有那每晚必不可少的消灭臭虫大行动……"——"我会逐步地用所有这些故事将你圈住，你原本与其毫无关系，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将会在你的四周筑起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童年是多么的不幸，我是如何迫不及待地渴望长大成人，因为自己觉得与成年人有秘密的盟约，而成年人自己在其为性虐待狂所包围的世界上，生活在绝对安全的保险箱里……"等等。我还对妻子讲起那淫雨纷纷的清

晨，每次周末过后父亲把我送回寄宿学校继续念书时，总遇到那种鬼天气。我对妻子说，在我的记忆中，好像每个星期一早晨都在下雨，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但这么说却挺形象的。那个晚上我对妻子讲，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在这样一个淫雨纷纷的早晨，我突然跳起来，扔下手里做的一切事情，放下作业，直奔那一别墅区而去，确切点说，是直奔当时还是这一别墅区、即我记得还是当时的别墅区的那个地方而去。那条街区到处都散布着童话世界般的房子，尖顶、风向标、精雕细刻的图饰和三角山墙比比皆是。其中一幢有尖顶、三角山墙和风向标的童话房宅便是我的寄宿学校。我刚把雨伞这一闪光发亮的人间怪诞的杰作收起，一个头发微白、看上去还挺结实的家伙就踏进了这所日趋衰败的房子——这里曾有我稀里糊涂的痛苦，也有我更加稀里糊涂的欢乐。这人戴了顶方格纹的布帽，手里拎着把湿淋淋的雨伞。晚上我故弄玄虚地和妻子神聊——胜利了还是失败了？我大概会怎样对待这人？倘若我当时真的注意到了这家伙，那大概是把他当成那种学监之类的校方管理班子中的一员，是跟上级部门一伙的。我也可能会以为他是个折腾学生的小提琴教师，反正我肯定会立即发现他有点与众不同，身上有些很惹眼的可笑之处，比方说，他和孩子们说话时显得呆板而且斟词酌句，就像个强奸杀人犯。我对妻子讲，在他身上，就其古里古怪、邋里邋遢的形象而言，没有半点与我给自己编织的成年之梦相似的地方。充其量我会羡慕他的自信，殊不知，那不过是种成年人特有的自信而已，是一种用自信来掩饰不自信的假象。关于这个不速之客，我当时还在笔记本上记了几

行，后来又把这几行字转摘到现在这本笔记本里。我写道："我来到寄宿学校，四下是一片荒芜，所有的一切都被毁了——房屋、生活、整个世界。尤其让我惊讶的是，墙上居然还挂着块纪念牌匾，上面写着：……**曾在这里生活和工作过**之类的字句。想必是为那位校长、校头儿、瓶塞（孩子们给他起的绰号）挂的。"谁会想到，他竟是个学者！而现在，在本世纪里，则普遍把那种一知半解的装腔作势称为科学。花园已经废了，里面尽是残砖断瓦，学校已被改成了住宅。那座两旁安有宽型石栏的台阶——那栏杆可以当滑梯玩，溜下来挺舒服的，上面藏着不知多少童年的秘密。特别是到了晚上，同学们你推我挤地上楼去睡觉，大家都累得两个眼皮直打架；夜幕降临，万籁俱寂，犹如飘落的雪花，把一切声息、故事和心愿都弱化、压下和制服了（有天晚上我突然发起了高烧，一个比我大十岁、名叫斯尔瓦思的农村男孩把我抱上了楼，然后问我**在哪间屋子就寝**，可我却无言以对，因为对于当时五岁的我来说，**就寝**还是个生词，以致我误[悟]解不了其含义）——这座台阶——我们还是回到这话题上吧——这台阶变得龌龊不堪……那一排原先作集体寝室的大房间已经被分解成好多间小屋，租房者一户挨着一户……有校领导的住房，校长的住房，那可是间可怕的、沉寂无声同时也让我们不敢出声、踮起脚尖走路的屋子。房门的球形把手不是锃亮的黄铜材质，而被灰色的铝制品取代，就像被胜利者在屁股上踢了一脚……中间的一层楼原是学生自习室，从前每到下午的作业时间，那些地位差人一等的**低年级学生**和让人嫉妒的**高年级学生**就聚集在这儿用功学习。那时

有监督室内安静秩序的值班老师，还有某些代数作业那很有分量、令人肃然起敬、深奥玄妙的难题，而现在这些房间成了许多家庭的栖身之地。楼道里熙来攘往、热闹喧哗地过起了日子，走廊上弥漫着煮饭烧菜的香味……所有固定的形式规范都解体、崩溃了，司空见惯的东西成了瓦解性的力量、直至最终变为死神……那**半沉式的地下室**、食堂、**禁闭室**、活动室（打乒乓球的地方），尤其是**集合点名**的地方，一般不让人进，牌子上写着**电影俱乐部，凭票入场**之类的话语。行，接下来我想象一下食堂的样子。这样甚至更好，以免所谓的**现实**让我难以接受（是指他们的现实）。位于半沉式地下室里的食堂是一个极为宽敞的大厅，外面的光线透过高高的窗洞照亮了对称排列的一行行铺着白布的餐桌。对了，还有早餐！那可是一天当中唯一隆重的仪式（当然除了星期六的集中点名外），虽然秩序井然，但却可以让人浮想联翩。餐桌旁有指定给我的座位，桌上有我用早餐的餐具，餐具边放着套餐巾的木环，木环上烙有罗马数字 I 的标记，我的餐巾上也同样印了个罗马数字 I，这是我在学校的代号，就好比我在其他时期其他地方获得的其他数字一样（今天我的名字里有一组 11 位身份识别数字忽隐忽现，它们出没于陌生迷宫的缝隙接头之中，与我如影随形，简直是另一个秘密的我，虽然自己一生都在替其承担责任并因其所施和被人所施的事情而饱经患难，可我却对其一无所知）。不过这个罗马数字 I 确实是个很有品味的开端，它好看而又像诸文化的黎明那样孕育着希望，因为在寄宿学校里我是年龄最小的孩子……等等。我们站在各自的座位旁边，大家都刚洗漱完毕，

脸上个个光鲜，头脑清醒而腹中空空。（我老是饿，饿个没完。）餐桌的一头立着一个老师，每张桌子都是这样。老师轻声地作着祷告，话不多，小心翼翼的，可以说都是外交辞令。他得留神，既不能独遵犹太教的礼仪，也不可以全奉基督教的教规，也就是说，他必须两者兼顾，每个上帝都得伺候到。**主，请赐予我们每日之面包**——我们背诵道，不大准确，但差不多是这个意思。（相反，晚上我则用德语祈祷：**我已疲劳，要去睡觉**……等等。）一开始我一个词也不懂，但我学得很快，同时也因此迅速掌握了祈祷那具有镇静作用的单调哼吟和强迫人信服的反复背诵。错过这种独特的卫生保健曾像忘记了刷牙一样，给我的心灵留下深深的创伤……有必要重新回忆一下的是我童年时代的那种强烈、被迫、特有的虔诚，起初主要还是一种万物有灵论的思想，后来又吸收了可透视一切、自身却看不见的 X 射线式眼光，不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我十周岁以后才发生的事，那时父亲开始接管了**对我的教育**……继续吧——禁闭室是一个黑黢黢的杂物储藏室，里面爬满了乱七八糟的小虫子。有一回我被关了进去，于是便条分缕析找原因：是因为我喜欢孤独，热爱生病，迷恋高烧时云里雾里的感觉，早期的颓废倾向，抑或还是因为我天经地义地不愿与人为伍？我无精打采地一个人躺在偌大的集体寝室的一角，凝视着太阳慢慢地爬上院子里那株大橡树的树梢，有只猫迈着它无比优美的步子，卷起尾巴尖，在对面烟囱、尖顶、暗角林立的房顶上，沿着险象环生的屋檐溜达。最后，到了晚上我突然觉得胃部一阵压痛，本来整个下午胃里就好像揣了块石头，沉甸甸的不舒服。楼

梯上传来脚步声，随即嗵嗵地到了走廊。是其他的同学，**他们来了**，我悄悄对自己说，脸色苍白，仿佛听到了一条灾难报道。其实，我是早晨喝了那份照顾我贫血的特供牛奶胃就开始不舒服的。（那老式牛奶瓶真漂亮，它们摆在外面的那副样子，如此温文尔雅，晶莹剔透，就像光滑、印有细密直线条纹、刻着精致凹槽的瓶身上那转瞬即逝的露珠。）那牛奶我是必须喝的，可喝完了之后胃就一直疼，都疼到心窝里了，痛苦得我缩成一团，如同被击倒在地并再也爬不起来的拳击手。在**禁闭室**里，末了我心里还是不由得一阵顾影自怜。我很清楚，如果要让那帮人称心如意地欣赏他们想象中我应遭受的折磨的话，那么当锁咔嗒一声被打开、我被放出来之际，正是自己要做出一副悔不当初的样子之时。（究竟是我凭着与生俱来的阴险狡猾靠直觉掌握了这点儿小花招，还是自己很早就把这一套学到了手，也就是说因为**教育成功得法**、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那时我早就看透了，对一个小孩子来说，这个世界是一个何等丑恶的地方（当时我还不知道的是，只要我不改变自己，那么这种状况以后也一点不会有所改变）……接下来是头痛，这事必须回忆一下，精确点儿说是偏头痛。一痛起来我连动都不能动，闭着眼睛还觉得光线刺人。这事我从来不敢对人说，因为我不相信别人会信我的话，能相信这事是可信的。我认为，这件事也和剩下的事、所有的事一样，是我自己秘密的并应予以保密的一大内疚。最后我也不再相信自己的脑袋会痛了，这也可谓教育的一大成果……需要好好想想的是，五岁到十岁以及直到最后这段岁月是怎样熬过来的。简直令人难以想象。可情

形究竟如何？显然和别人一样，和所有的人一样，是在野蛮、非理性的暴力中滚过来的，同我的理性正好相反，也是在疯狂之中，在一种将臣民的疯狂与统治者的疯狂区分开（或者说将两者合在一起）的疯狂之中度过的。第一个非理性的因素是我父母的离婚，这件事之所以令人感兴趣，主要是考虑到其后果使我走进了寄宿学校。要是我探究他们离婚的原因，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都是同样的回答：**因为我们彼此不能理解**。为什么呢？可俩人说的都是匈牙利语呀。当时我是无法明白，既然他们以前曾一度相互**理解**过，怎么可能又互相**不**理解了呢。然而，这便是当时最后的决定，也是最后到接近没有理由的理由。我揣测，这件事情背后必有某种重要、复杂并且估计是肮脏的秘密，会迫使我接受这一事实。这简直像是一场灾难，我只能逆来顺受，而且理解得越少，承受得就越多（因为灾难性就越重）。另一个非理性因素可以说是和父亲一起按时乘有轨电车这件事。我们坐车去哪儿、找谁、干什么，这我已记不清了。这事的重要性整个来看远比离婚要轻多了。尽管如此，还是得说说。我们每次都要在一个车站下车，好为了继续顺着电车前进的方向步行到目的地。我当时心里犯嘀咕，觉得要是我们坐到下一站再下车的话，那么只需往回跑几步路就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然而父亲的回答却是：**我从不往回走路**。我问：**为什么不往回走**？回答是：**因为我不往回走**。我再问：**可为什么呢**？父亲再次回答道：**我说过了，因为我不往回走**。我觉得这坚定不移的语气里必藏着某种深刻的含义，只不过我无法将其点穿。我完全是一筹莫展，垂头丧气，恰似面对着一个公开的秘密

而无计可施。毕竟不存在其他的可能性，我**不得不**推断，这是父亲所代表的一种虽然看不见但却无可辩驳的合法性，那就是他拥有的凌驾于我之上的权力。我写道："神经病和暴力成了关系独一无二、构筑体系的形式，圆滑处世是幸存的唯一可能，俯首帖耳属每日的生活实践，神经错乱则为最终结果。"**过去的文化变成了一堆废墟，最后则化作一堆灰烬，可这灰烬上空飘浮着精灵**，这也是我其中一张字条上记的话（维特根斯坦语）。我写道："……我站在那儿，打着我的雨伞，心里为这座设施，为这所**富有的、国家承认的男生寄宿学校**那让人喘不过气来的秘密所激动。这秘密至今仍在秋天潮湿的空气中飘荡，像那笼罩在古墓四周的悲凄的沉寂。这时突然——怎么说呢——突然，**这过去的文化**浸透我的全身，恰似那无处不渗的淋巴液一样，那是父权文化，是那囊括世界的恋父情结"。我对妻子说，后来，每当读到有关教会学校、神学院或者军校的描写时，我都会时不时地觉得其中有我"母校"的影子，尽管具体情况当然大不相同。这些学校都客气得多、荒唐得多，总而言之也变态反常得多。而这些是我在好多年之后，才在那完美的耻辱之镜里真正完全认清的。我还说，其实这些都建立在简单的原则上，建立在权威的原则、权威性的父权原则之上。这实际上就是复制了外部世界的原则，又从这些原则——也许是习惯、是某种奇怪的谬误或发展成奇怪谬误的一种习惯——从这些原则里派生出一种对统治权力的要求。我对妻子讲，在那培养过匈牙利各个时期国父级篡权摄政者的教室的墙壁上，悬挂着奥匈帝国皇帝陛下以及总书记和第一书记们的画像，其中，

当时那个被尊为匈牙利国家临时元首[①]的阁下大人显得格外醒目，此君头戴海军上将军帽，一身神秘、配有肩饰的制服。我对妻子说，所以后来我起了疑心，觉得很可能是盎格鲁萨克逊人的领导和教育原则，加上一些奥—德或者奥—匈或者德—奥—匈—同化人口——犹太的少数民族血统，效仿当地的一方神圣，影响了寄宿学校的管理；然而，我对妻子说，然而无论怎么讲其中的区别在于，这里不是世界帝国精英的摇篮，而是布达佩斯中、小以及小小市民的产地。艰苦朴素的原则最先体现在膳食上，孩子们的食品竟被身为学者又受盎格鲁萨克逊理想熏陶的校领导偷了，显然还是跟土地神学的。我还对妻子提起了纪念牌匾，告诉她，那些玩意儿是如何让我惊愕万分的，如果我愿意的话，肯定可以了解得更多，我是指那些纪念牌匾，诸如其来龙去脉，等等，不过就我这方面而言，自己根本不想再多了解什么。我对她说，不管怎么讲，不容争辩的事实是，那个人——我们的校长兼学校的业主——他周身环绕着巨大的权威之光环，可这威信里不含半点高层次事物应得的真正尊重，而校长的飞扬跋扈也和任何权威一样，只是建立在精心组织的群众害怕之上的。其实他本人长得更像个可笑的小丑（说到这儿，我提起了我们一帮小孩给他起的外号"瓶塞"），矮墩墩的个头，又长又密、白里泛黄的小胡子挂在嘴边，白晃晃的蓬头乱发倒像个搞艺术的，而灰色马甲下腆着的那

① 指霍尔蒂·米克洛什，1920年通过自由选举被任命为摄政者，他的军衔为海军上将，而当时的匈牙利却无一兵一卒的海军部队。

个大西瓜肚，恰似从他身体上游离出的一个部分。我对妻子说，那么基本上就是这些事了，多的她也不必去想，既没残暴行径也无粗言恶语使我们产生害怕。我对她说，亲爱的，因为害怕是通过不同的变种来发挥其作用的，而且恰恰如果害怕已固属于世界秩序里的一部分，那么它常常只不过是一种迷信。老师们害怕校长，他们至少做出一副害怕他的样子。他们经常引用校长讲的话，只要他在哪儿出现，哪儿的人声立马就会变成叽叽咕咕的窃窃私语，人人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口。校长来了！校长来了！可事实上他很少来。他总是在二楼那俨如要塞般的住房里发号施令，其实传达这些指示、通知和意愿，他连口都不用开人家就知道他的意思，可谓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我们就生活在这要塞的阴影之下，脸始终冲着威严所在的方向，窥探里面的动静，人却缩在其阴影里，胆小如鼠。当时的事情都很有规矩，而且谁也不去怀疑这规矩的基础，这令人压抑、憋气的规矩又给自己蒙上了一层官方的开朗色彩。固定游戏规则的精神，体育素质的精神，临阵备考的精神，**高班生**毕业文凭的精神，这些都是时尚的精神，但又都饱含着古典的传统，充满了民族的内涵、民族的宣传、民族的悲哀、民族的保证。我对妻子讲，自己记得，有一则天方夜谭广为流传，说位于地下室的厨房里的锅盘碗盏，常常会经后门直通楼上要塞的暗梯，被送到上面去。每当我们中午四个一堆在捞稀薄的柿椒土豆汤里的香肠或五个一群在吃晚茶饼干时，总是有人在此前看见，校长及其家人的餐桌上摆放的是什么。我对妻子说，亲爱的，你我都清楚，特权阶层就是要强化他们的威信，而我们这些俯首

听命者，则用那仇视与艳羡参半的心理来接受他们的这种炫耀，这的确是我们生活的普遍模棱两可之性质的最佳写照。虽然这种规矩时不时会稀里哗啦地轰然坍塌，跌进充满淫荡笑声的深谷，从谷底会传上来住在下面的魔头们嘈杂的狂呼乱叫，从那下面又会有昔日的政权、要塞、秩序重新浮出水面，像艘从深海里打捞上来的沉船，尽管千疮百孔，但却虽破犹荣。我对妻子说，这简直是丑闻，人们就把这样一种无法遏制的、总是出乎意料而且可谓充满肉欲的堕落叫作丑闻。她大概得这样想象一下，犹如一个喝醉酒的人在顽强地保持了好长一段时间的站立姿势后，突然经不住诱惑，一下子松软了下来，直挺挺地摔倒在地。是啊，那些出格的行为都跟这是同样的道理。顺便再补充一句，此人的清醒也无非是一种出格，而且是脚底下不踏实的出格。从这层意义上来讲，清醒只是更高级的醉态。我给妻子讲了其中的一个丑闻，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一天早晨，那个叫“长矛”的辅导员——一个骨瘦如柴、上了年纪、铁面无私的家伙——巡查寝室大厅时发现我们当中少了一人，那是个**高年级的学生**，十七岁的小伙子，我至今还能记得他有一口白净的牙齿，生动的脸庞，褐色的长发，笑起来挺爽朗的。同时（也许是在此之前）辅导员还发觉，走廊尽头的那间小屋被锁住了，而且是从里面反锁上的，打不开来。同时（也许是在此之前）厨房里有人报告，说“新来的女工”不见了。那女孩的模样我也能记起来，她围着条女佣的围裙，在餐桌旁给我们端这送那的，其实我也只能回忆起她金色的鬈发和那十分典型、可以说典型得跟夏娃似的微笑。据说这两人晚上就把自己反

锁了起来，一块儿上床了。“长矛”使劲地擂门，里面发出一阵窸窣的响动，传出几句低声的耳语，尔后就鸦雀无声了。门还是没有开，“长矛”向出格的学生发出了警告，嘴里喋喋不休的。不一会儿校长来了，他脸色通红，须发飘舞，西瓜肚上起下伏，而我们这些等着看好戏的小鬼头都紧贴着墙，给他让开一条道。他像盖世太保那样用力拧了拧门把，又挥动双拳狠命地砸门，那样子就像一出蹩脚喜剧中戴绿帽子的丈夫。接下来的事我就只对那个公布的开除通告（那女孩自不必说被当即扫地出门）有些印象，此外还记得那个吹毛求疵、假装正经而且用心险恶的讲话，记得我们都站在那个**高年级学生**的一边，大家都一言不发，保持沉默。我对妻子讲，你或许会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今天我才明白，我当时的负疚感，我的知罪意识，我的害怕和廉耻之心以及我在这整个过程中所感觉到的那种令人憋气窒息的东西，这一切究竟从何而来。我对妻子说，今天我才明白，自己当时在那所代表父权的父系寄宿学校里看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礼教场面。那是一次**公开的阉割**，而且为了以儆效尤竟**在我们的参与下**进行实施，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同学作为**恐吓我们**的牺牲品被人阉割时，我们竟为虎作伥，让人通过这一仪式把我们变成了一次极端变态仪式的极端变态的参与者。我说，至于他们这么干是有意而为，还只是出于习惯，是出于纯粹的**教育习惯**，出于一种害人教育的害人习惯，这都无所谓。再比方说每个星期六下午的集合点名，我对妻子讲，要她也想象一下那种情景：先搬来几条长餐桌，把它们拼成一个硕大的长台，再在上面铺上白桌布，整个活动都在食堂里进行。

然后才放我们这些住读生进去，这样一来，如果要整队入场的话，那我们在那一长排白色的空桌以及桌子后面成排的椅子摆放好之前，就已经按部就班地排好了队。随即，压抑的气氛便如同一团近可触摸的块垒，山一般地朝我们压下来。这时，大都会有某个二级辅导员，不过有时也可能是二级教工中职位较高的一个人，拿来一个黑色封面的大本子，一言不发地将它放在桌子的中央，这便是点名册。接下来又是默默的等待，在场的人都盯着椅子、桌子，望着那黑不溜秋地平摊在白色桌面上的缄默不语、阴险凶恶的点名册发呆，气氛越来越令人绝望。就在此时，当大家都忐忑不安、长吁短叹乃至全面崩溃之际，**校长**率领着众教师走进了会场。入座，死一般的寂静，戴上眼镜，清清嗓子，挪挪椅子。见紧张的气氛已经上升到了极点，校长终于打开了世界末日记录般的黑本子。每个人都在册，包括这人的一切罪孽和一切美德。点名依次按顺序进行，点到名的人要出列，走上前去，面前是高居于桌后的当权者，背后是与己分离了的温暖集体。他只能站在两者之间的空当里，形单影只地打哆嗦。虽然每个人头脑中对自己的学习成绩和旷课情况大概都有一本账，但谁心里也没有底，都得做好随时遭受意外打击的准备。校长默默地看一遍当周的考勤记录，然后同左右一番交头接耳，低声问问教师的意见，后者则一会儿把耳朵、一会儿把嘴巴凑过去，随后就是宣布判决。其内容可能是责备、表扬或者训斥处罚。你可以被树为别人的榜样，也可能被取消星期六甚至星期天外出的权利。我对妻子说，其实这倒不算回事，关键是这一仪式，这种**活动程序**才是问题所在。

我感觉到，自己或许根本就不该把这一切告诉给妻子，不管怎么说不可以这样一天天、一周周地只对她谈这些破事儿。因为没准这让她觉得相当无聊并且肯定倍受折磨，就像我也以此折磨自己一样，当然远不如我折磨她那么厉害。确切点儿说，不仅我没把自己折磨得那么痛苦，而且还痛苦得跟她不一样。可以说，我折磨自己的成果要比对她的折磨大。这一点我在讲述时、在对我妻子讲述自己的童年时就已经感到了。当时我就已经清楚地觉得，在自己的叙述过程中，我童年的旧疮口是怎样因为新的危情而突然不断地长大、肿胀、绷紧，好像要迸裂而且最终也迸裂了的。所以，我的确是在用这种讲述折磨自己，可同时我也觉得通过讲述、通过这种折磨如释重负。我对妻子说，那种仪式，打个比方吧，就像一个军人想象中的古时当庭决斗的神意裁判，对了，这仪式简直像奥斯威辛的集合点名，但还不够自然逼真，而是有点做戏。我对妻子说，后来我得知，校长大人也在当地的一座焚化炉里化作了一缕轻烟。如果我不得不认为，这一事实在某种意义上是最终的证实，那么这很可能依然还是我从校长那儿接受的教育所创造的一项成果，是他曾相信并要通过言传身教要我也相信的那种文化的成果。我对妻子讲，脱离了这样一个从根本上来看比其他地方更冷漠、人际关系更疏远、同时也更容易把握的教育独裁世界，我忽然落到了一种家长制、热心肠的恐怖统治之下：十岁那年，父亲把我接到他那儿去了。我记得，那段时间我也多次尝试，想把自己对父亲的感觉记录下来，画一幅——怎么说好呢，一幅我与父亲之间那相当复杂的关系的素描。这种关系即便自然不

会是公正的，但起码还可以说是明确的，因为我们又如何能公正地对待我们的父辈呢，而我自己又怎能公正地对待真理呢！对我来说只有一个真理，那就是**我的真理**，即便它是谬误，仍不失为真理，因为仅我的生命，噢，上帝！仅我的生命就足以将我的谬误圣化为绝无仅有的真理。我试着要把这素描画得多少能够让人接受，我是指描绘我父亲和我对父亲的情感以及我与父亲的关系的这幅画，然而我从未成功过。今天我明白了，这也根本不可能成功，而且我差不多还明白了——不管怎样说是有所预感，或者至少推测到了——从那以来我也只能不断地去做这种尝试，即使最终到了今天也做不了任何别的事情，而且即使现在仍旧一如既往，还在徒劳无益地尝试。“我得让自己能够去想象，父亲当时要想自己找到那条与我沟通的路，可谓比登天还难……”——我曾这样写道，“……跟他对待自己一样，父亲同我的关系也很压抑，但他肯定把这称之为爱而且也认为这就是爱。不错，倘若我们从该词荒谬的一面来接受它，再对其虐待折磨的内容忽略不计的话，这的确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爱。”我对妻子说，在上寄宿学校时，我总和一条自己虽然害怕但又从未当回事的法则过不去。这条法则原本貌似一种运气和命数，它可以使我粉身碎骨，也可以让我飞黄腾达，但却从来没有一次触动过我的良心，因为只有当我沦为爱的俘虏时，我才觉得自己是真正有罪的人。我对妻子说，童年时代的这段经历使我的思想陷入了极其狭隘、短视的危机。我曾生活在一个泛灵论的宗教世界里，跟原始人一样，自己的思想为如此之多禁忌所包围，以致我几乎把它们视为物质的力量，

我相信它们的万能。我对妻子说，可是随后而且无疑是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也假设有那么个万能的人，可以在我的想法产生的一瞬间就识别它、权衡它，然而我经常冒出些无法权衡的想法来。我对妻子讲，比方说，我父亲有个不好的习惯，他时不时要对我进行语重心长的教育，而老调重弹则是难以避免的，也就是说，我常常知道他要讲什么，仿佛我要考问他一篇课文，自己已悄悄地读到了前头，而他还在老老实实跟在后面念。我对妻子说，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又夺回了自由，可是我后背也不由得一阵发凉，于是便心惊肉跳地想找点什么来保持镇静，比如像发现他衬衣的领角皱褶了，一只手在微微地颤抖啦，额头上皱纹成堆啦，一番苦口婆心却无半点用处啦——随便什么，只要能让我像块干海绵似的松软下来就行。接下来我终于可以在心里说出那个解脱自己的词了，它象征着我大获全胜，同时也给我留下了紧急撤退的后路——我在心里喊了一声：**真可怜**……随即海绵开始膨胀，我为自己的被感动而感动得热泪盈眶，这样我也抵消了一部分由于那危险的父爱而时常背负在我身上的罪责。当妻子问我，假如这一切或尽管这一切，即使考虑到这个词的双重以及多重含义，我到底爱不爱我父亲，我回答道，我不知道，而且也很难知道，因为鉴于他对我的所有指责和要求，我一直都认为、觉得和发现，也就是说，我不得不这样认为、觉得和发现，我并不爱他，或者说至少爱得不真、不**够**。而正因为我不**能够**爱他，所以我很可能也就不爱他。我对妻子讲，说句没良心的话，我认为这也很正常，都是命中注定的，因为这样而且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按理想俗套构筑**

的生存。统治体制是无可辩驳的，其规范制约着我们生存的法律是不容置疑的，可我们却永远无法毫无保留地与之保持一致。我对妻子说，在父辈和上帝面前我们是有罪的。而父亲到头来恰恰是培养我做好接受这一事实的准备，接受这一如同那所寄宿学校一样的**文化**，显然，至于其目的何在，他的深思跟我对自己的拒从、不服和失败的熟虑都嫌太少。我对妻子说，虽然我们相互无法沟通，但我们的配合却堪称天衣无缝。即便我诚心实意也说不好，自己究竟爱不爱父亲，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我经常真切诚挚地对他深表同情。我对妻子说，但是如果我通过偶尔拿父亲开涮并因此来怜悯他的这种方式，秘而不宣地、总是这样秘而不宣地推翻其父权统治、推翻权威、推翻上帝的话，那么不仅是他——我的父亲——失去了统治我的权力，而且我也会因而寂寞得直打寒战。我对妻子说，我需要一个暴君来重塑世界在我心目中的形象，而父亲也从未尝试过，用另外的观点来取代我对充斥着篡权夺位的世界的看法，比方说用我们共同的任人摆布的命运，即用真实的情况来取而代之。我对妻子说，如同我是个糟儿子、差学生一样，我也是个坏犹太佬。我对妻子说，我的犹太身份仍然是与生俱来的一个谜团，是我错误中的一错再错，是那镜子前面身穿红睡裙的光头女人。当然，我还对妻子讲了许多别的事情，今天我已经无法全都想起来了。不过我记得，这一切把她折腾得够呛，就跟我当时和现在一样，有些筋疲力尽了。我对她说，奥斯威辛发生的事，只不过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已接受的美德教育的夸张而已。是的，我对妻子说，那时，从童年以及接受教育

起，我便踏上了充满磨难的心路历程，开始了我从未完成过的幸存之幸存的人生。我对妻子说，在那针对我的生存悄悄形成的阴谋集团里，我是一个积极性一般、并非始终无可挑剔的成员。我对妻子说，我从父亲的肖像里就能看到奥斯威辛的影子，的确，父亲和奥斯威辛这两个词能在我心中引起同样的共鸣。如果说上帝确实是个被人颂扬的父亲，那么他就是在奥斯威辛的形象里向我显现了他的尊容。我终于停止了讲述，在说了这么多话之后开始了长时间、也许是连续数日的沉默。妻子看上去虽然疲惫不堪，可实际上她似乎并没按我讲的那样来明白我所讲的事情，也就是说，好像她并没发现——不过发现了也没用——没发现我当然完全清楚，是我毫无道理（至少我可以这么说）、毫无意义而且很可能只是因为她是我的唯一听众而把自己的满腔愤怒——为了在此、在这点上不必使用“激动心情”这个的确不恰当的词——把自己的满腔愤怒实际上全都对准了她。我的意思是，好像我妻子觉得，我在倾诉衷肠之后把自己整个释放出来、吐出来了，同时也彻底**解脱**了自己，仿佛我能够彻底解脱自己而且彻底解脱自己是可以做到似的。是啊，当我发现妻子有几次犹犹豫豫地想靠近我、试图用**理解**来拉近我们的距离时，我觉得，也许她就是这么想的。当然，我将此拒之门外；倘若这实际上只会证实我任人摆布的处境的话，我当然不能容忍任何对我的**理解**。不过这些与那来自不可抗拒的自然之力的认识相比，纯属小事一桩，这一认识很可能仅仅是在**我的方法**、即我对待妻子的过程中形成的，或者说——对了，在我醒悟之夜的最后时辰，我必须使用放在

这里十分贴切的这个词,因为只有它可以澄清事实——或者说是在我虐待妻子的方法中形成的。的确,我竟如此残酷、**用如此亲昵的关系残酷地**对待她,这使她在我眼里显得永远不可接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当然是夸张啦,而且我现在要说的是个大夸张——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像我把她给杀了,同时她也成了这起凶杀案的证人,目睹了而且在一边旁观了我怎样把一个人杀死的过程。看来,这一点似乎我永远不能原谅她。在这方面去考虑时间是多余的,例如去考虑我们究竟还会、还能够这样相对无言地并肩生活多久。我受到沉重的精神打击倒下了,手足无措且孤立无援。这一回我伤得很厉害,事实证明损失是无法弥补的,也就是说我的工作不能再向前推进,而相反它完全陷于瘫痪。我不能完全肯定,当我一方面——自然是在内心——在罗织指控我妻子的罪名时,是不是另一方面又在暗暗地期待着她的帮助。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却没有给她一个明显的暗示。有一天,如果没记错的话是在晚上,而且可以肯定我没记错,再补充一点——是在晚上很晚的时候,我妻子刚从不知什么地方回到家里。我反正不知道她是从哪儿回来,也没对她刨根问底,甚至连问都没问。她长得很美,那一瞬间恰似浓云密雾后发出的闪电,一个念头倏然掠过我的脑海:“多美的犹太女子呀!”她走路的样子,平淡自然,饱受屈辱并凄切悲哀,我的眼前又浮现出她仿佛涉过海水般青绿色的地毯款款走来的景象。这天晚上,我的妻子,她终于打破了沉默,打破了我们的沉默,问:天已经有点晚了,怎么我还坐在那儿看书。妻子接着说,她很不好意思,因为先前一直在忙事

儿，不过我反正是不会对她的事感兴趣的。她又说，我坐在这儿看书，或读或写，或**又**读**又**写，到头来结果都一样。是啊，妻子说，这对她是个很好的教训，这一切，即我们的婚姻。妻子说，通过我她搞懂了也得知了她根据自己父母的经验没有搞懂也不想搞懂的一切。其原因在于——这一点她今天明白了——在于如果当时要搞懂这所有的一切，那非要了她这个小姑娘的命不可。妻子说，在心灵的深处，她好长一段时间都暗暗地把自己当成一个胆小鬼。然而她现在明白了——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我和她与我共同度过的这些岁月——那么她现在明白了，她其实就是想活着，就是得活着。妻子说，即便现在，现在她内心的一切也依然在说，她要活着。她对我深表遗憾，而且最遗憾的是，她不得不爱莫能助地对我表示遗憾。不过她也尽了最大努力**来拯救我**（此时我缄口不言，尽管她话里的用词让我不胜惊讶）。妻子继续讲道，不过仅出于感恩戴德之情我就给她指了条道，但这恰恰是条我无法伴其同行的路，因为我心中的那些创伤比我的理性要厉害得多，尽管我也许可以让人治愈这些伤口，但看起来，至少在她看来，我过去和现在都不愿让人去医治它们，为此我们付出了爱情和婚姻的代价。她又接着说，还令她遗憾的是，别人把我给毁了，而且我也听之任之、自甘毁灭，但一开始她不是这么看的，正相反，我妻子说，一开始虽然是别人把我给毁了，但我却没有自甘毁灭，当时她是这么看我来着，而她**恰恰欣赏我的这一点**。妻子说，看错了人还没多大关系，虽然她心里无疑不是滋味，但还不至于产生失望的感觉。她又重复了一遍刚刚讲过的话，说她曾想拯救

我，然而徒劳无益，她所有努力、奉献、爱情所作的无用功，慢慢地扼杀了她给予我奉献、爱情的积极性，最后只在她心里留下一种无济于事、徒劳无益和倒霉不幸的感觉。她说，我总是大谈特谈自由，可是我常挂在嘴边的自由实际上并不意味着我职业的自由、艺术家（我妻子就这么说的）的自由，实际上甚至就连包容了宽广、强大、开放以及责任和**爱情**内涵的自由都不是。我妻子说，她就是这么认为的，我的自由实际上只是一种**针对**某事、**针对**某人、或**针对**随便什么事、随便什么人而提出的自由。她还说，进还是退，或者两者并举，没有这些行为根本就不存在我的自由，因为没有这些——似乎如此——自由也根本不可能存在。妻子对我说，所以如果这“某事或某人”根本不存在的话，那我就会去发明创造这种先决条件，以便能找到什么可以让我进或退的理由。她说，鉴于这一次也同多年来一样，我依然残酷而又阴险地让她扮演这可怕的——她觉得，这一回我大概想让她实话实说吧——扮演这**可怜的**角色（为了使用我的口头禅），不过这并非像谈恋爱的男人为了找个陪衬而让人扮演他的情人，也不似患者总爱把别人当作医生好对其诉说痛苦；我妻子说，我把这个角色分配给她（她又一次使用了我最喜欢说的一个词），就如同凶手让人扮演被害人的角色一样。她说，我用我的思想打死了她，然后在她心里唤起了同情，又在她的同情心苏醒之后，将她当作我的听众，让她倾听我那恐怖的童年和那些可怕的故事。而当她想分担参与我的故事，从而引导我走出其中的迷宫和污泥浊水，回归自身，回归她的爱，以便我们尔后可以**共同**蹚出这片沼泽，并且永远把它

抛在身后，犹如一场大病过后的一种回顾，就在这时，我却突然松开了她的手（我妻子就是这样说的），离她而去，跑回到沼泽里。妻子说，她可没有力气再次而且谁知道还要多少次跟着我跑回去，又把我重新带出来。我妻子说，因为看起来，似乎我根本不愿蹚出那片泥潭。显然，对我来说，自己恐怖的童年和可怕的故事是没有出路的。不管她做什么，妻子说，甚至就是把命都搭上，她很清楚，也全是白费劲。是的，我们邂逅人生时（这词儿可是我妻子用的），她曾觉得好像是我在教她如何**生存**。可后来她却吃惊地发现，我身上潜藏着不知多少破坏性的力量，而且在我这儿等待她的并不是生存而是对生存的毁灭。我妻子说，原因在于那种病态的意识，一种有病的、中毒的意识。她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说这是种一旦沾染便永难清除的永久性中毒、有毒并传毒的意识。妻子说，如果你要生存的话，就必须清除这种意识，对，一定得摆脱、挣脱它的纠缠。她又重复道，她已经决定要生存下去。说到这儿，我妻子沉默了片刻，她站在那儿，双肩微微耸起，两臂交叉抱在胸前，形单影只，战战兢兢，面色苍白，口红已被摩擦得一塌糊涂。见她这副样子，我心里猛然或者说必然涌出一种担忧，我觉得她可能有点冷。而她还接着对我说，吐词又快又清晰，仿佛是在报道一条她一旦能向我宣布就会瞬间失去其刺激性的坏消息。她说，既然话说到这份上了，那也没什么可隐瞒的了，她“有人了”，有她认为可以托付终身的人了。她还说，而且**这人**不是犹太人。有意思的也许是，直到这时我才开口发言，好像我觉得妻子所说的一切话里只有这条消息是不合理的。她把

我当成什么人了，大概是个差劲的种族卫道士吧?! 我对她大声吼叫，我叫嚷道，说自己本不必非得在奥斯威辛呆过才能理解这个时代和这个世界;我叫嚷道，对自己已经理解的东西，我从此以后便不会再去加以否认，不会以某种奇怪的、我承认虽然也是经过绝对形象解释的生存原则之名义去加以否认，这种原则其实只不过是一种顺应时务、降心相从的原则;那么好吧，我叫嚷道，我对此没有意见，不过我们得说清楚，我嚷道，是的，必须说清楚，**民族同化**在这里不是指一个种族——我说的是种族! 这实在可笑! ——不是指一个种族去适应另外一个种族——太可笑了! ——而应该是这个种族与现有的事物、存在的情况和现存的各方面关系的**全面融合**，我嚷道，无论什么样的情况和关系都包括在内，其性质不值得去评价，是什么样就什么样，随其自然，而唯一值得评价、甚至可视为我们**义务**的是**我们的决心**，是我们贯彻还是不贯彻全面同化的决心，我继续叫嚷，但声音大概已经低了一些。我说，我们必须评价自己的能力，看我们究竟能不能实施这一全面同化，这是我们的义务。早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很清楚，自己不具备这种能力，无法去和现有的事物、存在的事物、与**生存**同化，但是尽管如此，我叫道，我仍会留在人间，存在下去，活下去。不过我明白，自己不具备同化的能力，也知道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很清楚:我同化是死，不同化也是死，相比之下同化更是死定了。所以说在这一点上，自己是不是犹太人对我来说都他妈的一个样，尽管在这里当犹太人无疑还占个大便宜，这一点，我妻子她懂吗?! 我大嚷道，**仅仅、唯独、完全是从这**

样一种观点出发，我才愿意做犹太人的。唯独从这样一种观点来看，我才认为这是一大幸事，甚至是特大的幸事，简直可以说是**恩赐**。我嚷道，这不是做不做犹太人的问题，其实我根本无所谓自己是什么人，重要的是，作为打上烙印的犹太人我有机会进了奥斯威辛，使我能够由于自己的犹太人身份经历、目睹了一些事情，而且也明白并一劳永逸、不可改变地明白了一些我无法舍弃的事情。说完这些，我缄口不言了。接着我们就离了婚。今天，如果我离婚后那段日子，尽管受此打击却并非以完全虚度的空虚时光而留存在我记忆的深处，那么这得完全归功于我在这些年月里干了不少**工作**，就跟任何时候一样，同至今、此前、当然甚至在婚姻生活里一样。是的，我的工作救了我，即便这种拯救其实自不必说只是为了让我走向毁灭罢了。这些年里，我不仅取得了一些十分重要的认识，而且还发现，自己所有认识的排列组合犹如一环扣一环地同我的命运紧密交织在一起。这些年里，我还认清了自己工作的真正性质，其实它无非就是一项挖掘工作，就是继续挖掘并完成别人在云中、在风里、在虚无飘渺之间为我已经开挖的坟墓。这些年里，我又梦想实现自己曾经在梦中预见到的使命和希望，今天我明白了，这是我通过“老师”的那个例子才有此预感的。这些年里，我认识了自己的**生命**，一方面它是事实，另一方面它是**精神的存在形式**，确切点说，是在某种幸存中不再继续幸存、不愿同时多半也不能幸存的幸存之存在形式，尽管所有这一切，这种存在形式仍又要求它的幸存，即要求对其本身进行**塑造**，就像加工一个经过修饰且脆硬如玻璃的物体那样，以便它

最终可以这样**继续存在下去**，无所谓为什么，无所谓为谁——既为任何人，也不为任何人，为实有其人的某人，或为虚有其人的某人，其结果反正殊途同归；要么是为某个曾因为我们而且（也许）替我们而感到害臊的人。然而，我会把这当作**事实**、当作幸存的纯粹事实加以消灭和清除，即便而且也只要这一事实真的碰巧就是我本人的话。这些年里，我常在树林里和奥普拉特博士相遇。这些年里，我开始作一些有关我婚姻的笔记。这些年里，我妻子又和我联系过，有一回，我在常去的那家咖啡馆里等她，盼望着她能带些新的药方来。她手牵着两个小孩来了，一个是黑眼睛的女孩，小鼻子周围撒满了星星点点的浅色雀斑；另一个是顽皮的男孩，长着一双活泼而硬朗的眼睛，恰似灰蓝色的鹅卵石。妻子让他们俩**叫我叔叔好**。这时，我一下子永远彻底地清醒了。有时候，我像只生了疥癣的赖皮鼬，在其余的同类被斩尽杀绝之后，独自蹑手蹑脚地在城里转悠。一听到这样那样的动静，或是发现这样那样的情况，我立刻会竖起耳朵，好似幽冥之中渗入过一阵断断续续的记忆气味，直冲我结了痂的、麻木的感官。每当走到这幢那幢房子的跟前，遇到这处那处的街角，我都会胆战心惊地停住脚步，张大鼻孔嗅一嗅，谨慎小心地瞧一瞧，四下打探一番，正欲撒腿就跑，却又不知被什么牢牢地拴在原地。我脚下的阴沟在咕嘟咕嘟地翻滚，仿佛我记忆的浊浪要涌出那秘密的河床，把我冲得无影无踪。那么现在，事已告成，我亦整装待发。我最后一次大动干戈地揭示了自己虽年老体弱但坚忍不拔的生存——我这么做，是为了自己能双手高高地托起这生命的包袱卷，动身上路，犹如迈入一条乌黑的河流，在

那主宰沉浮的深色河水里

沉没
噢,上帝!
让我沉没于
无限的
永恒吧

阿门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给未出生的孩子做安息祷告
作者＝［匈］凯乐泰斯·伊姆雷著　　宋健飞译
页数＝１１７
ＳＳ号＝１１９９３５２７
出版日期＝２００５年１０月第１版